

中国的故事
第贰辑



精选珍藏本

《黑镜头》编辑部

花山文艺出版社

52个催人动容的故事

150个真实记录的瞬间

空间中国

震撼中国的不朽影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故事·空间/紫图 编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4 (黑镜头丛书)

ISBN 7-80673-503-8

I. 中… II. 紫… III. 新闻摄影—中国—现代—摄影 IV. J4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7656 号



中国的故事

丛书特约总编/黄利 特约监制/万夏

顾问/鲍昆

特约图片编辑/吴晓牧 庄健

特约文字编辑/张杰 庄健 吴晓牧

装帧设计/宋丹

排版制作/韦志民 樊海燕

部分图片提供/fotoe.com

黑镜头—中国的故事 / 空间中国

责任编辑/李爽

美术编辑/美慧

责任校对/李欣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址/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邮政编码/050071

网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wcbs@heinfo.net

电话/0311-5915087 传真/0311-7815440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2 字数/50千字

版次/2004年10月第1版

印次/200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7-80673-503-8/K·006

定价/26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印厂联系)

封面故事

为什么生我

摄影 / 文 / 舟浩 2000 - 2003 年

这个儿童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小脑萎缩，并且因家长的疏于照顾而双小腿坏疽以致截肢。父母的离异、交恶，甚而因其抚养费走上法庭，并将他视为诉讼战中的工具，这都让自尊心和自卑心理极强的他不知道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是为了什么。

为了给残留的伤口消毒，每次都要在洗澡水里掺大量的盐。(p136)

人类的故事首先是时间和空间的故事，中国的故事更是如此。

因为时间，有了历史和命运；因为空间，有了社会和情感。

要叙述激烈跌宕的当代中国，离不开时间，

要认识真正的中国，需要走进许多我们看不见、

或者看见了也视而不见的空间。

因为变化太快，因为人口太多，

时间和空间其实是中国最稀缺的两大资源。

中国的故事
第贰辑



紫图《黑镜头》编辑部

52个催人动容的故事
150个真实记录的瞬间

空间中国

震撼中国的不朽影像



 花山文艺出版社





豆大的汗珠密布在纤夫的古铜色的身体上，痛苦的脸上饱含着坚忍的信念。作为第八代的张氏族纤夫，他们在祖先行走了近两个世纪的乌江边弄船。

序 / 影像中的生存

乾昆

在西方，20世纪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摄影史。因为在19世纪末的时候，摄影已经作为一种成熟的最有效的记录媒介，开始担当历史记忆的主要角色。摄影的这个作用，超过了以往所有承载历史媒介的叙事、记忆能力。摄影同时还是共时性信息记录媒介中最具现场感的宠儿。它可以将事件的背景、过程、人物和它们之间的共时关系完整地表现，给事后的观看者以在场的真实感觉。西方世界一百多年的历史事件基本都没有逃过摄影机的镜头，不论是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还是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争，以及广泛深刻的民众政治生活和翻天覆地的经济发展与万花筒般的文化变异。图片交织结构着这段宏大的历史，以至于文字开始退出历史记忆的首选地位，成为与图片互为补充的共同媒介。在记忆的功能之外，摄影的信息属性在文明的发展中也显示着巨大的作用。它极大地延伸和拓展了人类眼睛的视野，将原本遥不可及的远方情景神话般地收在咫尺。

除开记忆历史的作用之外，摄影还是人们对历史和生活的一种主观叙事。照片书写人类的情感，表述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快乐和忧伤、兴奋和愤怒、沉思和躁动，这些复杂的情感都可以在各种各样的照片中看到。每一张照片都是每一双眼睛的镜像。我们通过这些镜像和这些眼睛交流，并通过这些眼睛倾听他们的心声。所以摄影又是人类的心灵史。一幅幅令人久久不能释怀忘却的照片，正是从以上两个方面传达出丰富、深

吸毒者
摄影 / 谢海涛
2000年



邃的信息而永垂青史的。

在20世纪人类进程中作为发展中的国家和民族的中国，影像的历史是残缺不全的。这主要是指影像在建构中国现代史上的片面性。支持这种判断的事实如下：1. 世纪之初的晚清和民国初期基本没有国人自己摄影的社会影像，现存世流传的影像多为西方在中国的殖民者所拍，因而不能反映我们自我观照的脉络；2. 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对日的反侵略战争的影像基本上只见政治和风云人物，缺少对民众个体的丰富纪录和关注；3. 人民共和国期间的近半个世纪，影像更多地从属于国家民族的集体意识，个体生命的价值存在被宏大的现代性斗争历史叙事几乎完全遮盖。由于以上的这些原因，近百年来我们的历史生活和精神历程缺少影像的全面见证。这种遗憾将长久地存在于我们未来还有民族情愫的后代子孙心中。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中国新一代的影像工作者终于登场。他们初步具备了全面见证历史和表达自我判断的能力，虽然这和现代传媒在中国全面胜利落地有关。但历史终于以影像的面孔显示了它的活力和丰富性，并深刻有力地影响着当代充满变革的生活。他们替代我们成为在场的目击者，将我们关心的公众事件清晰地端到我们眼前，供我们重新审视被幻象所遮掩的真正现实。因此，照片在真实的认识外又具备了匡扶正义的力量。

以策划出版《黑镜头》而名著于世的北京紫图公司，最近将编辑的视角转向了中国的影像，将荟萃近年来中国新一代影像工作者的成就，出版《黑镜头》中国系列。这不仅是对他们成就的检阅概括，更是对我们现实生存的一种关怀和反思。它将开启公众的眼帘，并叩动那些还怀有良知的心灵，告诉我们生存是需要协作的，只有这世界的所有人都获得幸福的权利，我们才会获得幸福的最终快乐。



三峡移民告别故土
摄影 / 胡伟鸣
2001年

盲孩子
摄影 / 李楠
1989—1996年





火车上的中国人
摄影 / 王福春
1982—2002 年



10号大院
摄影 / 任锡海
1984—1999 年



大热天的热闹
摄影 / 胡伟鸣
2003 年



宽沟背铝人
摄影 / 李楠
1996 年

目录

序 / 影像中的生存 乾昆 / 6

第一章 拥挤 / 11

火车上的中国人 / 12

九十三家房客 / 22

10号大院 / 31

围观电视 / 40

密不透风的看台 / 42

著名小学的“赶考” / 43

盛大的宗族宴会 / 44

等待开闸 / 46

街头婚礼 / 47

广州火车站厕所的“高峰时间” / 48

大热天的热闹 / 50

第二章 边远 / 51

宽沟背铝人 / 52

穷人 / 61

乌江纤夫 / 69

小煤窑记忆 / 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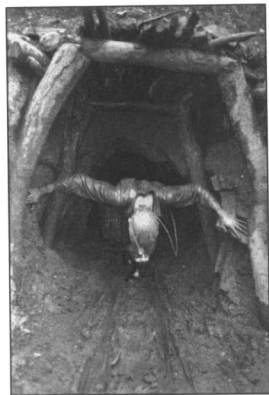
- 西部买妻 / 82
 父亲为儿筹学费 / 88
 木桶里的童年 / 90
 洗澡的小煤窑矿工 / 91
 乡村邮递员 / 92
 “露天”牙医所 / 93
 湖边玩耍的牧童 / 94
- 第三章 边缘 / 95**
- 地下室的风光 / 96
 在城市的边缘舞蹈 / 104
 血社火 / 110
 卖红薯的孩子 / 112
 快乐的垃圾娃 / 113
 “破烂王” / 114
 海口街头的舞蹈者 / 115
 在海口收容所外 / 116
 广州街头捡破烂的人 / 117
 逃离执法人员 / 118
 浙江农村的“歌舞团” / 120

第四章 非常生活 / 121

- 丢丢 / 122



穷人
 摄影 / 袁冬平
 1994 - 1995 年



小煤窑记忆
 摄影 / 吴东俊
 1994-2001 年



地下室的风光
 摄影 / 庄健
 2000 年



为什么生我
 摄影 / 舟浩
 2000 - 2003 年



河滩上露宿的农民
摄影 / 王彤
1997年



最后的金莲
摄影 / 任琴
1993-1994年



广州街头内衣秀
摄影 / 叶健强
2001年



排队领取救济金
摄影 / 李洁军
1995年

盲孩子 / 128

为什么生我 / 136

没有床的夜晚 / 144

交通亭下酣睡的人 / 152

在树上“筑巢”而居的老人 / 153

吸毒者 / 154

教孩子吸烟 / 155

非典时期的爱情 / 156

第五章 最后的 / 157

最后的金莲 / 158

最后的带枪部落 / 168

第六章 变迁 / 174

闹洞房 / 175

穿过礼仪小姐的队伍 / 177

平遥古城拍人体 / 178

街头赶路的商贩 / 180

广州街头内衣秀 / 181

高楼大厦下的牛耕 / 183

排队领取救济金 / 184

“带路”生意 / 185

三峡移民告别故土 / 186



拥挤

拥挤是我们自幼以来最熟悉的空间结构，
我们在拥挤中抗争，也从中获得各式各样的集体概念。

对中国人来说，拥挤可以是对抗性的，
也可以生长出贴身的抚慰和温暖。

我们最终都会发现，
摆脱拥挤的途径其实和中国的空间一样稀缺。

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毕生的功课和学问，
便是学会挺住，以及随遇而安。

火车上的中国人

摄影 / 文 / 王福春 1982—2002 年

我是在铁路上工作的一名自由摄影人，早年毕业于铁路机车司机学校，参加工作后，曾在列车上工作过，对铁路有着特殊的感情。从事摄影工作后，我的镜头一直没有离开过铁路。随着创作的不断深入，我越来越关注人们的旅途生活状态。近二十年来，我北上漠河，南下广州，西奔格尔木，东至上海……乘坐列车上千次，行程十几万公里，拍摄近万张底片，留下了人生旅途的印记。

火车是中国的主要交通工具，列车带着人们奔向四面八方。相对于拥挤的硬座车厢里面的人来说，能坐在靠窗的位置应该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了。







狭窄的车门，攒动的人群，人们都在想尽一切方法尽早地挤上车厢。对于这些乘客来说，能早一点挤上车就意味着能有机会选择或者占据一个好一些的位置。乘警有的在努力地维持着车厢的秩序，有的已经放弃维持，在人群外做观望状。



每当我踏上飞驰的列车，就好像漫步在哈尔滨大街、北京胡同、上海里弄一样，令我如醉如痴，流连忘返。

列车是临时大家庭，是流动的社会，它浓缩了人生百态：身着各种流行时装的青年男女；小猫小狗堂而皇之地在卧铺上占有一席之地；风靡全国、充斥东西南北的麻将牌响个不停；虔诚的伊斯兰教徒阿訇跪在车厢门口在祈祷；92岁的老方丈带着象征圣洁的白手套为小姐号脉诊病；母亲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刚刚出生的婴儿；对对情侣旁若无人地嬉戏、调情……令我难忘的镜头太多了，有的令我欲拍不忍，总是在矛盾和困惑中按下快门。在留住美好的同时，也留下了很多遗憾，无法弥补的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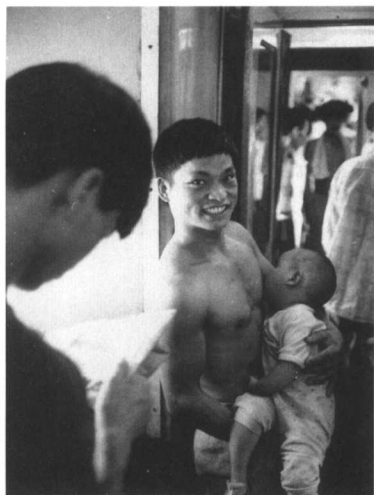


没有座位的一家人在车厢里找到了一块儿相对舒适的空间。虽然所处位置有些尴尬，但是对于其他只能在拥挤中站着的乘客来说，他们的“地盘”已经算是奢侈的了。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开往南宁的列车上，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满身汗泥，倚住车门站着睡着了。我望着小女孩足足有五六分钟，我不能给她帮助，心里十分难过和自责，就在快门释放的一瞬间，我的心被刺痛了，忆起了自己的苦难童年……

在列车上拍片，难度很大，既要克服光线暗、列车晃动的不利因素，又要排除列车工作人员的误解；既要忍受个别旅客的刁难，又要忍饥耐渴抗高温，不怕疲劳。1995年盛夏，列车通过被称为“火炉”的武汉时，车厢温度高达40度，旅客严重超员，人挨人，人挤人，寸步难行。热得我浑身淌汗，头发跟水洗的一样，T恤衫全部湿透。红色的T恤衫干后，结成白花花一层盐碱，真想留做纪念，由于随行衣服少，只好洗掉。那次终因流汗过多，加上一路过度疲劳，而虚脱晕倒在车厢里。



狭窄的过道上，憨厚的小伙子抱着自己的儿子回农村老家。虽然没有座位，不谙世事的孩子在父亲的怀抱里仍然睡得很香。

面对这一幅幅照片，我的心起伏难平，酸甜苦辣一齐涌向心头。每幅照片的背后都浸透着我的汗水与心血，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叙不完的情怀。

作为一名自由摄影人，创作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感悟人生、透视人生、印证人生、展示人生。我相信随着时间向后推移，到下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回过头来重新看《火车上的中国人》会另有一番感想，它的历史价值远远大于自身的审美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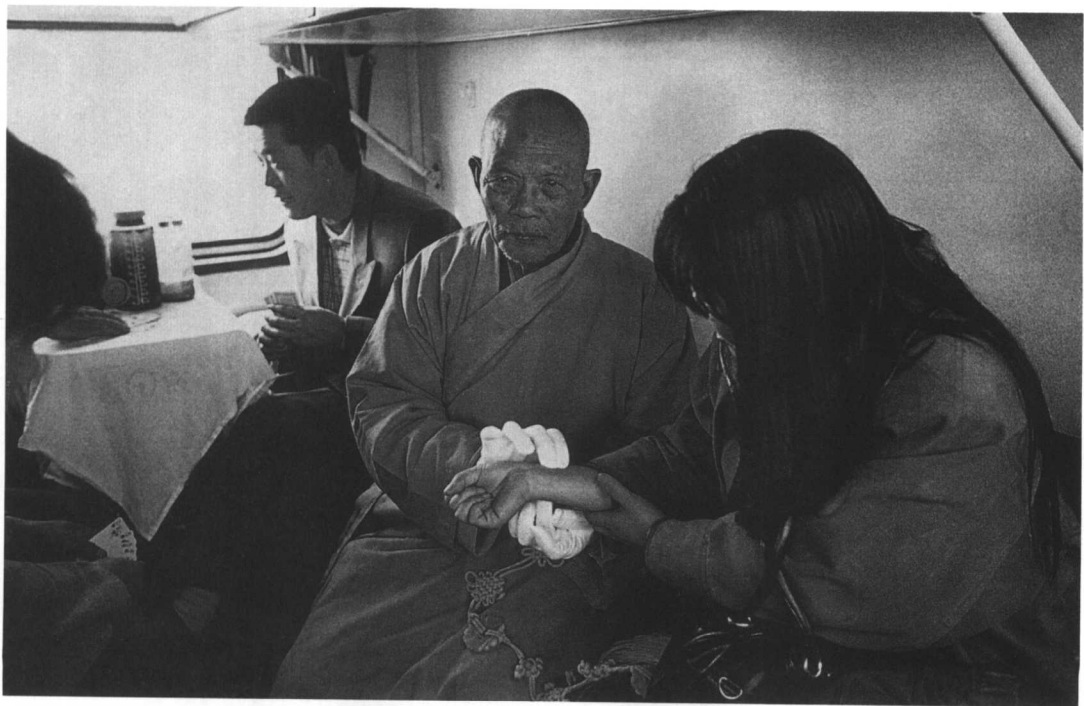




没有位子的乘客想到了在座椅的靠背上休息，虽然这个姿势看起来很难受，但是比起几个小时的站立来还是要舒服一些。



由于空调太凉，乘客只好钻到椅套下面取暖。



老方丈非常认真地在为同车的女乘客把脉看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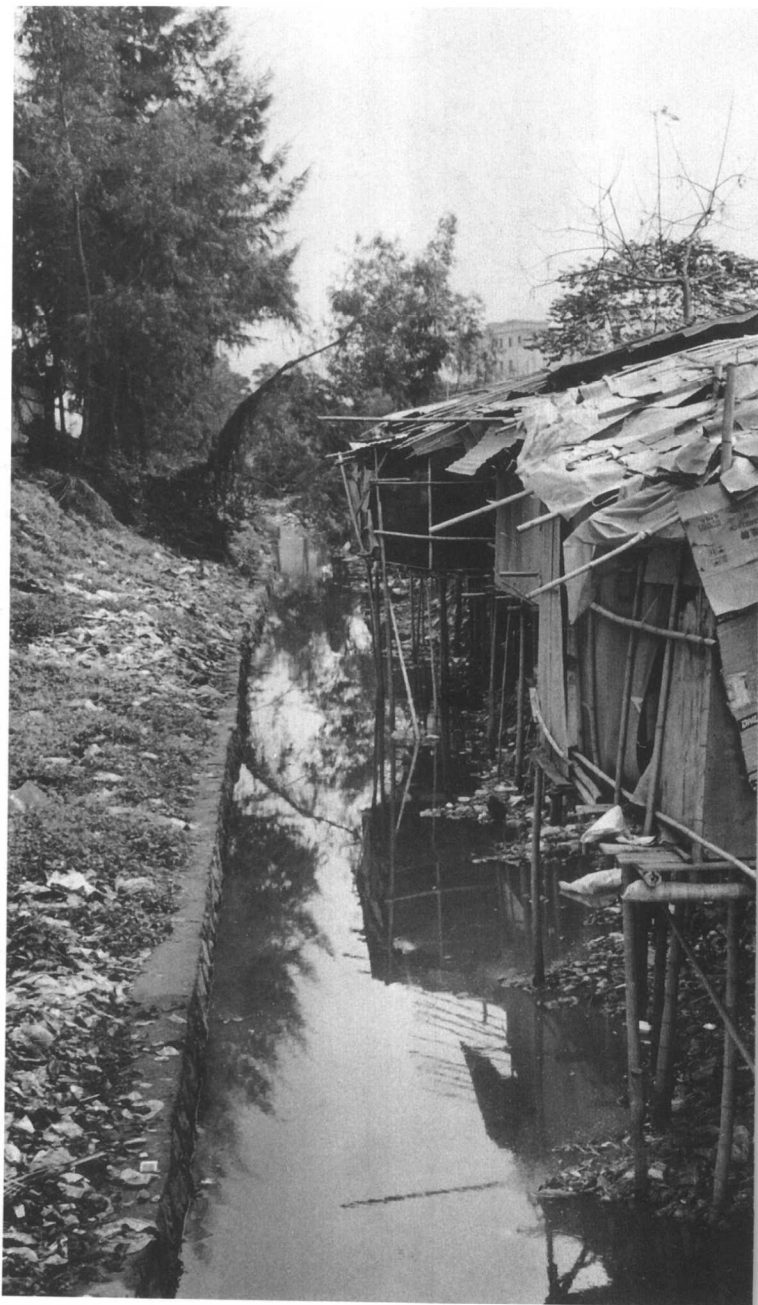
旅途遥远漫长，乘务员和乘客共同创造了这种打发时间的娱乐方式。

九十三家房客

摄影 / 文 / 张新民 1997年

棚屋区其实在每个大城市都有，北京有“浙江村”，广州有“垃圾村”。部分城市居民，曾经怀着优越感，抱着可怜他们的同情心，保持着一种警觉去看他们：他们是盲流，他们脏乱差，是城市的污染源；他们“村”里杂七杂八，是治安犯罪的渊藪；他们没有生活品味；他们不可接近……甚至有人如同挖到宝一样惊呼发现了损害城市的一大公害，满怀义愤地呼吁有关部门捣毁……

现在，随着摄影记者的眼光，我们可以走近他们。我们可以发觉：他们艰苦，但不乏拼搏心、上进心乃至希望；他们有人情味，他们有爱，有很好的感情；他们没有城里人自我封闭的怪脾气，居然可以十个平方住十户人家；他们在认认真真地生活……





在布满垃圾的水沟边，人们搭建起了一排“吊脚楼”。从破铁皮、毛毡、纸壳、木板这些随手能得来的“建筑材料”上能想象出居住环境的恶劣。破窝棚和远处的高楼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俗话说“关起门来是一家”，指的是原本不是一家人相互把对方看做自家人，不见外。深圳的“团结户”正是如此：三两家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共租一屋，同舟共济，共度难关，虽苦犹甜。

然而，赵云波何素芳夫妻的团结户“府上”却拥有10家人——5对夫妻、1对姐妹、4对朋友，20个人共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棚屋，5张单人木架床叠成上下层，密密匝匝靠墙一圈，中间1平方米空当正好放一张小方桌。上下床两个铺，每铺两人睡觉。倘若20个人正好都同时下床来，棚屋里所剩地面是断然容不下40只脚的。

“这种事不会发生。”赵云波说，“有上夜班的，上白班的，人不会同时都在屋里的。”

1997年2月，记者两次去采访，想给这20个人的大家庭拍张全家福，左等右等，始终没能把人等齐。进到左邻右舍探访，情形都差不多：每间屋少则五六张，多则十几张上下铺木床，每铺住两个人，多为夫妻，也有亲戚、朋友、熟人、老乡搭档共住的。

这个棚屋区在深圳沙井镇万丰村边沿，顺着一条排水沟，一间又一间的棚屋连成了一条街。记者从头数到尾，93间。按平均每间20人计，这93家房客大约一千八百多人。他们全是从内地来深圳的打工者，其中90%来自四川。

赵云波今年26岁，1992年从四川西充县来万丰，在好几家外资工厂打过工，是棚屋的老房客。他说厂里有集体宿舍，但是夫妻不能住在一起，朋友老乡也难住在一起，互相没个照应。还有，不准自己做饭，吃食堂，口味和价钱都不行，房费也太贵。

赵云波的妻子在一家玩具厂做工，每月能挣400—500元。他俩的床费每月60元，水电费另计。小两口每月开支大概需500—600元，如果不失业，一年下来，两口子能攒下5000元左右。赵云波说：“在家乡，人均不到半亩地，没有钱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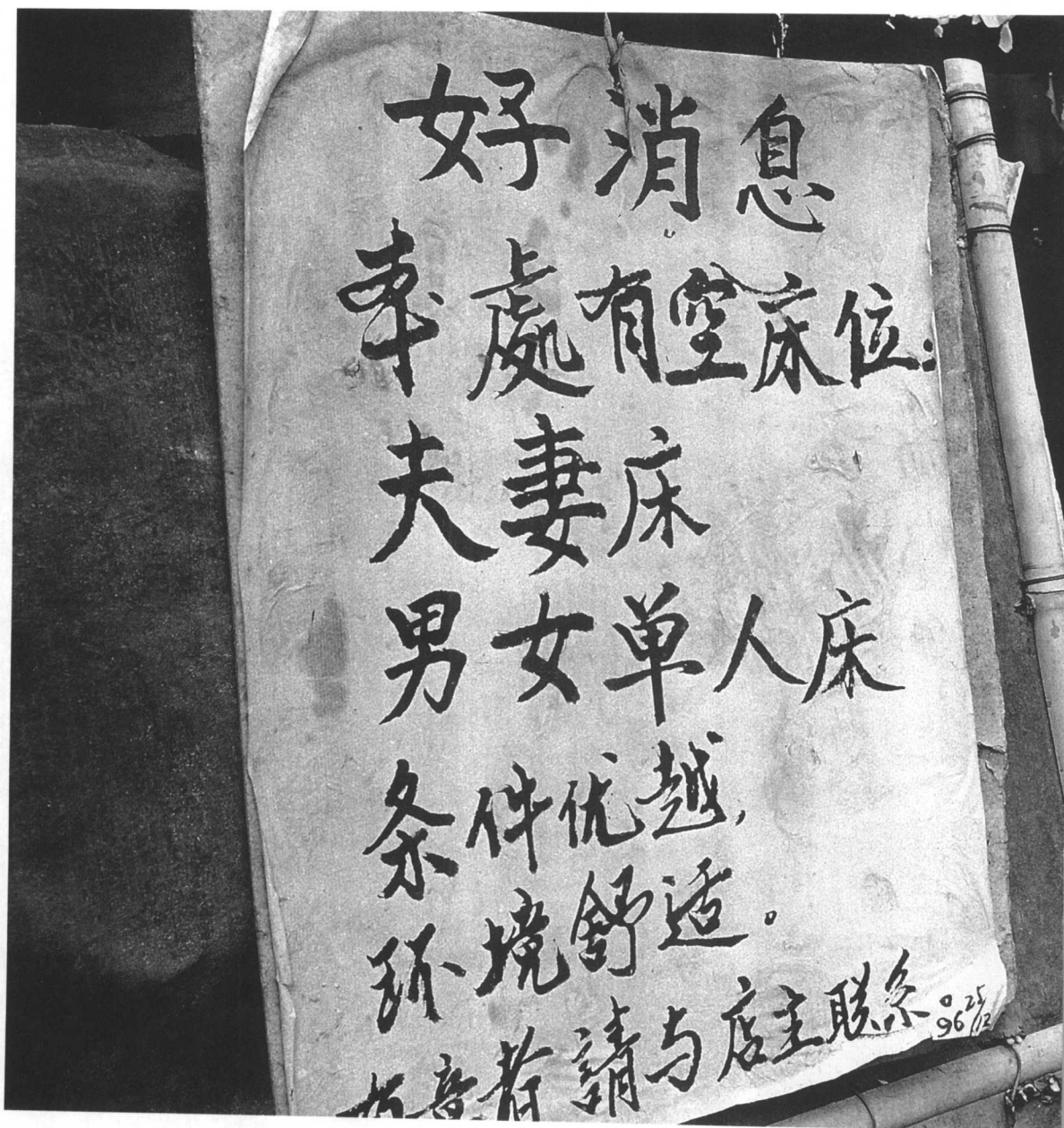
棚屋里每张床都挂上塑料布做帘子，男女隐私全在关起的帘子里。“过夫妻生活像贼似的。没办法，大家都一样，见惯不惊。不过比住厂房好，住厂房你想过夫妻生活是要抓的，抓住就罚款，弄不好还‘炒鱿鱼’。”

个人隐私，对于棚屋房客们来说，根本就无从谈起。生存压倒了一切。虽然在隆冬季节走进棚屋感觉还可以，但是完全可以想象，二十来位男女房客挤在这样的空间里，如何熬过南方漫长的酷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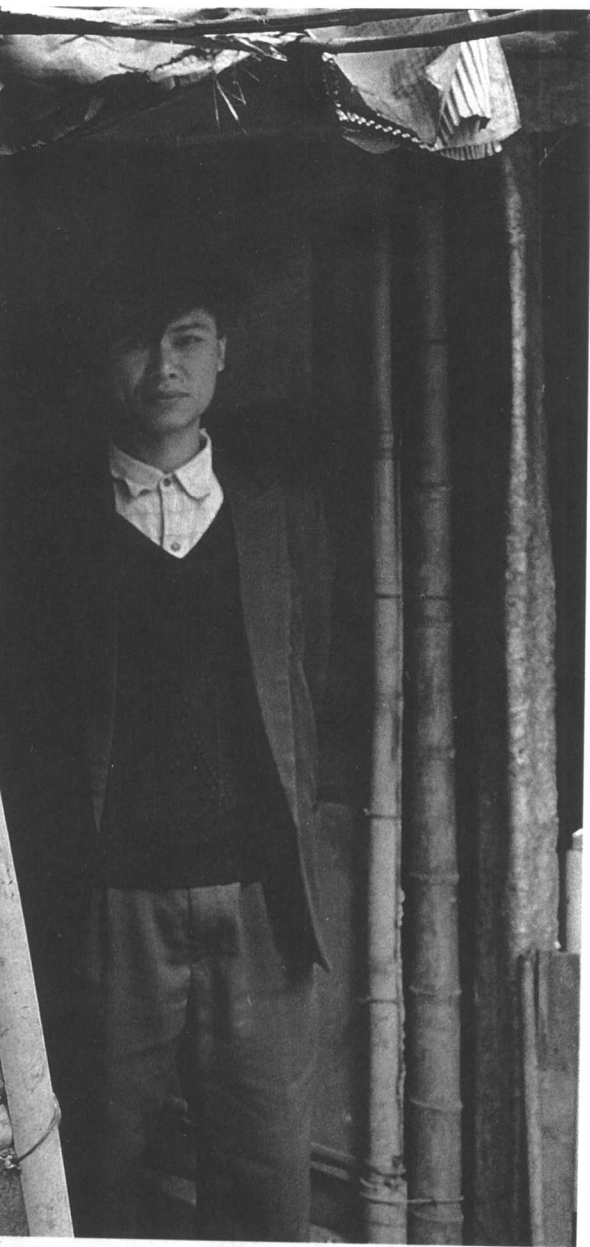
93间棚屋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点。赵云波说，附近还有很多，菜市场下边就有一处。

（右页）棚屋里，小夫妻间的亲昵总是让同住的大姐羡慕。





谢金新在深圳打工5年，目前在棚屋区经营着一间小店，同时承包两间棚屋出租。



(后页) 小小的房间里，极尽所能地被搭建出五六个上下铺，空间被利用到了极致，而人们舒展肢体的愿望只好留在一张单人席大小的地方。20个男女在一间窝棚里共同度过春夏秋冬，这样的窝棚有93家。

赵云波的连襟杜成东和他床对床，去年，24岁的杜成东在南海市某公司干保安，工资收入和食宿条件都不错，因为妻子何素琼在万丰打工，春节前杜成东放弃了南海的工作来到妻子身边，成了棚屋的房客。杜成东从报刊抄了一大本有关打工者生活的文章和诗歌，他告诉记者，他正在认真考虑要不要返回家乡。

但是绝大多数棚屋房客没有这个打算。他们认为，出来打工，住棚屋，都是自己的选择，“打缩脚锤”会被人认为没出息。棚屋虽然挤，但是有亲情，有乡音。

城市要综合治理，棚屋迟早会拆除。记者问棚屋房客到时怎么办？赵云波想了想，说：“天无绝人之路。”







风筝带着祖孙俩的愿望飞翔在10号大院的上空。祖孙两人位于画面的正中，小孙子专注而认真地操控着手中的线，风筝通过祖孙俩的手升向空中。孙子稚嫩的脸和奶奶在风中飘动的白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画面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浓浓的亲情。



10号大院

摄影 / 文 / 任锡海 1984—1999年

建于二十世纪初的邱县路10号大院(原名德盛里)位于青岛小港码头附近,老人们用“大窑沟、海关后”为它定位。二十世纪20年代,母亲被父亲从渤海湾畔的掖县接来青岛后没多久,便在这大院三楼租了一间房子,一住就是七十多年。1945年出生的我也在这里度过了五十多个年头。

1980年9月,中国著名新闻摄影理论家蒋齐生先生到青岛讲学,顺便到大院来看望我的母亲,他站在楼台上,对这住有五十多户人家的像个村庄一样的大院很感兴趣,并嘱咐我注意把大院的人,大院的生活拍下来。

五十多年的时光，对于人的一生，算是不短的。大院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记载了我从童年到少年，从青年到中年生命的痕迹，还有相处几十年的邻居婶子、大爷、大娘，兄弟姐妹们，比自己小的侄子、侄女，甚至更小的称我为“爷爷”的孩子们，在大院里，邻里之间就是这样像一家人似的称呼和相待的。妻子初进我家，很有些不习惯，惊奇怎么年轻轻的就被人叫做“五奶奶”了。五十多年，两万多个日日夜夜的纠缠厮磨，使我与“10号大院”难割难舍。新房子分了已有多多年，但我仍与老母、长兄、妻、子挤在老院两间旧房里，只在周末才去套房住上一宿，即使这样，第二天一大早，就闹着“要回家去，回10号大院去”，妻子怎么也读不懂我对老院的这份恋情，只好发狠地称呼我为“怪物”。

在公共环境中做皮肤护理，恐怕是大院的特色。





虽然房子小，恩爱的小两口把自己的家收拾得整整齐齐。



孙子上学前和奶奶道别。

10号院一带，因位于小港码头附近（当年是主要的码头），在青岛开埠初年，就被划为“劳工区”或“贫民区”，所以院里住户多为“扛大包的”或“拉大车的”从四乡来的移民。记得住在三楼头处在码头上扛大包的“四大爷”、“五大爷”，兄弟两人合租了一间房，用两只木箱一隔，就迎娶了“四大娘”和“五大娘”。即使现在，这“大院”里住的也仍是些最平常不过的普通青岛人。平日里邻居们虽然也会有些碰碰磕磕，但遇事相互照应，相互帮扶使得大院生活显得有滋有味，与在新式套房住了多年还不知对门姓什么名什么相比，大院生活特别富有人情味，特别让人依恋。

在这大院里，母亲是年纪最长，居住时间最久的“元老”，她性情豁达、爽直，爱“管闲事”，因此在院里很有些“权威性”。1950年，大院重修后，有关部门突然想转做他用，母亲约同院几位婶子大娘们据理力争，终于得以返回，而且还提出了仍按各自原先的方位回迁的原则，以避免出现争执。听晚年的母亲述说这些往事，我

（右页）虽然是小小的年纪，已经有了自己的审美观。幽暗而破旧的环境更加衬托出孩子雪白的裙子，娇嫩细致的肌肤和清澈的眼神。



突发奇想：如有“伯乐”提携，母亲会是一位不错的领导者。住进10号大院的我家，从物质层面上讲，自然可以用“清贫”二字概括，这是事实。但生来即心灵手巧的母亲，通晓许多事理，尤其对艺术有着特殊的感悟能力，因此使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对精神层面要求较高的氛围中，受到母亲以她特有的方式传输给我的艺术启蒙，并在她的关心下，一步一步地走上艺术之路，并有了一定的成就。多年来，母亲总是我作品的第一位观众和评委。有时朋友拿照片给我看，近百岁高龄的母亲也愿看，让她挑选，她挑出的那张肯定是最好的一张，母亲的观念一点也不落俗套，我曾几次对母亲讲，有机会让她当一次年龄最高的评委。多年来，我时常给母亲拍照片，但都是些随意的生活照，没有刻意安排和讲究，偶有她看好的，她会问我能否摆展览、上报纸，但因工作忙，也总觉还有时间，我总推说下次拍，下次拍好一些的，一直也未能如母亲的愿。

狭小的家中摆不下钢琴，小女孩自有办法练习。



1998年10月28日，农历的九月九，“重阳节”上午10时，因病住进医院，已安详地睡了两天，醒来还应答了我与哥哥们问候的母亲永远地“睡”着了。这突然而来的变故，我毫无准备，我一时木然，无泪、无语。在婶子、大娘们的指点下，我沉静、机械地行完了应有的程序之后，我一直在思考，寻找与母亲继续对话的途径。在排除了好多的不妥之后，我选择了这个方式，利用1999年的夏天，完成了这个在青岛开埠后不久即建成、母亲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的老院的拍摄，并选择1999年的“重阳节”举办《五角大楼——10号大院的故事》摄影展，献给即将迈进新世纪的青岛，并作为对母亲，一位平凡的世纪老人的纪念。

没有太多的空地，孩子们在楼道里面认真地练习节目，准备迎接香港回归。





在公用的走廊上，人们边读书边锻炼。这是一个可以全方位纵观大院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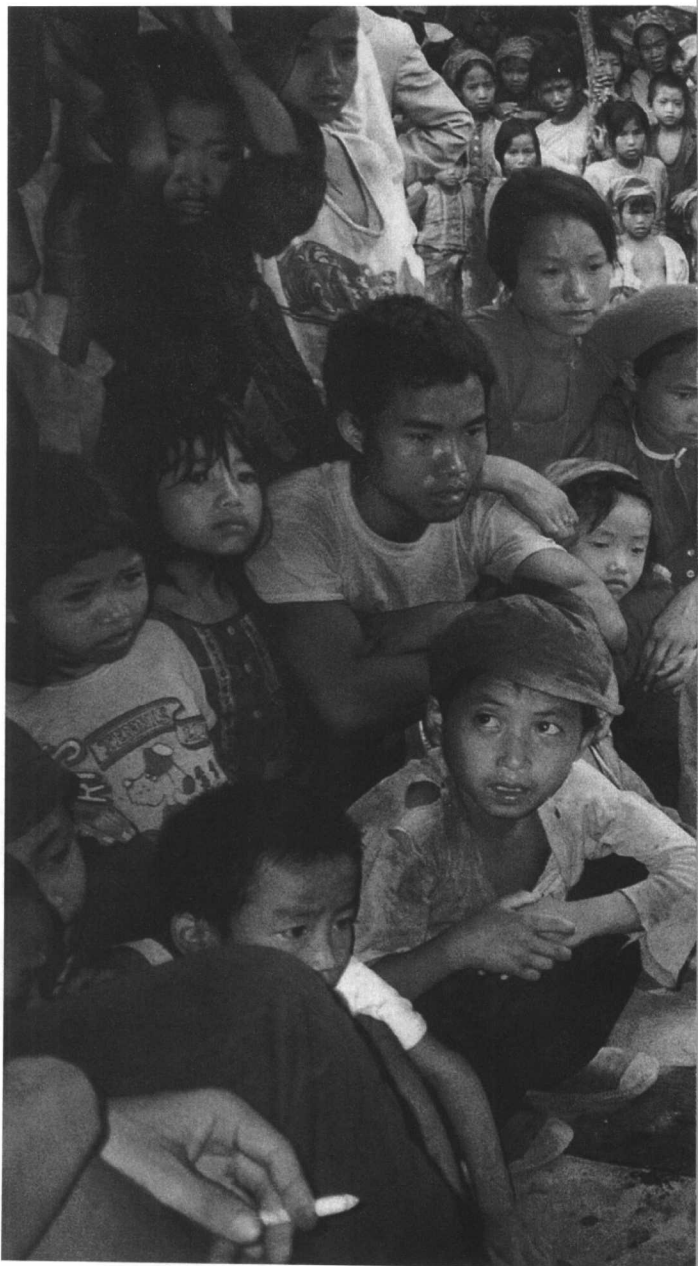
围观电视

摄影 / 王艺忠 云南勐海县 1988年

电视前方一个蹲着的男孩正用手好奇地指着屏幕，旁边吸烟的村民看得竟也忘记了掸烟灰和吸烟，一台电视，在遥远闭塞的山乡，魅力如此迷人的确令人感慨。

在偏远的西双版纳勐海县的布朗族聚居村，许多村民是第一次看到电视，也是第一次从电视中看到香港武侠片，虽然听不懂片中语言，但精彩的打斗场面居然还是吸引着屋外100余人冒雨站立了两个多小时，这两个小时让村民们第一次知道，原来外面的世界如此精彩广阔。

西双版纳勐海县的布朗族村民们聚集在一起观看全村的第一台电视，村民们眼神都非常的专注，虽然是小小的一台电视，仍然引起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





密不透风的看台

摄影 / 萧云集 浙江苍南 1992年

照片上各样式鞋的密集程度，层次各不一样，尤其是女士们的高跟鞋，让人很难想象她们就是昔日耕作的农民。拥挤看台的后面，隐现了“温州模式”的繁荣与成功，而“温州模式”之一便是农民城的创建。

龙港农民城是在当时国家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依靠私人资本兴建起来的，这种民间推进的城市化改变了政府与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也使其相互间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契约关系，这在龙港乃至当时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92年10月3日，全国伞翼滑翔赛在苍南县龙港镇举行。这是“农民城”第一次举办如此大型的活动，开幕式上，四邻八乡拥来看热闹的观众坐满了简陋的看台。





2001年5月27日，西安市数千名家长送这些6岁的孩子来小学的招生现场“赶考”，不少孩子和家长在拥挤中受伤。

著名小学的“赶考”

摄影 / 谢海涛 西安 2001年

2001年5月27日，在一所因升学率较高而闻名的小学的招生现场，尽管校方事先已公布仅录取70名新生，但为了孩子的前途，西安市数千名家长还是宁出高价、挤破头也要把自家的孩子送进这所小学，为千方百计地送这些6岁的孩子来“赶考”，不少孩子和家长在拥挤中受伤。照片的左下方，一名学生家长正抱着他的孩子，旁边孩子的母亲手落在半空，担心地看着父子俩。孩子们的教育未来与望子成龙的期盼成为这张照片的聚焦点。

在目前的中国，教育正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从这张拥挤的名校招生照片上，我们也可以看见“分数”、“优生”、“重点班（校）”这些应试教育的模式在现实层面里对素质教育的小小讽刺。

盛大的宗族宴会

摄影 / 萧云集 浙江温州 1998年

温州人的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渗透着浓厚的宗族思想。农村古来多聚族而居，宗祠也大多就近建在聚居地附近，岁末时由族人共同致祭。

照片上一张张圆桌和坐在圆桌旁的人呈放射状布满了整个画面，传统宗族力量织就的大网促成了宗族内部成员团结的大轮盘。

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中国，有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其一是大家所熟知的乡村经济转折，它的动力是“农村经济改革”和“草根工业”（乡镇企业）的大量发展；其二是一个悄然兴起的“乡村传统文化复兴”，而温州苍南农村的宗族宴会庆典便是后一个历史过程的一个小小的侧面。



图为1998年5月，苍南县某宗祠内举行的盛大的宗族宴会。人们因为血宗关系聚集在一起。



等待开闸

摄影 / 王彤 上海 2001 年

这张铁栅门后人群拥挤的照片，是城市化快速推进导致的拥挤，城市在拼命拉大城市框架的同时，交通基础建设的欠发达，很容易让人面临这种铁丝网后拥挤的尴尬。图中最右边抱膀子的中年人、最左边手揣衣兜的老者和站在前排中间的儿童，他们的表情都很从容而安静，对于这种路途上的拥挤老中青各代均已习以为常，除了无奈与抱怨，他们所做的也许只有忍耐与等待。

在上海，每天挤在江边船闸等待放行的既有上下班的本地居民，也有专程来坐渡轮游览的中外游客，一条小小的渡轮上聚集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各种人等。

在上海，每天挤在江边船闸等待放行的上下班的本地居民。





一场普普通通的婚礼由于新郎新娘“新潮”的装扮，让新人身后的小巷里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小商贩甚至停下了手中的生意观看这场婚礼。

街头婚礼

摄影 / 吴正中 青岛 1993年

1993年，一对新人从青岛市博山路的农贸市场经过。在那时，着西服、穿婚纱举行婚礼对百姓来说无疑还是件新鲜事，于是路过的人们纷纷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对新人写满幸福的笑脸，他们对近距离看到新娘感到亲切，就连小商贩也停下了手中的生意观看这场婚礼。身穿洁白婚纱的新娘，手捧着一大束象征灿烂爱情的红玫瑰，笑意盈盈地看着右边的新郎，而右边胸佩饰花的男子西装却不革履，竟穿了一双球鞋侍立一旁，此种土洋结合，恰恰是那个时代接受众多舶来品洗刷后的一个小小映射。

广州火车站厕所的“高峰时间”

摄影 / 叶健强 广州 1991 年

一年一度的春运，急切的生存心理，人口在同一时间大量流动，产生了中国特有的民工潮。如此拥挤的如厕场面，让人可以想见打工者乘火车时的混乱。跑在最前面身着旧方格上衣的（袖口已磨毛了边）女孩尽管满脸欣喜，但严酷的打工现实已不像她们想象的那么浪漫，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沿海省市对劳动者的需求量不断上升，一些不满足原有土地回报的农民开始到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捞世界”，最终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潮流。在广东，甚至曾上演过80万民工滞留广州火车站的惊人一幕。1991年，春节刚过，南下的民工就已如同潮水般地涌入广州火车站，女厕为此“爆棚”，为了上趟厕所等上个把小时是常有的事。



正值春运高峰期间，广州火车站的民工连上厕所都造成了拥挤。跑在最前面的女孩子脸上挂着欣慰的笑容，她好像随时都要冲出画面。





2003年，武汉龙王庙江滩游泳的市民。人们来到江边本来是为了纳凉和获得更多的空间，结果江边仍然是拥挤不堪。

大热天的热闹

摄影 / 胡伟鸣 湖北武汉 2003年

说到武汉的热，尽人皆知。武汉是全国著名的三大“火炉”城之一，在七八九月大热期间，武汉一直像是被浸在热水中，酷热的夏夜会把武汉市民从家中“赶”出来，于是夏夜赶到长江边戏水消暑，便成了武汉市民多年来的生活习惯。为了解决市民的亲水要求，汉口江滩在一期和二期修建了两个容纳量分别为700人和800人的游泳池，但仍难以满足市民戏水的需求。

照片中便是当年“长江第一险”的龙王庙江滩，在盛夏时节变成了武汉市民的“亲水”景区，但见江中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尽管江滩边戏水人多得像南极的企鹅群，一片拥挤而混乱的场面，甚至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但不分男女老幼，依然惬意无比。



对中国来说，边远是一个空间概念，
更是一种生存条件。
最远和最弱，有时候会成为媒体记者大喜大悲的“体验”素材，
也会在某些瞬间证明我们的善良天性和公正感。

宽沟背铝人

摄影 / 文 / 李楠 1996年

宽沟，地处山西省宁武县境内。素有“山多不长树，沟多不流水，地多不打粮”的说法。穷，伴随了几代人。

80年代初，经国家地质部门勘探，在这17平方公里的土地下拥有大量的铝矿石，含量均为80%以上，这无疑给宽沟一带的人们带来了惊喜。

县扶贫工作队仓促教会人们如何识别铝矿石之后，露天矿藏很快被采掘一空。于是，人们便开始了打洞挖井。长期被贫困束缚的人们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私挖乱采，并一直延续至今。

杨兰柱，宽草坪人。因家境贫寒，只好靠妹妹换亲娶来一个媳妇。他每天早晨6点出发，步行一个多小时到矿上背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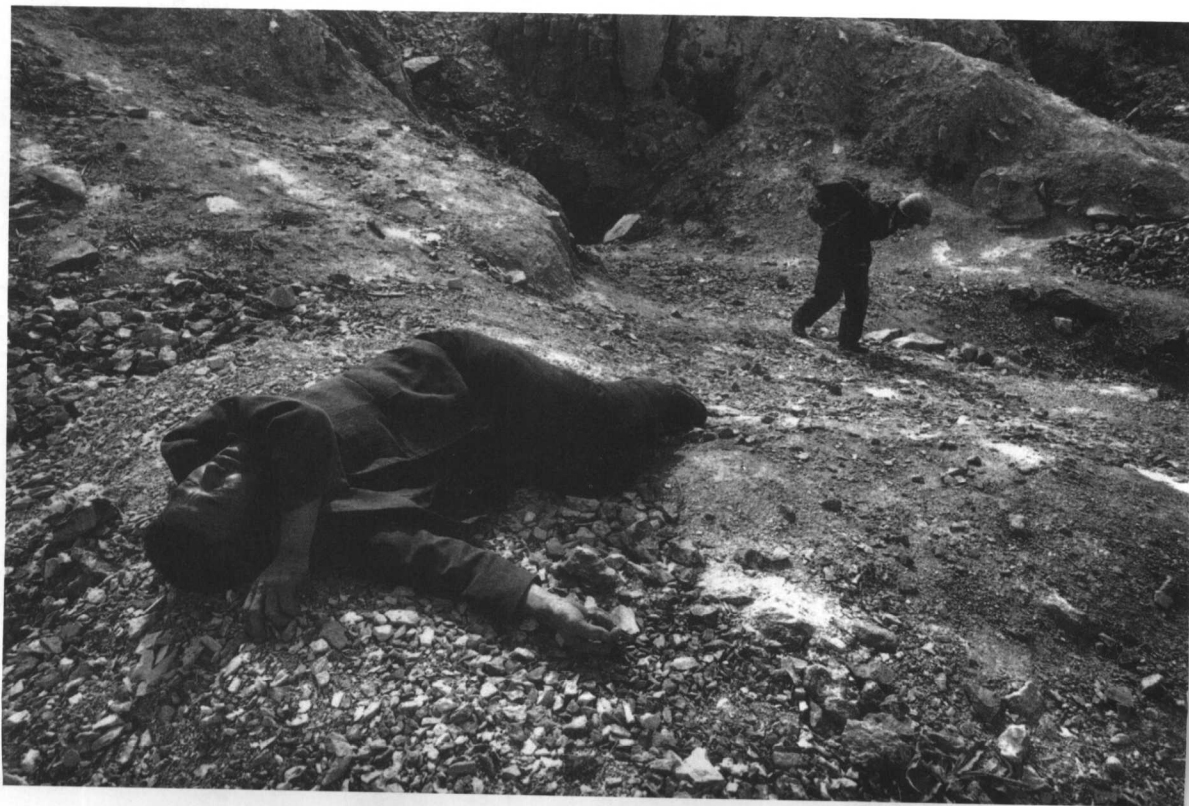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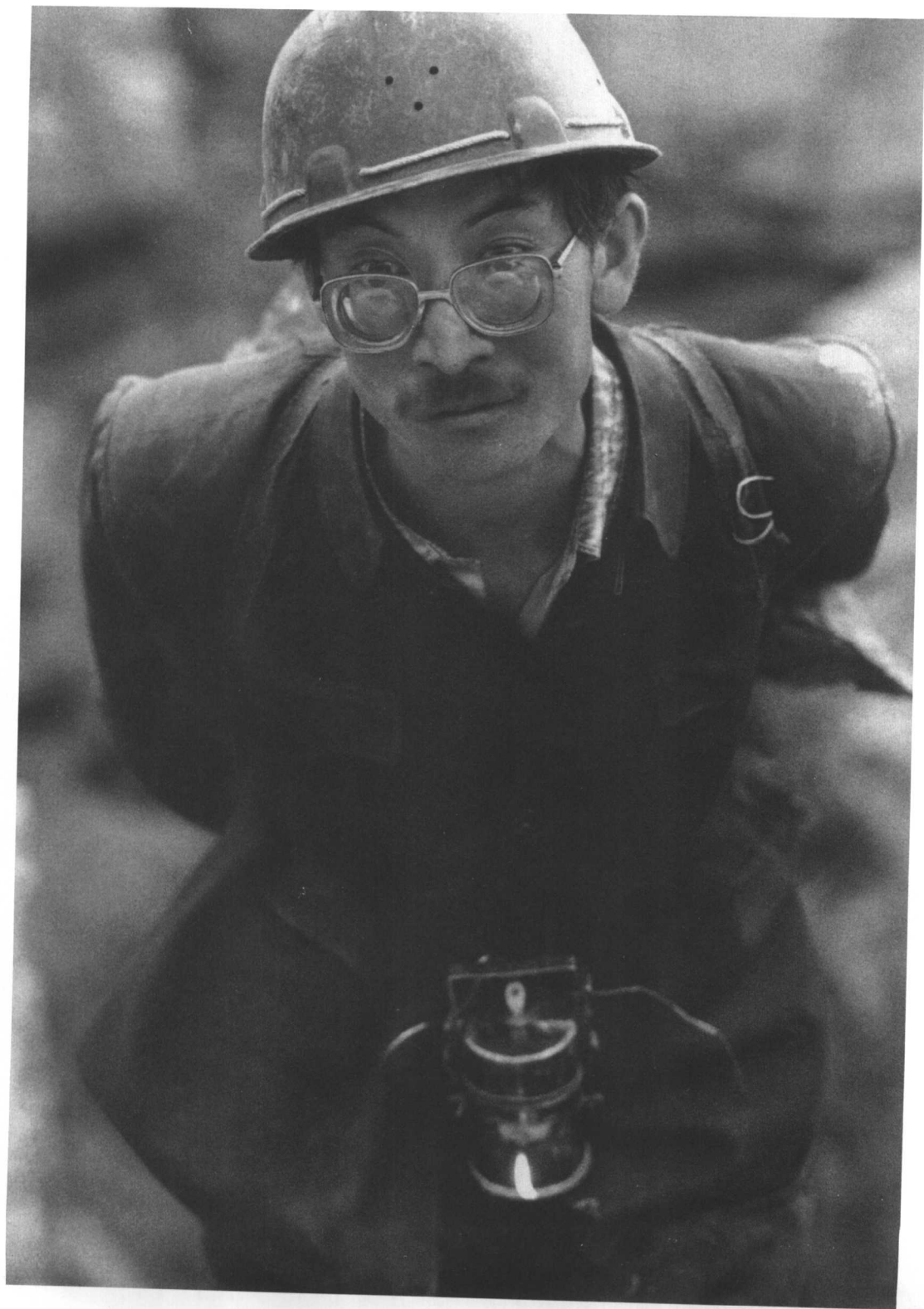
在产供销一条龙，年吞吐量达3万吨的宁武县铝钒土公司的公开收购下，私矿开采现象日趋兴旺。由于私矿矿主的极端私欲和采掘的盲目性，加之私挖的暂时性，使铝矿场的回采率只有15%，也就是说地下85%的矿藏将无法再度开采，给国家资源造成极大浪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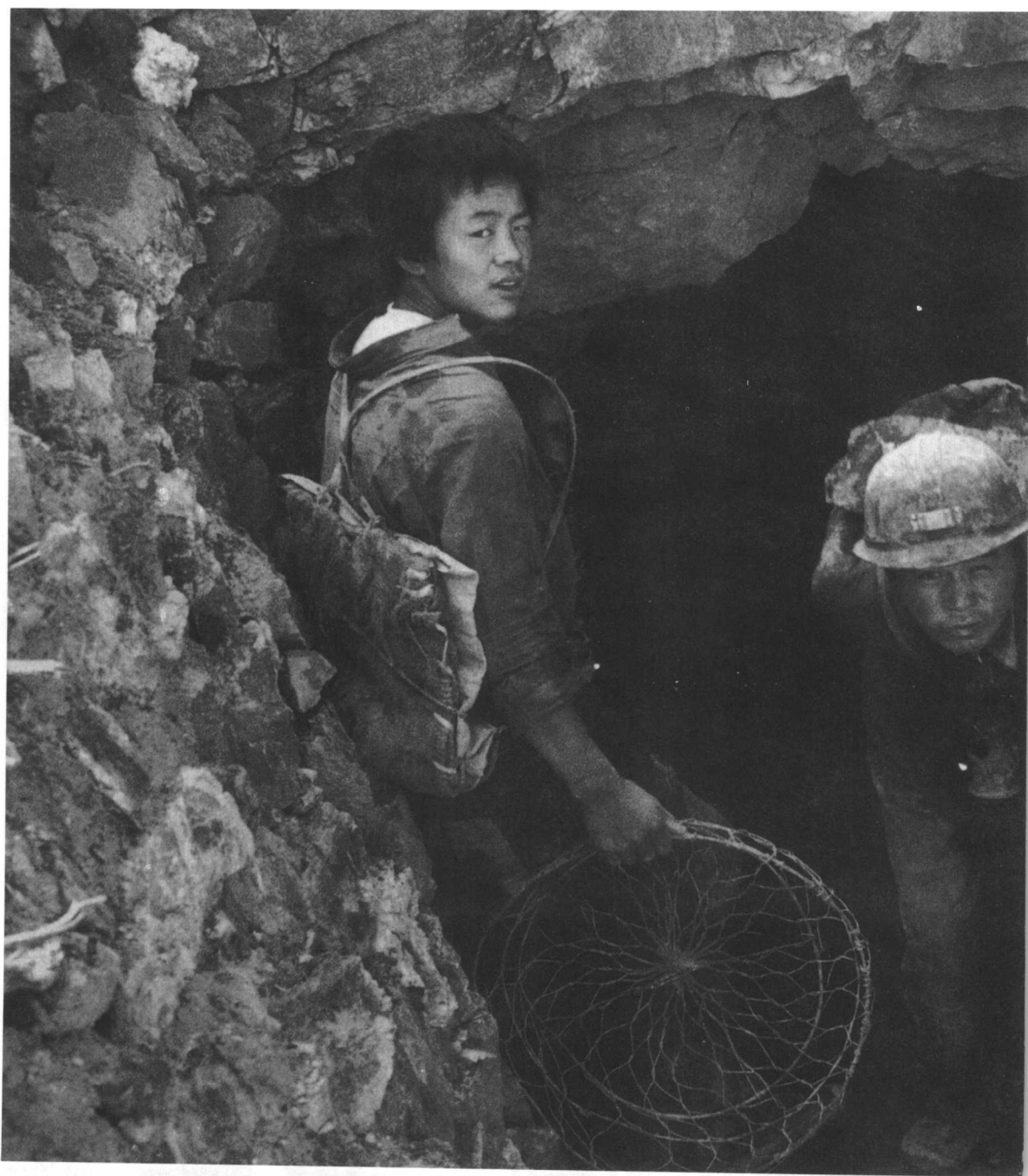
而为了生计，宽沟的男人们大都从事着背铝这极为艰辛的劳作，每天身背150~300斤重的铝矿石在二百多米的巷道中来回穿梭五十多趟，可收入二十余元。背铝人既有不满14岁的孩童，也有50岁的长者。甚至，一个乡村教师也利用每年两次的寒暑假来矿上背铝，他说：这活虽苦，并且危险，但这两个假期的收入是我一年工资的总和。

繁重的劳动常使人倒头就睡。

(右图)1200度高度近视的杨喜林在矿上已经干了很多年，他想挣钱后找一个离异的或者残疾女人结婚，对于正常的姑娘他已经不敢奢望。透过厚厚的镜片，他的目光非常的茫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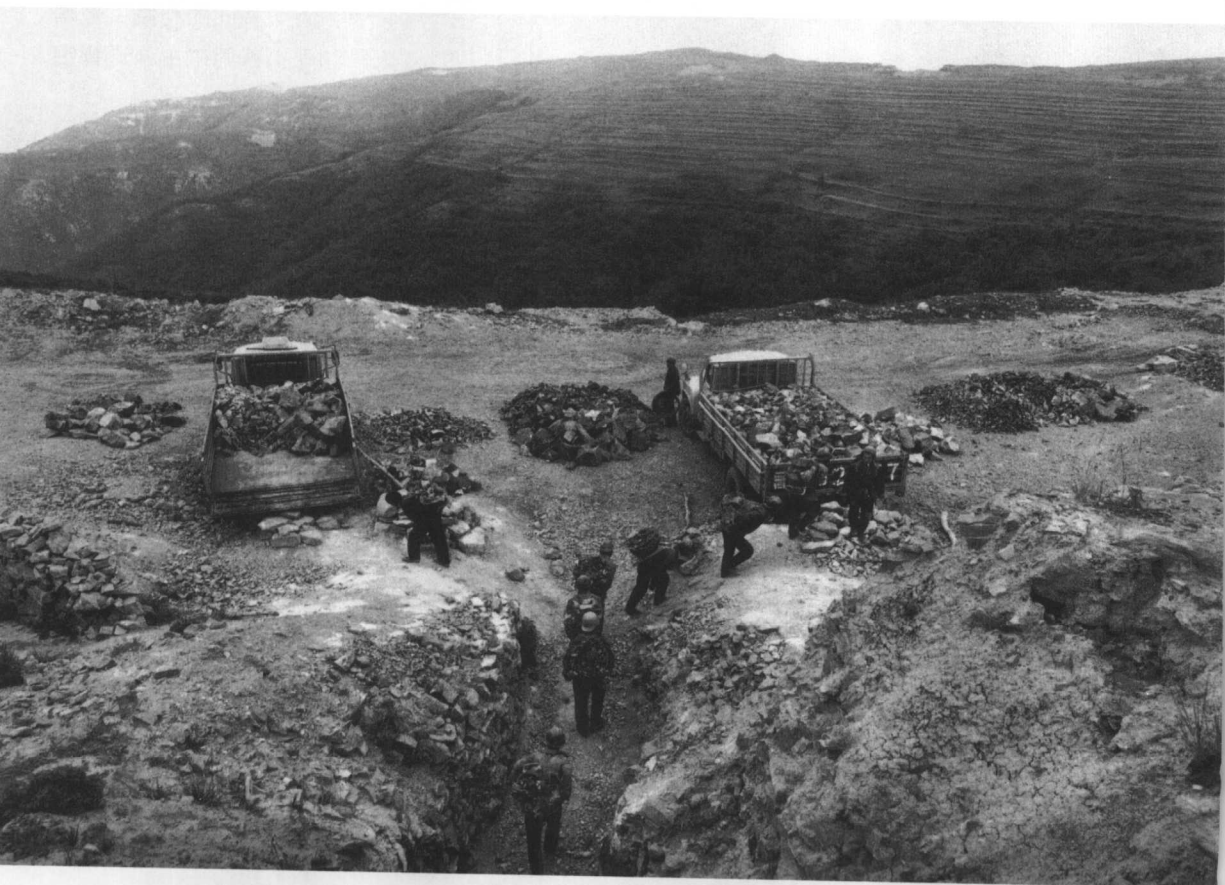
从铝矿石的收购来看，矿主、采购、司机都从中有利可图。宁武县铝钒土公司的公开收购价为65元1吨，而采购人员则以每车320元的价格给矿主（以每车5吨计算），矿主每车扣100元，剩余部分给背铝人。像私矿矿主杨万明这个矿每天平均走货6车，矿主净得600元。司机运输1吨为27元，车载重5吨，所得全部上交车管所，这样便无钱可赚。司机便超载多拉，由于铝矿石比重较大，为了共同的利益，采购人员和司机伙同矿主强迫背铝人将车装满10吨，从中获利。

背铝的队伍中还有许多未成年的孩子。

另外，由于私挖矿的条件所限，背铝人在无任何劳动保护的情况下采用原始的方法劳作，死伤现象时有发生。36岁的背铝人杨关明去年因矿顶坍塌死于非命。同时，矿内湿度大，温度低，大部分背铝人患有风湿性关节炎，骨节肿大变形，疼痛难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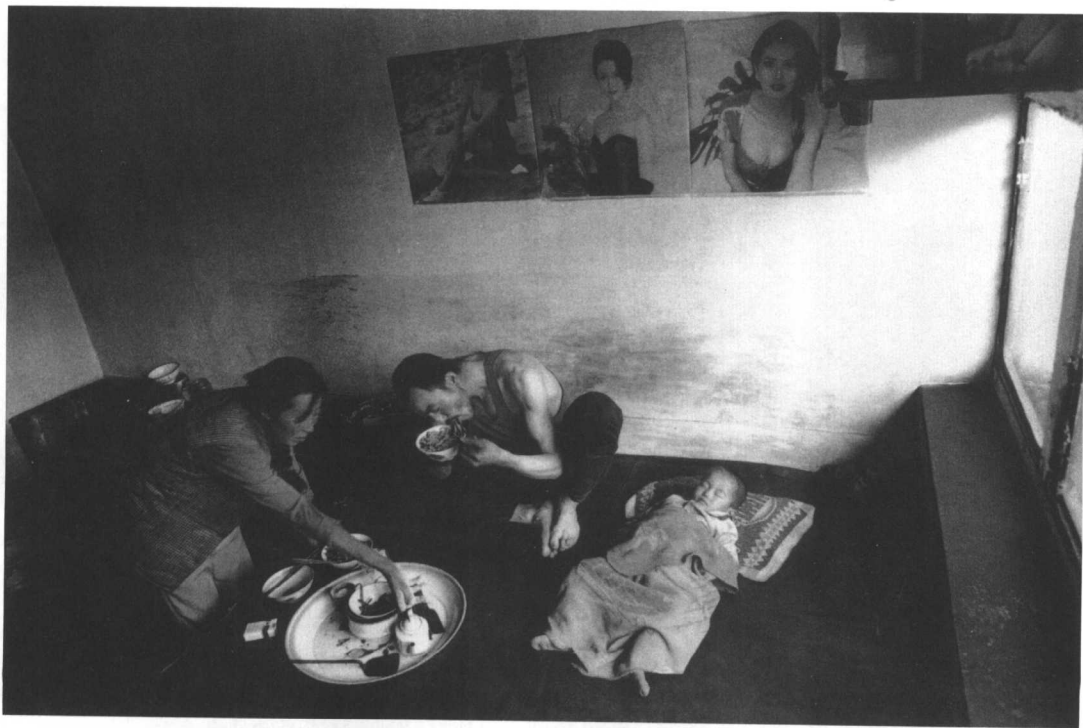
宽沟的私矿已开采十余年了，从现在来看，给人们带来的是惊喜、欢乐、实惠以及痛苦，从长远来看，无疑给国家及宽沟的子孙后代造成无法改正的错误。

私矿开采给矿藏及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杨喜林领到工钱之后，便买红糖给相依为命的母亲包月饼。



背铝后的经济收入给杨二林带来了和和美美的日子。



穷人

摄影 / 文 / 袁冬平

1994 - 199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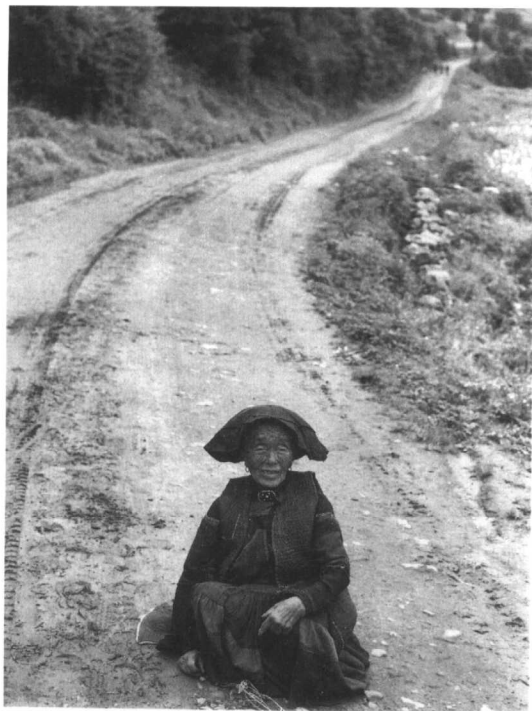
世界银行将年收入不足 500 美元的人列为穷人，而我国政府划定的贫困线为 500 元人民币（约合 60 美元）。也就是说，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总收入不足 1500 元人民币的，可以认为他们是穷人。

当穷人离我们还很远很远时，我们也许忽略了他们的存在，年轻一些的人甚至早已将“穷人”这个词遗忘。我也是在开始对贫困地区进行采访时，在我面对那些终年不得温饱的村民时，才突然意识到“穷人”这两个字的分量。

我见过的最穷的人家，住的是五面透风的房子，床上只有一大团烂棉絮，锅里煮的是野菜和玉米面糊糊，全部家当不值 50 块钱。我不知道这样的人家是不是很多，但据说这还不是最穷的。

因为没有条件看病，这位母亲刚刚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云南西盟佤族自治县。





穷人们几乎全都居住在生态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繁的地区，有些人甚至住在根本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恶劣的生存条件，使他们终年辛苦，得到的却是难以想像的贫穷。他们曾经幻想过富裕的生活，并为此奋斗过。但是长期的贫穷终于使他们彻底丧失了摆脱贫穷的信念和勇气，更失去了摆脱贫穷的能力。我在采访时曾问过很多人，包括当地学历最高的高中毕业生：你认为有什么办法能让你们不再受穷吗？回答几乎全都是“没有”！

老人家在泥泞的山间道路上行走，累了就坐下来休息。四川越西县申果庄。
1995年



过早的担负起家庭重担的孩子。宁夏西吉县田坪乡。



云南西盟佤族自治县翁嘎科乡的一户农家。

多少年前，当我们念着“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时，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今天，当我面对那些穷苦百姓时，我感到无言以对，有时甚至举不起并不沉重的相机。到2000年，我们国家将要消灭贫穷。要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但愿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将“穷人”这个词彻底忘掉。

西海固

提起西北，很多人都会联想到：干旱。的确，在我国西北的大部分地区，缺水问题一直困扰着当地的人们。1994年的7—8月间，我来到宁夏的西海固地区，西海固曾被列为我国最为贫穷的三西（河西、定西、西海固）地区之首，一度成为贫穷的代名词。这里土地贫瘠，人口稠密，尤以缺水最为典型。在缺水严重的地方，每家都要有自己的水窖。夏天引山上、路边的雨水灌到里面，冬天还要扫山沟里的积雪来补充：就是这种混杂有草根、树叶和牲口粪便的污水，成为当地人惟一的生活用水。由于水窖在生活中至关重要，因此水窖的多少和大小就被看成是一家贫富的重要标志。当地人在嫁闺女之前，都要先去看看那家人的水窖，水窖小了，就说明这家人穷，闺女嫁过去肯定是要受苦的。

西海固人穷，不仅缺水喝，吃不饱饭，烧的也极为缺乏。据专家测算，西海固每平方公里可养活30—60人。可西吉县每平方公里却有130人。人口多就要多开荒种地，又不懂得保护



斑驳的土墙上糊着各种各样的纸张，土炕上的草席已经破烂不堪，炕上的两个人因为极度的贫穷，眼神已经有些呆滞。这是宁夏固原县李栓子和李甲子叔侄俩，因为穷，都没有娶上媳妇。1994年

生态环境，有些地方砍光了树，刨光了树根，最后连草根也挖出来烧了。我们有个记者到西吉采访时，队长要烧碗水给他喝，水快开时，家里已经找不出一根柴可烧了。情急之下抓下头上的草帽塞进灶膛，才勉强烧开这碗水。

其实，就在若干年前，西吉还是有名的“粮仓”和“油盆”，那时全县8万人口，还算是个富裕的地方。如今西吉有40万人，地却还是那么多，于是就只好砍光了山头。

后来，西吉成为我国三北防护林工程上的重要一环，联合国和我国政府都在此投下巨资以营造防护林带。当时，望着满山苍翠的林木，负责此项工程的联合国专家得意地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工林。但是，几年之后我到西吉时就只看到山上造林的痕迹，林和树都已荡然无存了；当地人告诉我，植树造林在他们那里实际上是植“数”造“零”。还有人告诉我，他们那里是“春天种，秋天砍，冬天熬罐罐（罐罐茶）”。因此，西吉人就依然贫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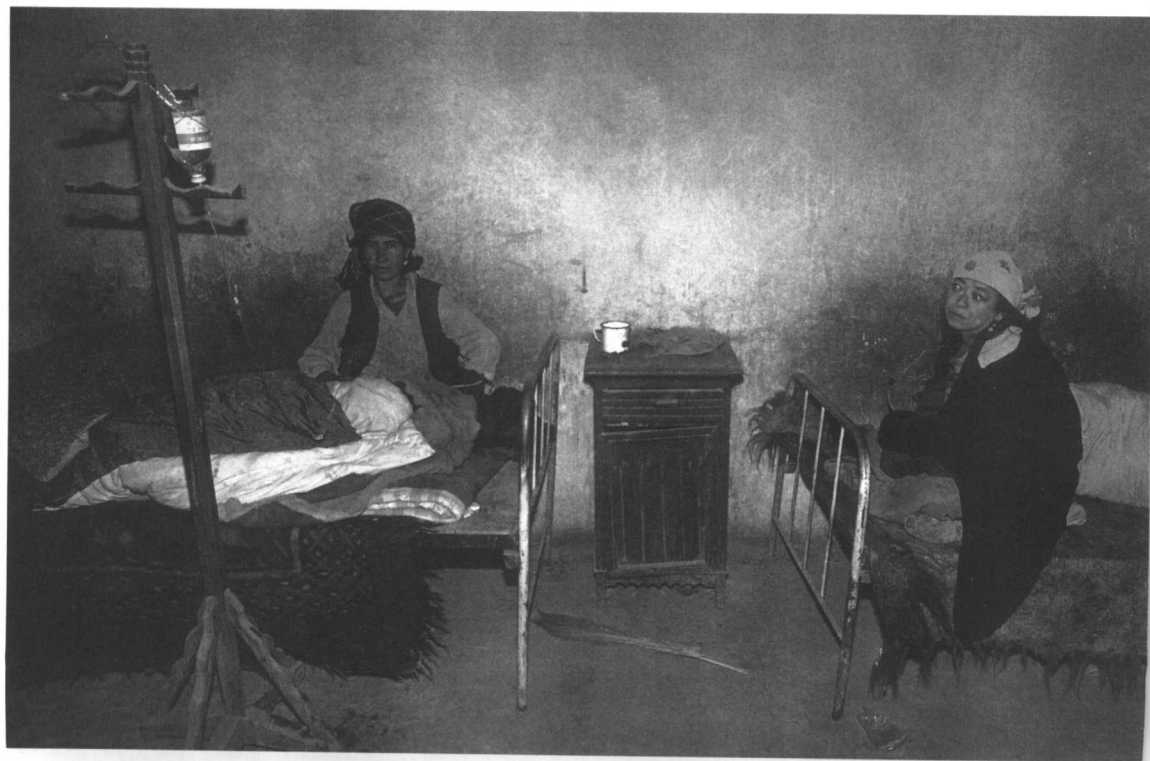
新疆·和田

新疆南部的和田地区，北靠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倚昆仑山脉，也属干旱地区，只是条件要稍好一点，尚有雪山融水可资灌溉。但水却是有限的，灌溉用水多，流向沙漠中的和田河和克里雅河的水量就要减少，河两岸及下游的大片胡杨林就会干死。在于田县，我曾沿克里雅河深入沙漠中二百多公里，在那里随处可见大片已经干死或正在干死的胡杨林。当地人认为，克里雅河正在逐年变短，和田河也只有在三四月份两个多月里才有水流到塔里木河。如果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少年，这两条河都有可能干涸。那时，塔克拉玛干沙漠就真的成为死亡之海了。

生活在塔克拉玛干南缘的主要是维吾尔族农民。他们生活中最大的问题还是饮水问题。由于和田地区很多地方的表层地下水都不能饮用，因此他们要在夏天将雪山融水引到“涝坝”(水塘)之中，以备冬春之需。一到秋天，大量的树叶落到水中，再加上饮水被牲畜粪便的污染，使涝坝水严重腐败，虫卵孳生，很多疾病便由此传播开来。我曾见过当地农民打上来的涝坝水，浑黄的水中还有许多小虫子游动，一想起他们要用这样的水煮茶做饭，真有些让人毛骨悚然。

好在地方政府和中央已经高度重视到这个问题，近几年来，每年都投巨资帮助当地打深井以解决饮水问题，希望不久的将来，南疆人饮用涝坝水将成历史。

在饮水成为极大问题的新疆皮山县，乡卫生院也没有完好的设施，因陋就简的卫生院里，病人要自己带着被褥和粮食来住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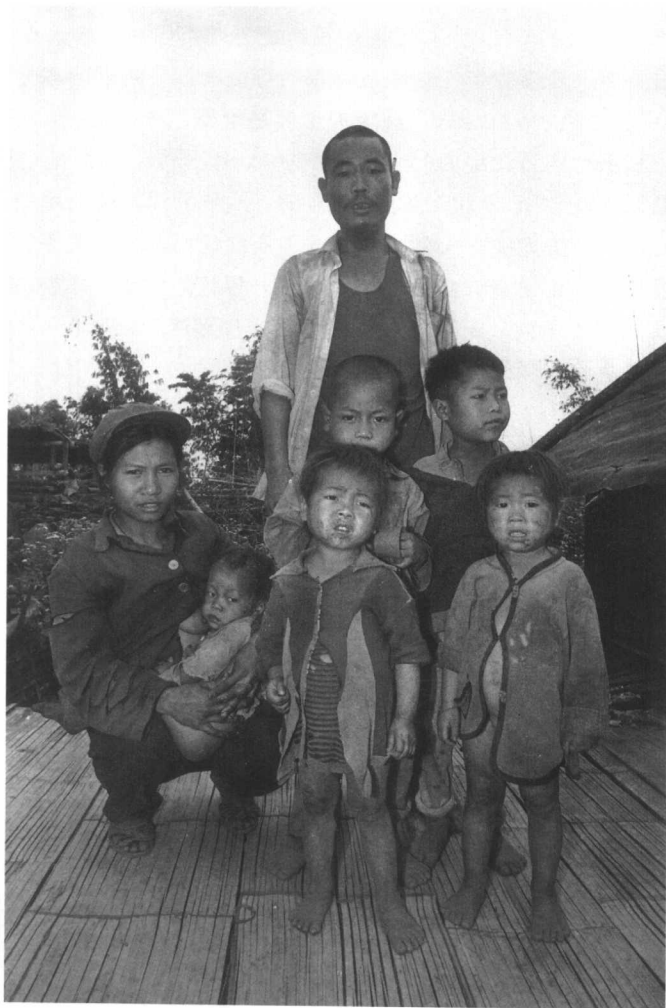
贵州、广西石山地区的贫困状况

在贵州、广西、云南交界的大片地区，是典型的石灰岩岩溶地貌，这里多山、多石头，极少平地。由于历朝历代的过量砍伐和开畦，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

贵州省的麻山地区，大致包括长顺、罗甸、紫云、望漠等县，正处在典型的石山区中，是我在采访中见到的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在那些四壁空空、五面透风的破草房里，我看到了一幕幕令人心酸的景象：蜷曲在破床上的孩子，身下只有一堆烂草；大年三十，老两口只煮了一锅野菜过年，十好几岁的大姑娘，穿着到处露肉的衣裳……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百色地区，情况也相仿。我在田东县作登乡平略村调查了一个二十多户人家的小自然村。尽管上一年是丰收年，但当地仍然没有一户粮食够吃。带我下乡的副乡长是平略人，他请我在他父母家吃午饭，端上桌来的是一锅玉米面粥和一碗盐水煮野菜，菜里没有油，更没有肉。还有一小碗不知该算菜还是该算饭的，是两个月前过年留下的糯米饭，染成红红绿绿的颜色放在桌子中间。桌上的人几乎都不去碰它，在盛邀之下我尝了两口，也不好意思再吃，于是又剩下了。

在下乡的途中，当地四五十岁的干部常会指着一座座光秃秃布满石头的山对我说：我小时候这山上全是大树，还有很多野兽，一个人都不敢往里面去。当我翻身到村寨去的时候，脚下的石头锋利有如刀刃。很显然，不久前这些石头一定是埋在土里的，是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它们新近暴露出来，尚未被磨去棱角。土冲走了，满山就只剩了石头。农民为



过多的孩子是造成家庭贫穷的重要原因。云南西盟岳宋乡的一户农家。

了生存，就只能在石头缝里种庄稼，在当地的许多地方，已经没有了土地面积的概念，土地是以播种量来计算的，因为他们种的地已经无法丈量。

我曾经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农民数遍了他的地发现少了一块，又数了一遍还是少，后来发现是他掉在地上的草帽正巧

盖住了那块地。这个故事有些夸张，但是很形象地说明了石山地区土地的散碎。我在山里见过的最小的地块和城里人家里的花盆差不多大小，只能种一棵玉米。那些石山上的农民，经年累月地奔波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土地之间辛勤劳作，然而却收获无几。土地稀少、贫瘠和靠天吃饭，是石山地区贫困的主要根源。

“穷人”这个词也许早已被许多人遗忘了。但是最新的统计告诉我们，全国目前（1998年）尚有700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国家规定，人均年收入不到500元的属于贫困人口。以人均年消耗粮食300公斤，每公斤粮食2元计算，500元只能勉强维持一人一年的口粮，更何况在许多贫困地区人均年收入只有两三百元，连维持生活都很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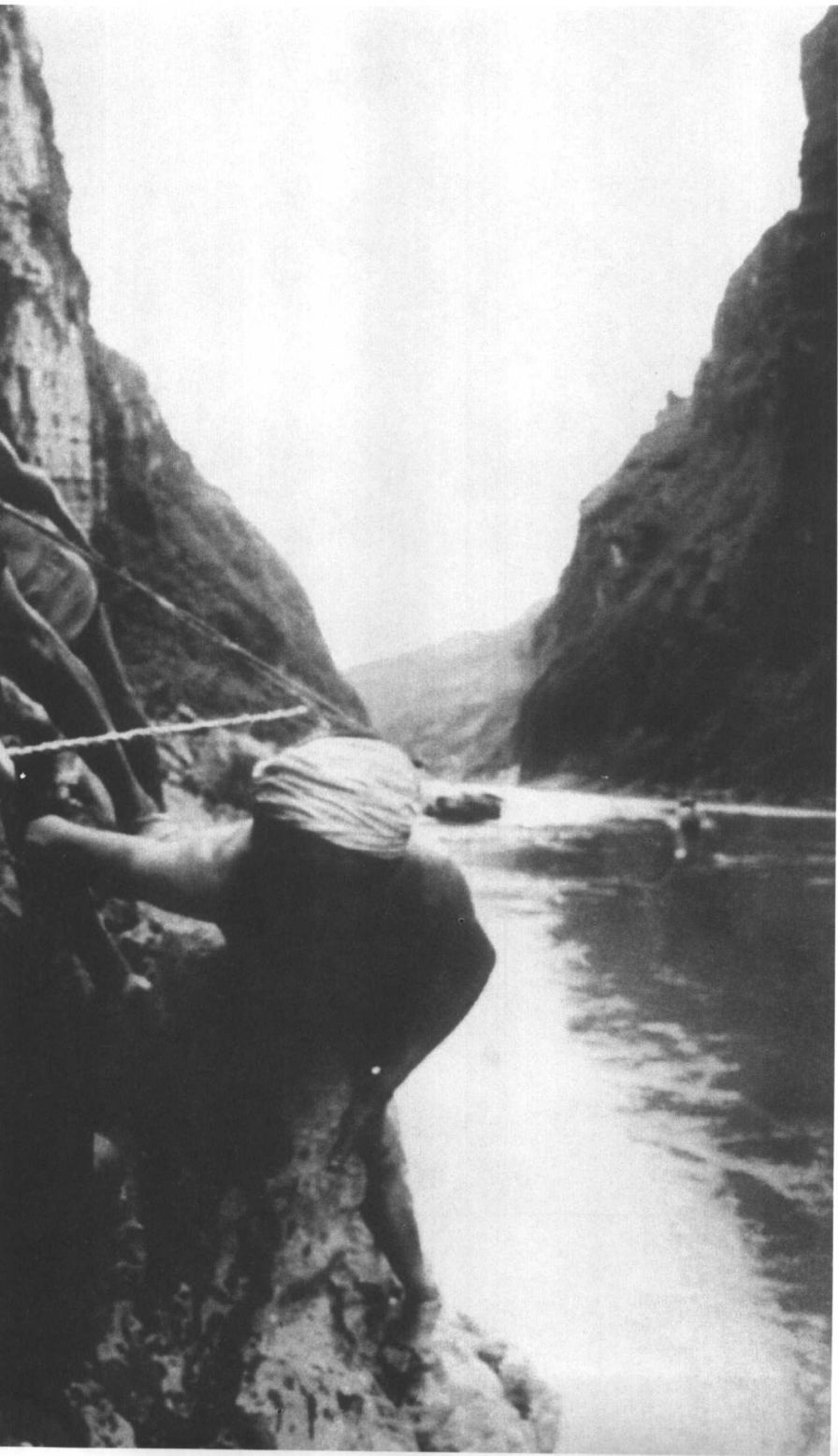
1994年年初，我开始对贫困地区进行摄影采访，

一年多走访了六七个省区的十几个贫困县，亲眼看到了那里的人们是如何在贫困中生活，很多景象令人震惊。这里刊出的照片便是他们生活的写照，当我把这组照片定名为穷人的时候，我真诚地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生活，帮助他们早日摆脱贫困。



由于即使过度劳累也不能摆脱的贫穷，人们过早地出现了衰老的状态。贵州罗甸县董王乡覃兴国一家和他们的住房。1994年





乌江纤夫

摄影 / 文 / 吴久灵

1998年

“吆来哟，吆哦，
嘿吆嘿嘿，嗨嘿，哟
哟，嘿嘿……。穿恶
浪，嘿安含，闯险滩
罗，嘿哟；兄弟们哟，
嘿哟嘿，斗劲来哟，
也含啦；妇人在炕
头，哟嘿哟，等我们
回哟；嘿嗨，生个儿
子，嗨嘿，考状元罗，
嘿哟……。也含哟。”

豆大的汗珠密
布在纤夫的古铜色
的身体上，痛苦的
脸上饱含着坚忍的
信念。作为第八代
的张氏族纤夫，他
们在祖先行走了近
两个世纪的乌江边
弄船。

在一个偶然的
机会,被纤夫的震天号子
所吸引,顺其声,寻其
影,见到使人惊叹的劳
动场面。乌江岸边那几
个赤身裸体的纤夫拉
着一只小木船正在土
坨子险滩上拼命地挣
扎,豆大的汗珠在他们
那古铜色的皮肤上流
淌着,铁钳般的粗手紧
紧地抠着石棱石缝,穿
着破烂草鞋的双脚总
是使劲地蹬着每一处
突兀的乱石棱,肩上的
纤绳深深地勒进肉里,
痛苦的脸上饱含着坚
忍的信心。他们喊出那
低沉的号子“上陡滩,
也含啦,口吐泡沫,也
含啦,眼勒翻,也含
啦”。一根纱不见的身
躯在嶙峋的乱石上贴
近石面地,用尽吃奶的
力气爬行着。船头上拿
爪竿和船尾撑梢的船
工在此时必须用爪竿
用力地撑着江边乱打,
竭尽全力支持岸上拉
船的同伙,同时必须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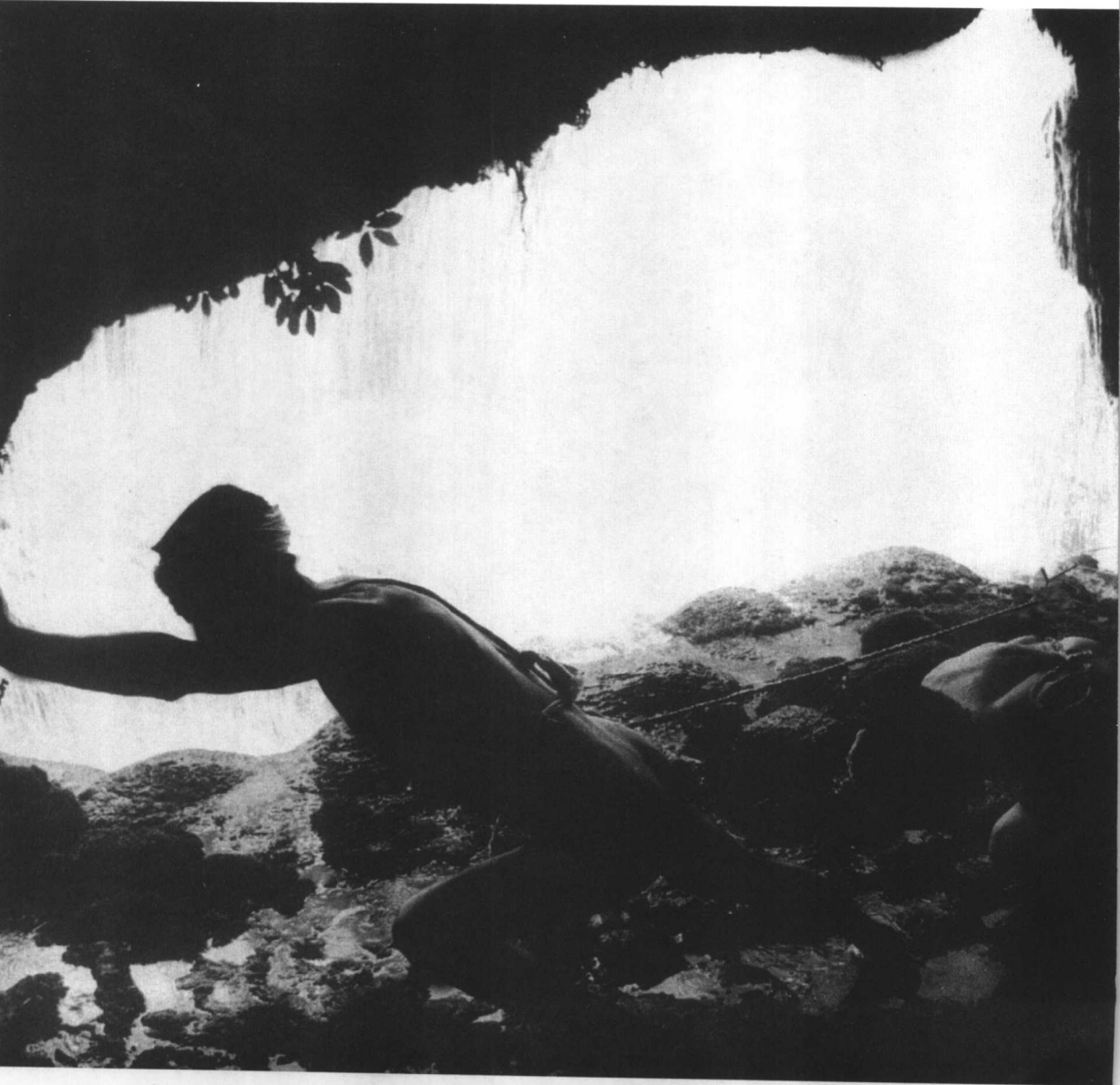
长满青苔的
天然栈道,纤夫
们更要小心。





制船的正确水道，否则船头偏向江心，急流的力量就会将船掀翻，并将岸上的纤夫拉入激流，造成船翻人亡的悲剧。此时他们必须彼此协作，一鼓作气地将船拉上险滩。大盘石上道道纤绳的磨迹，证实了乌江纤夫几个世纪的弄船史，展现出一幅真实感人、浑厚雄壮的局面。

水帘洞中拉船行进更加艰辛。



清澄湛蓝的乌江水倒映出笔直陡峭的两岸。纤夫们时而泅水，时而覆壁，他们的身体如猿猴一样跳动在岩壁上。有时一天就会遇上好几次这种情况，即使是寒冬腊月也得如此迂回跳跃。因此他们有了裸纤的习惯。若穿着衣服淌水，就像拖着一张渔网，不但使不上劲，也游不动，乌江水十分汹涌，加之水道极其复杂，这样就有生命危险。况且在大汗淋漓的同时是不能穿湿衣服劳动的，亦热亦冷更容易生病。因此裸纤是既原始、又适当的劳作方式。

这震荡峡谷的号子是来自重庆市酉刚土族自治县后坪乡聚宝村白丝坨的乌江边，这里住着一族从事拉纤运输的张姓人氏。老祖宗张思江在咸丰五年从贵州沿河县迁到这里，传到张家礼已是第七代。他们沿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刀耕火种的劳动方式，但他们辛勤的劳动并没能改变因自然环境所造成的贫穷落后。因为他们的祖辈来聚宝村较晚，附近较好的立足点和土地已被先来者占有，他们就只能在白丝坨半山的乱石堆上依山建起栖身的吊脚楼。在石缝中垦出的零星土地有的相距五六公里，当时都不能满足族里十余人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口的增长（现近60人），从一户增为十户，每户就只有近一亩地，更不能维持张氏族人的生活需要。张氏人曾在乌江对岸贵州省思渠镇买下几亩土地，但这几年被临近土地的农民一直强占耕种。加上他们交通和信息的闭塞，这诸多的原因迫使他们不得不从事弄船业，以维持生活的需要和白丝坨的发展。

白丝坨地处乌江的下游，大娄山脉东南麓和武陵山脉西北麓之间，海拔三百多米，属古生界的泥盆纪侏罗白垩系。上接黎志峡，下邻银童子峡。上下近50公里的河段，有七里滩、龚滩、新滩等25个险滩。在没有机械动力之前，每次行船，集中数十人乃至百余人联合作业，互助拉纤，否则难以越滩。尤其是龚滩比降高达30%，流速每秒6—7米，无论上下船运物资必须在此重新装卸搬滩，因此被人们称为“断航滩”。解放前，这短短几十公里的河段，曾吞没了无数张氏弄船人的生命，白丝坨后山上堆堆土坟控诉着激流险滩的无情和世道的险恶。新中国成立后，经政府多次对这段河道的清理整治（炸礁，爆滩达98424立方米），于1960年后，用机动船代替了以人为动力的歪屁股木船的乌江长途运输，白丝坨弄船人才有了新的生活希望。在本应由机械动力完全替代人为动力的今天，张氏人迫于土地的贫瘠，人多地少（人均地不足三分，年产粗细粮不足200公斤），又无公路、电力、通讯的情况下，主要靠弄船（短途运输）所谋报酬来交纳国粮国税，维持生产生活和下一代的求学费用。



张氏家族人出门便是大山，弄船便是险滩，买盐巴都要走几公里山路，喝口凉水还得到山下乌江去背。学生上学需翻山越岭，走崎岖山路十多公里。小学上午10时至下午4时不间断地上课，中学以上学生只得住校，生活需从家中带去柴火、油盐、米及咸菜、干菜，极少吃新鲜蔬菜。他们自己动手在三块石头搭成的灶上每日煮两餐，睡在木板搭成的床上，垫些乱谷草和一张竹席，盖一床薄薄的被子度过一个个严冬，煤油灯伴他们早晚自习，条件非常艰苦。

十户张氏家族人世世代代、祖祖辈辈劳作不止，生活在乱石缝中木棒支撑的吊脚楼里。男子下河做纤夫，妇女在山路上做脚夫。他们需长年累月地肩挑背扛，勤爬苦挣，才能勉强维持家庭的生活。他们特别节约，主食玉米、红苕，少量大米（主要用于过节、待客），为防淡季吃菜困难，他们有做盐菜、干菜，脆制罐罐菜、鲢辣椒、酸豇豆、酸茄子、干四季豆、腌鱼的习惯，来客吃“莲渣涝”（没经滤渣的豆腐）、“糊海椒拌野葱”。他们祭祀祖宗必须备酒，农忙、弄船、赶场等都要喝酒，因此他们都自制白酒和煮水酒。有的还用红苕熬成糖水，倒入装有苞谷煮成的水酒的罐里。放至次年的三四月农忙时食用，俗称“麻糖水”。生活用水是用高约一米，口大于底的堰桶到乌江边去背，一桶装水约60公斤。还有吃新的习惯，如麦子黄（成熟）要做新麦粩，荞子黄要推“豆花荞面”，豆子黄要磨“菜豆腐”，推“浑浆豆腐”，谷子黄要吃新米和打糍粩。他们的父辈都喜穿粗布长衫，包青布帕子，穿对襟衣服和用白布做裤腰，裤筒大而短的下装。喜穿草鞋、布鞋、钉鞋，棉鞋，小孩戴“冬瓜帽”或“狗头帽”。妇女普遍穿衣宽袖大的齐膝便衣，着中裤，围围腰，扎青头绳，包青布帕。姑娘围花裙子，用红头绳扎长辮。

他们修建新房，对破土开工、上梁、钉大门等都要择吉日良辰。

弄船人男婚女嫁亦讲究“门当户对”，一般开亲联姻，先由男方托媒到女方家求亲，征得女方父母基本同意后，再由媒婆带领未



乌江沿岸乱石峥嵘，曾磨破纤夫脚上无数的草鞋。

婚女婿及其生庚年日，礼到女家递“书子”定婚。此后，男方每年春节到女家拜年，男方要求结婚时须得女方同意，再备礼品和用红纸书写的“庚贴”，由媒人带着至女家“请庚”。接着择定娶亲佳期，于次年“端午”节带着礼品到女家送“年日”，此后各筹嫁娶。婚前半月，新娘要哭嫁，先哭父母、哥嫂、弟妹，再哭亲朋，母亲、嫂子要陪哭。自开哭天起，全寨姑娘一直陪伴至婚期。除家人外，大多送钱给哭者（新娘），俗称“眼泪水”钱。婚前一日，新娘“开脸”，即用棉线拔汗毛，并将眉毛拔成一钩新月，梳“粑粑髻”、缠红头绳、插银簪、银撇、包青丝帕。

婚前三日，男方派人送酒、米、肉到女家。婚前一日，男方派迎亲队伍，携彩礼往女家迎亲。领队人至女家门前时，要说“四言八句”，行“拦门礼”和进堂屋行“奠雁礼”。新娘出亲，要举行“辞堂礼”，至男家与新郎拜天地，入洞房吃“交杯酒”。宴宾前，新郎、新娘“出拜”，男方亲戚送“拜钱”。“送亲客”走时，由新郎放鞭炮送程，“送亲客”送钱给新郎，并给新郎挂红绢，名为“挂红”。当晚，寨上青年“闹新房”。婚后第三日，新郎伴新娘备礼“回娘家”，敬拜岳父、岳母，名为“回门”。有的女方无兄弟，男方兄弟众多，无力娶妻，便“男嫁女娶”，男到女家与父母共同生活，礼仪与男婚女嫁相同。

张氏拉纤族弄船已近两个世纪，为了家乡父老的油盐柴米、婚丧嫁娶，历尽艰辛，曾留下斑斑血迹的乌江峡谷却没能使他们致富。尽管他们也知道交通、信息闭塞，已做过多方面改变白丝坨的努力，但仍然不能摆脱人均不足三分地和年收粮不足200公斤的贫困现状。他们无奈地重复着固有的生活模式，不停地砍伐沿江两岸悬崖上的天然树木、竹林。长年的砍伐，致使两岸已没了“岭树从遮千里目”的秀丽画廊，只留下“江流曲似九曲肠”的峡堰险滩。他们为了生存，只能向大自然索取，好像那段河流，那段峡谷只是属于他们的。如此原始的劳作方式，如此挣钱的途径，这一切与现代文明相违的行为，难道只能责怪这里的拉纤人吗？不，那里方圆数十里没有一所像样的学校，没有一条像样的路，谈何跟上时代步伐的文化、娱乐、教育、科技！光靠拉纤人自己，何时才能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写到这里，我从心底呼唤，帮帮他们吧！历史的纤绳落到了全社会人们的肩上，让我们把这些贫穷落后的拉纤同胞拉出困境。

小煤窑记忆

摄影 / 文 / 吴东俊 1994—2001 年

小煤窑在我的记忆中，追溯起来断断续续已经有近十年的历史。

那是1991年初冬，我随单位的治安工作组到贵州与广西交界的黔南州荔波县境内、一个叫水捞煤矿的矿区一带检查炸药被盗情况。在那个地方，漫山遍野都在挖煤，大大小小的煤洞可能有近百个，整个山脊简直就是百孔千疮。在煤矿的中心地带，有一条繁华的小街，人员十分嘈杂。由于矿区特定的环境因素，小街一片泥泞、环境十分肮脏。从那以后，小煤窑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另一种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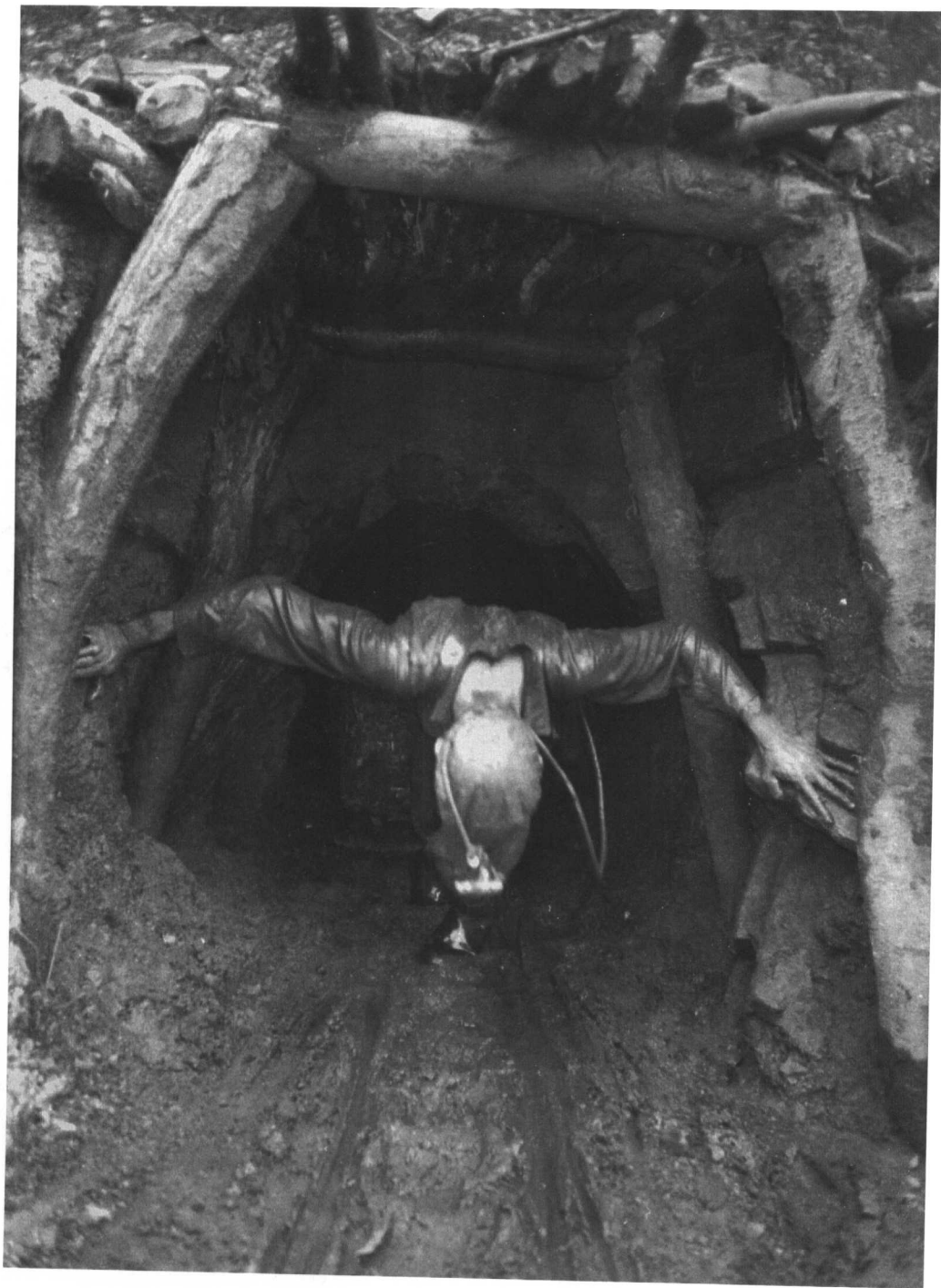
出生在小煤窑的儿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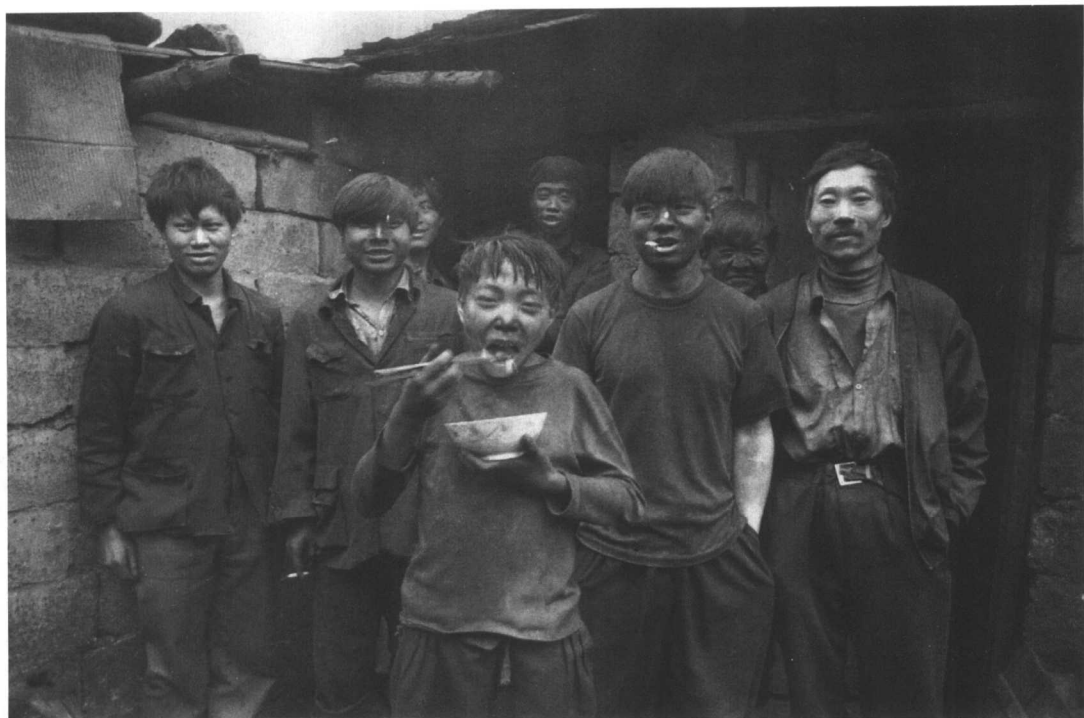


每拉一船煤，民工都要使出浑身解数。

不过，当初对小煤窑开采给环境带来的恶化、在我的心中并没有引起足够的认识，只有异常繁华的小街上人们在光天化日之下聚众赌博、流动人口超生等社会治安现象触动了我的职业思维。后来，我在审视从小煤窑上拍下来的这些照片时，突然意识到小煤窑上真正的问题，是由于乱开滥采使国家大量矿产资源遭到破坏，生态环境走向恶化。于是我很想再次前往那些煤山，但由于水捞煤矿距贵阳有三四百公里，直到1994年10月我才忙中抽闲再次来到这个煤矿。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在贵阳市郊又目击了很多小煤窑，他们不计后果地乱开滥采现状，与几百公里以外大山深处的小煤窑并没有两样，他们从开采到运煤方式完全是一种十分原始的方法，很多煤洞十分低矮，他们往往匍匐进去，洞内潮湿甚至有的地方被水半淹，在整个开采作业过程中，简直就是一个黑乎乎的泥人，让人感到怜悯和同情。但他们都在以破坏和牺牲众人赖以生存的环境而使自己获得眼前的一点点利益而为老板卖命。于是，我数次进入这些矿区记录小煤窑的丑恶。一次，我们到花溪久安乡一小煤窑采访，煤老板因证照不全心虚，怕我们记录他的煤矿现状，遮挡我们的镜头，为此我们还发生了一场小小的纠纷。此事过去了两个月，当我



一根根粗糙的圆木支撑着矿道，通往黑暗的矿井，就像是通向地狱的通道。矿工们每次从矿井中爬出来都像一场劫后余生。在边远的地区，非法小煤窑能用树木支撑矿井和矿道已经算是安全的了。



住在小煤窑附近的矿工。

们再次来到这个煤矿时，却是人去山空，小煤窑外却是一片严重污染的狼藉环境。在贵阳市阿哈水库、红枫湖水库附近和水源上游，许多小煤窑一度乱开滥采严重破坏了这一带的生态环境，黄水横流，不同程度地污染了这些水库的水质和农田。为此，我们多次呼吁有关部门制止小煤窑乱开滥采。后来，随着小煤窑问题的日趋突出，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再加事故频频发生，遇难民工付出了生命代价又将长痛留给后人，影响一方社会安定，有关部门逐渐加予重视。但由于利用小煤窑生财的人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往往小煤窑有的封而不死、有的死灰复燃。小煤窑证照不齐、非法开采的现象顽固同神话一般巧妙地生存着。于是，政府每年都得花费很大的人力财力整治。

小煤窑间接给人们带来的灾害是多种多样的。在平坝县乐平乡莲花塘村20多户人家，门前都有一个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监制字样的救灾帐篷，记者实地采访，得知该村山脚因许多小煤窑的开采，导致半山的民居地面塌陷、墙壁开裂，人们近几年来一直依赖帐篷生活在惶惶不安之中。在大方县城郊，小煤窑的乱开滥采可能导致县城滑坡，小煤窑如同蚁穴威胁着人们的安全，县里组建综合执法队，多次对小煤窑进行关闭和封炸。贵阳市花溪区是一个拥有丰富旅游资源的县区，小煤窑的开采使他们认识到了得不偿失，于是花大力气对辖区产煤乡镇的小煤窑进行大手术，到2001年7月底，该区关闭与封炸了年产量不足三万吨的小煤窑103个。在关闭封炸工作中，政府积极对关闭和封炸的小煤窑酌情给予经济补贴。据介绍他们对封炸的小煤窑平均每个发放5000元的补贴标准，此项治理拨出补贴款就达51.5万元，一场动真

格的整治小煤窑行动让人们看到了不久会更加美丽的青山绿水的影子。

小煤窑的乱开滥采确实弊多利少,它使我们惦念和牵挂如同雕塑一般的苦役民工的健康与生存处境,更使我们忧虑一代人的野蛮开采给几代人带来痛苦又难以挽回的损失。我希望我对小煤窑的记忆,将成为过去,不复再现……



煤窑所有的设施都是因陋就简,矿工只能在简陋的窝棚下互相搓澡。



民工们的生活环境令人堪忧。



由于地处偏远，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要将煤运送出大山，只能采取这种原始的运煤方式。

西部买妻

摄影 / 文 / 马宏杰 2000—2001 年

正民在家排行老三，3岁时得过小儿麻痹病，左手和左腿留下了行动不便的残疾。从他十八九岁的时候起，母亲就开始给他物色媳妇，我也是从那时开始跟着他到农村去拍照片，没想到这一拍就是十几年，走了无数的村庄，见过的姑娘不少于“一排”，花了数万元的积蓄。1998年离村子不远的乡村中有人给老三介绍了一个从小得过脑膜炎、留有后遗症的憨姑娘，哪想到这位憨媳妇就是不和他同床睡觉，用了各种方法也不见效，在结婚满一年的时候，老三终于提出了离婚，一段不幸的婚姻到此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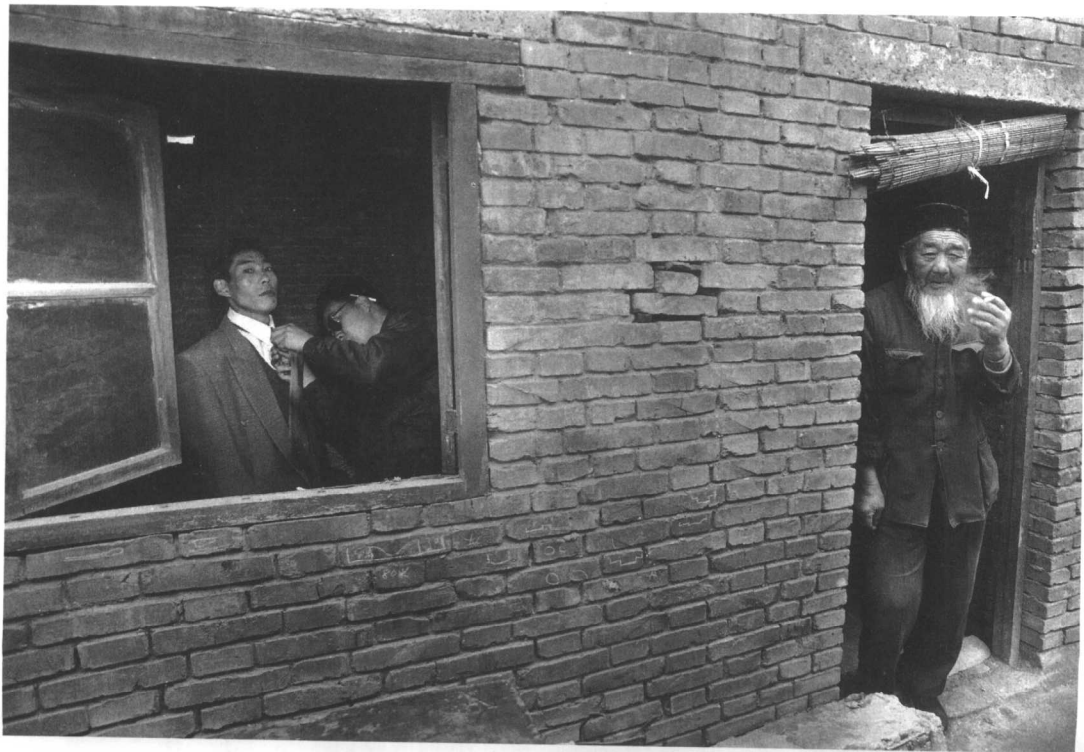
第一次娶亲，老三娶的憨媳妇不和他上床睡觉，老三很是无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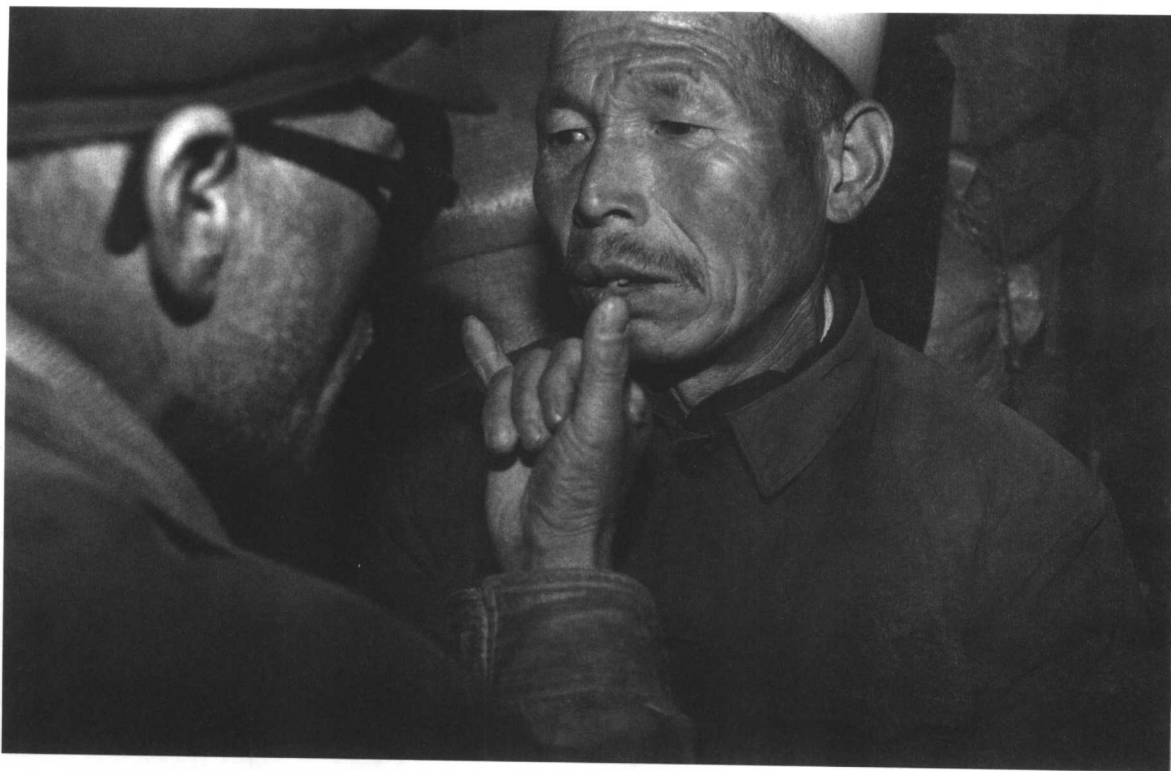


2000年的一天，一位从宁夏嫁到洛阳新安县乡村的媳妇再次给老三当起了媒人，说只要肯花钱，保证给老三娶个媳妇回来，已经60多岁的母亲动了心。于是由当地媒人领着先后3次前往宁夏招媳妇。由于我的特殊关系，得以贴近拍摄到了婚姻也是一个残疾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看到了另一层面人的生存方式，看到了心酸、无奈、幸福、渴望及改变命运的方式。

2000年11月1日下午3时30分，我们一行5人登上了上海至银川的1397次列车。经过16个小时的旅途，早上7时我们到达宁夏的固原县。固原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是宁夏西海固的一个组成部分（西吉、固原、海原统称西海固地区）。我们中午时分终于到了大湾乡绿塬村媒人的娘家。下午我跟着媒婆和她妈妈带着老三前往10公里外的女方家去相亲，女方年方18，也是一个从未上过学的女孩子，家境贫寒。二位媒婆忙着向她的父母介绍男方的情况，是媒不是媒，全靠媒婆的嘴，经简单的相互认识，女方父母同意了这门亲事，约好第二天来谈价格。但是由于彩礼价格原因和在付钱方式上双方有很大的差异，我们虽然几经周折，这门亲事还是没有成功。

准备相亲的老三整装待发。





为多少彩礼钱的问题讨价还价：再加600元怎样？

之后我们便和老三转到开城乡，几天之内先后见了几个年龄从16岁到18岁的当地姑娘均告失败，人家媒人都说老三的命硬不好找。9月17日已经是第8天了，眼看事情一个个都黄了，便和老三踏着大雪赶回了固原县，乘两点钟的火车返回了洛阳，第二次招亲失败而归，花费2000多元。

2001年2月4日，立春，这次老母亲不顾自己的年老体弱，带着老三和本地的一个媒婆第3次前往固原县，发誓这次一定要把媳妇娶回来，固原这次接应的媒人是媒婆的兄弟，2月12日，老三打来电话说，媳妇已经基本说成，如要拍照片最好快来，并且请他嫂子一起去，准备接媳妇回家。

2001年2月13日我和老三的嫂子第3次登上了北上的1379次列车，下午两点我们才匆匆赶到了这个名叫大疙瘩的村庄，一进村就看到老母亲在村口焦急地张望，当我们的车停在她的身边，看到我们时她泪流满面，哇哇大哭，哭着说：“又不行了，给人家掏了1万5千块钱，人家还不答应，你看这可怎么办哩？上来3次了都没把媳妇娶回来，回去了村里人说起闲话来多丢人哪。”

第二天一早老三和嫂子便将当地的几个媒人统统赶走，下午两点钟又将疲惫不堪的老人送上了火车让她先回洛阳，我们又回到了开城村，到媒婆的妹妹家想再做最后一次努力。我们在这个人家住了3天，等待着周围媒人为老三介绍媳妇。



香玲的哥哥在数彩礼钱。



香玲的母亲在哭送女儿。



在媒人禹全得介绍下老三终于把媳妇娶回家。在跟老三回家的途中，香玲第一次见到火车时的情景。

这种来宁夏招妻的现象，十几年前，甚至更早就有，自然条件好的地方有很多人前来这里招妻，他们多是在当地找媳妇有困难的残疾人，年龄大的、相貌丑的或着是二婚、三婚的。这里的姑娘多嫁到河北、河南、山东、内蒙、天津、北京等地。人的生命有时就像一粒种子，随风飘落在什么地方都得生根发芽成长，哪怕这种生长有时是扭曲着的。恶劣生存环境中的人们想要改变生存条件，惟一选择就是迁移到自然条件好的地方去，现在还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理想地做到，所以对这里的姑娘来说远嫁就是惟一的出路。家里既得到了经济补偿，自己又改变了生存环境，应该说是件好事。对男人们来说，挣钱娶媳妇成家传宗接代是天经地义的事。挣扎在贫困边缘的人，他们会抓住每一个到来的希望。



香玲刚到婆家时
尽心侍候丈夫。

这种希望有时是不能用正常的伦理道德去衡量的。

2月16日媒人跑了一天，带来的姑娘都看中老三，看来是山穷水尽了，老三很失落。回家后的老人打来电话说曾经有涇源县新民乡的3个人要饭到洛阳时，老人曾招待过他们，他们也答应老人为老三在当地找个媳妇，现在他们回信说让去找他们并留了电话，于是当天便和涇源县的媒人禹全得取得联系，他说没有问题，请我们尽快赶到他那里。

等到9点多，第一个媒人准确说应叫媒汉禹全得才来和我们接头，禹全得在当地就是以说媒为收入的人，在当地如果说一个媒，媒人的收入一般可得酬金600元左右，对当地人来说一年如能说成几次媒，在当地也算是高收入者了。我们跟禹全得到了姑

娘家，见到了这位上过一年小学年方19岁的姑娘禹香玲。香玲家中一贫如洗。香玲和老三见面半小时后便同意了这门婚事，之后便是大人们商量着要多少彩礼钱的问题。香玲他爸开口要1万3千元，而老三与嫂子压到1万1千元成交。

2月21日早晨，老三带着他的媳妇回到了家中，22日家中宴请宾客。

4月份，村中又有一位无双臂的男孩从宁夏固原县开城乡带回了一位姑娘成了亲，对姑娘来说生存环境的改变将会使她摆脱恶劣贫穷的生活，对男方来说娶到了媳妇，生活和幸福虽付出了金钱，但毕竟是他们完整生活的开始。近日，新民乡香玲的父亲又打来电话说那里还有两位姑娘想远嫁到这里，请老三尽快帮她们联系愿意娶亲的人家。

“我要生存，我要吃饭”的标语前，香玲和丈夫一起下地干活。



父亲为儿筹学费

摄影 / 黄一鸣 海南 1992年

照片上孩子的父亲低头拉着一车扫帚，细细的轆绳勒进了他的肩膀，孩子还小，正趴在车尾，小脑袋好奇地四处张望，镇上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的，而满车的扫帚就是父亲为他日夜辛苦编织筹措的学费，如果扫帚在镇上卖得好，父亲的心也许会轻松许多。

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农村尤其是边远地区的农村，孩子一到快上学的年龄，做父母的就开始着急，因为学费实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父母们没有什么钱，他们需要交的钱也太多。而这位拉着扫帚车的父亲，他佝偻的背影已显示了他跋涉的疲惫，不谙世事的孩子长大后也许会理解父亲的一片苦心。

焦急的父亲拉着扫帚到镇上出售，期望能为年幼的孩子顺利付清学费。



木桶里的童年

摄影 / 徐晋燕 云南 1990年

头戴草帽的农户用挑水的木桶，晃晃悠悠担着自己的一对儿女走在密密的甘蔗林旁，这样带有田园牧歌式的快乐场景，城市的孩子们是根本享受不到的，乡下孩子快乐的方式和城里的孩子大不一样了。对城里的孩子来说，扁担、木桶、甘蔗林是何其遥远的事情啊。

当然，画面同时也向我们传递了边远乡下一种质朴悠游的父亲形象，而照片上这种照料孩子的方法对孩子无疑有着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云南开远至弥勒一带的路边，有密密的甘蔗林。路上有一位农户，肩挑着自己的一对儿女。城里的父母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挑水用的木桶，也能成为儿女们的摇篮。





虽然条件极其艰苦，仍然要简单地洗个澡。矿工的身后，是刚从简陋而危险的矿洞里爬出来的矿工。

洗澡的小煤窑矿工

摄影 / 徐晋燕 云南 1991年

一盆浑水，一个凉水澡，四周众人熟视无睹的打量，画面上身处边远小煤窑上的矿工，对生存底线的要求显然比平常人已降格了许多，为了生存，他们别无选择。洗澡矿工的左边，一个背煤人在吃力地撑着身体走出狭窄黢黑的井口（工作环境的恶劣由此可见一斑），在他俩中间则站着一个即将下井的浑身煤污的背煤人，在工友爬出井口之前，他还能背着空篓再歇息片刻。

云南的东北部产煤，分布广、煤质好、开采容易且方便，向来被称为燃料基地。靠山吃山，有煤就挖煤，煤矿是这里最常见的产业。除国有的煤矿外，这里还有许多集体和个体开采的小煤窑，工作的环境简陋得令人吃惊。矿工们大部分是来自昭通、会泽一带的贫苦农民，为生活所迫，不得已从事了这项危险的职业。

乡村邮递员

摄影 / 江浩 山东济南 2001 年

画面上乡邮员赵言军正扛着车护着邮件过小溪，绿色的大28型邮政车和他脚下的布鞋每天陪他越过大山、玉米地和小溪，走村串户，每天行程百余里，不管是狂风暴雨，还是冰天雪地，从不停班……他已把自己全部交给了邮路和邮路上的乡亲们。

乡邮员是份苦差事。十多年了每天麻麻亮，赵言军就从村里骑车20多公里到县局，装好70多斤重的邮件，然后赶那40多公里的路。通常一封信因主人不在家，投递四五次是常事；大雨瓢泼而下时，用雨衣赶紧护住邮包，他淋得落汤鸡一样也是家常便饭……在大山里，大部分青壮年出去打工了，家里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小孩，有些地方不通公路、不通广播、不通电话，邮政成了联系山里与山外的惟一方式，有时过年往家寄钱的汇款单一天就有450多件，在这条乡邮路上，赵言军已不仅仅是一个乡邮员，而是一所流动的“活邮局”。

乡邮员赵言军扛着车护着邮件过小溪。在边远的山区，邮递员对这种泥泞的道路已经习以为常。



在偏僻的秦岭
和大巴山区，因为正
规的牙医所很少，离
城市的医院又遥远，
因而，百姓的牙病，
向来由江湖游医诊
治。图为陕西省勉县
阳平关火车站外的
“露天”牙医所。



“露天”牙医所

摄影 / 石宝琇 陕西勉县 1984年

照片上这位可怜的老人为了忍受无麻醉钻牙的剧痛，双手紧抓椅手和拐杖，痛苦地呻吟让老人身后不远处的少年下意识里把他握紧的右拳抵住了嘴巴，这就是陕西省勉县阳平关火车站外“露天”牙医的一个“诊疗”镜头，整个画面虽然阒静无声，但痛苦的呻吟仿佛镌入了观者的内心。据卫生部门统计，光顾江湖牙医的患者大部分是老年人。老年人的牙口大多不好，有些为了节俭度日，于是就投奔到了江湖牙医的门下。

湖边玩耍的牧童

摄影 / 徐晋燕 云南曲靖 1992年

牧童正和温顺的水牛嬉戏在蓝天草地间，孩子们把自己放牧的水牛当做了玩耍的道具，开阔松软满是野花的草地成为了他们欢腾跳跃的天然大地毯。相比之下他们虽和城里的孩子有着不同的人生，但在获得更多的快乐方面，他们用很简单的方式就可以达到，这是不是也是另一种“牧童式的幸福”？

城里孩子在上学之余，家长们往往会领着他们学琴、学画画等等，而牧童在课余之外的（但愿不是在学堂外）练习便是玩耍于大自然，大自然是他们最好的老师，孩子们炽热的少年梦想也总愿与它静然分享。



云南曲靖花山湖，是一个很大很美的水库。只要湖中有水，湖畔就会有草，水美草丰，就成了牧童们喜欢的地方。只要赶着牛儿到湖边，牧童们就可以由着性子地玩耍了，悲喜悠游，一派天真。



如果非要套用地理概念，那么边缘一定是边远到中心的一段过渡空间，
这个空间当然挤满了正在过渡的人群。

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边缘是一种生活方式，
人们可以自愿或者不得不选择在主流社会之外的游离。

地下室的风景

摄影 / 文 / 庄健 北京 2000 年

北京有很多地下室公寓，我住的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也是深入地下几米深，很厚的大门，没有阳光，床位比较便宜。这里是由过去的人防工程改建的，全部的钢筋混凝土，非常结实。有人笑称：一旦发生战争我们这里最安全。

每天都会有人来，有人走，下一次的聚会又会换上许多新的面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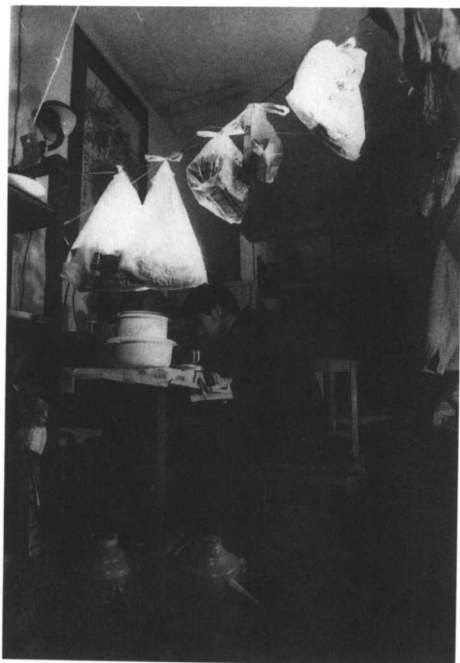




从他们的生活中，可以看到他们对未来的期望。



进入地下室你就会闻到一种强烈的霉味，因为里面通风很差。以前有一套通风设备，可因年久已经坏了。地下室里共有几十间房子，其中有两间厕所、一间水房、一间浴室，剩下的房子住人，这里的卫生并不太糟，公共走廊每天都会由专人打扫一次。如果避开高峰期，你去水房和厕所是不用排队的。浴室只有一间，那么只好分开了，星期一、三、五、日女生洗澡，二、四、六归男生，因为女生比我们爱干净，多排一天，我们也不计较。当然啦，洗澡不是免费的。这里最难忍受的是虫子老鼠太多，由于阴暗、潮湿，成了虫子滋生的温床。其中最讨厌的是蟑螂，它无孔不入，钻入每个角落，食品只要放在外面一会儿就会被它污染，对付它的惟一办法就是把塑料袋扎紧，挂在晾衣绳上。这成为地下室一景，每间屋子都挂满了塑料袋，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经常是你打开袋子后，就会发现已经有一两只蟑螂在和你共享食品了。每间屋子的面积都在十平方米左右，分别住着6到8个人，加上一张桌子，剩下的空间刚好够一个人转身。这里地下室中有近1/3的房间有窗户，窗户离地面有2米，起不到一点采光的作用。中午阳光最强的时候，在这里还是伸手不见五指。这使你在这里什么时候都分不清白天黑夜。由于地下室是无线电信号的盲区，就是说这里不可以听广播、看电视、打



由于蟑螂太多，所有能够食用的东西全都要挂在绳子上。

无线电话、接收传呼，下到里面就隔绝了现代社会的一切信息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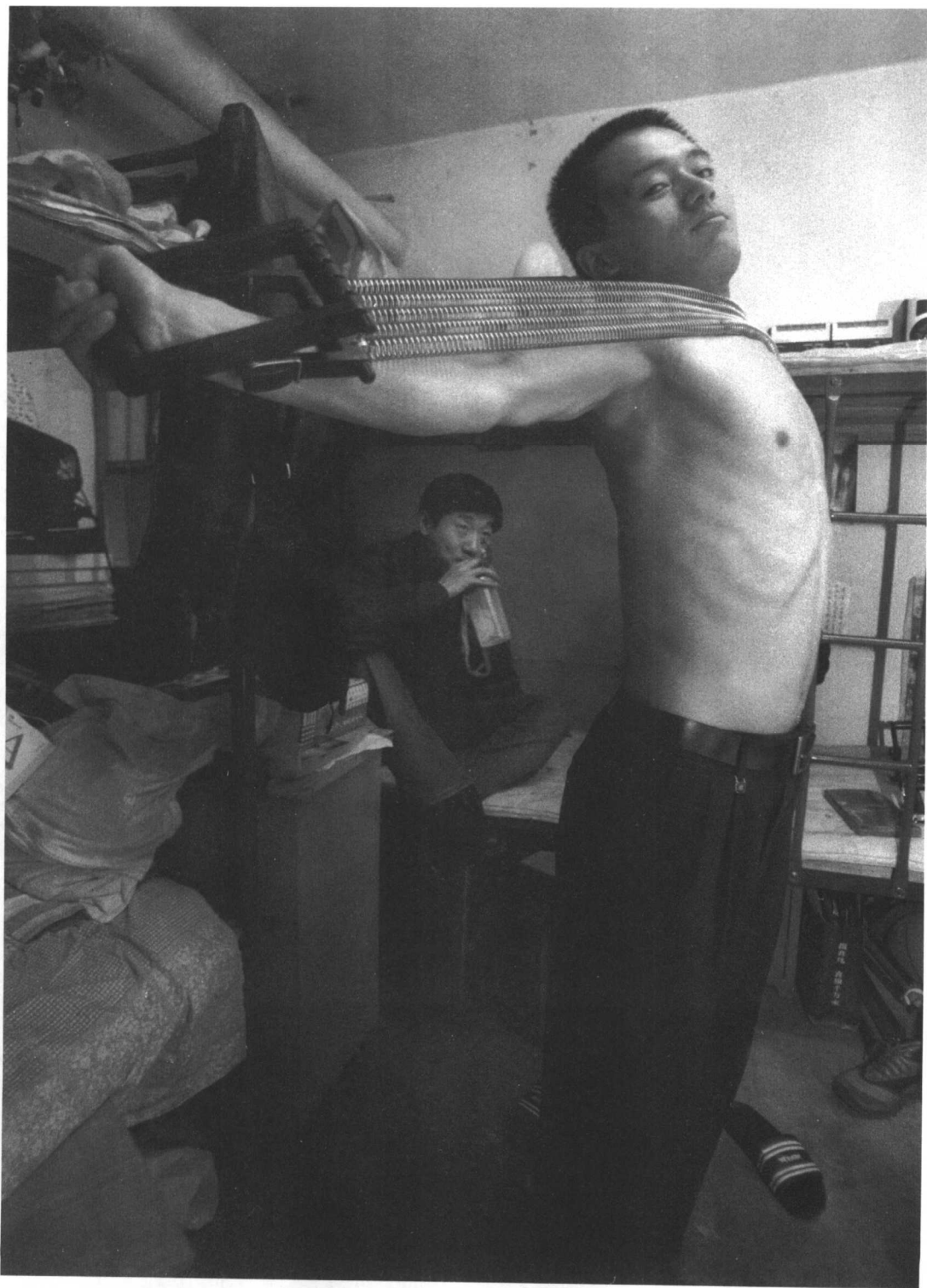
住在这里的人五花八门，每个人几乎都有一个故事，他们有着共同的身份——学生，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这里的流动性非常大，每时每刻都有人加入有人离开。

这里虽然是一个黑暗的地方，可住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前途光明，因为不会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黑了。住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加倍地努力，以使自己能早日离开这个地方，这里也是一个给大家梦的地方。





浴室虽然很小，但它保证了地下室人们生活最基本的需求。



经常见不到阳光，锻炼身体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地方狭窄只能用这种方式。



地下室里阴暗潮湿，衣服洗后都要晾好多天。



这里曾经是防空洞，厚重的大门隔绝了城市的喧嚣。

在城市的边缘舞蹈

摄影 / 文 / 王宁德 199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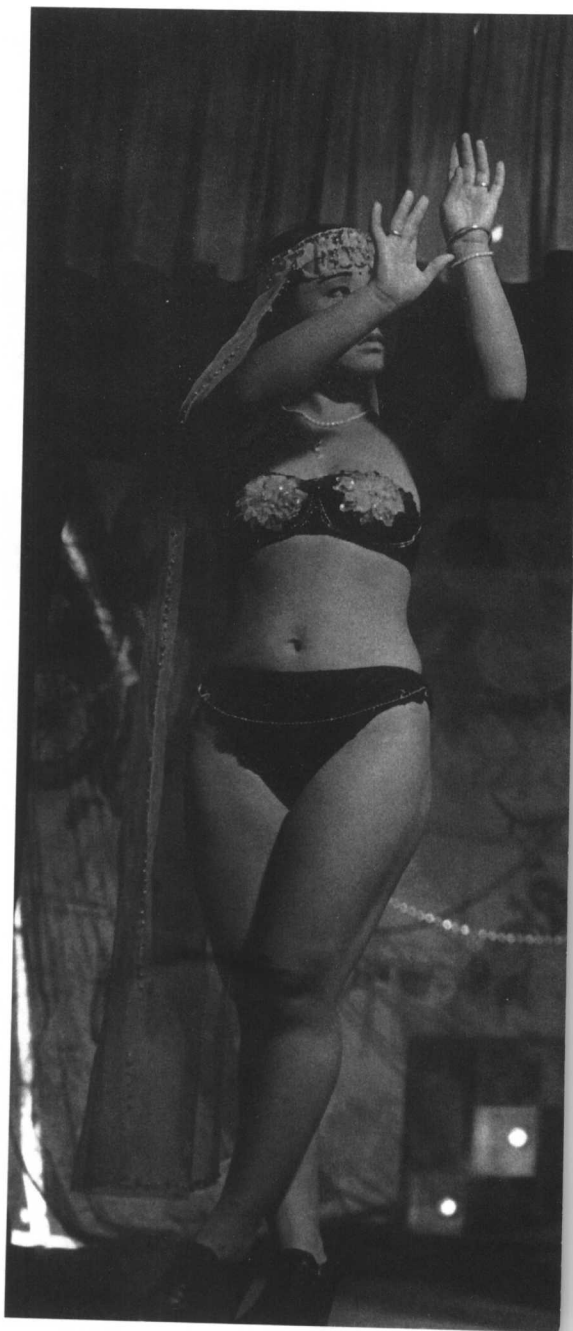
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开始，中国出现了一批特殊的“艺术团体”——他们带上简单的道具和服装，开着大篷车（通常是废旧的大卡车），游走在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城乡结合部，以其特殊的表演来维持生存。

其时，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经济变革和社会转型期，由主流群众分离出若干类型的边缘人，“流浪艺人”就属其中的一种。

我从1997年春节开始关注和拍摄“大篷车”，从潮州到鹤山，从粤北到粤西……

每到一个地方，剧团就会搭起一个帐篷或租一个剧院。观众主要是打工仔和当地的农民。只要花上5元人民币，你就可以看一场完整的演出。

演出内容包括歌舞、魔术、气功和杂技等。但这些并不能成功地引来观众。于是剧团就会在表演中增加一些涉及性和暴力的内容。虽然这不为中国的法律所允许，但剧团依然能活跃在那些缺乏文化生活和少有政府管制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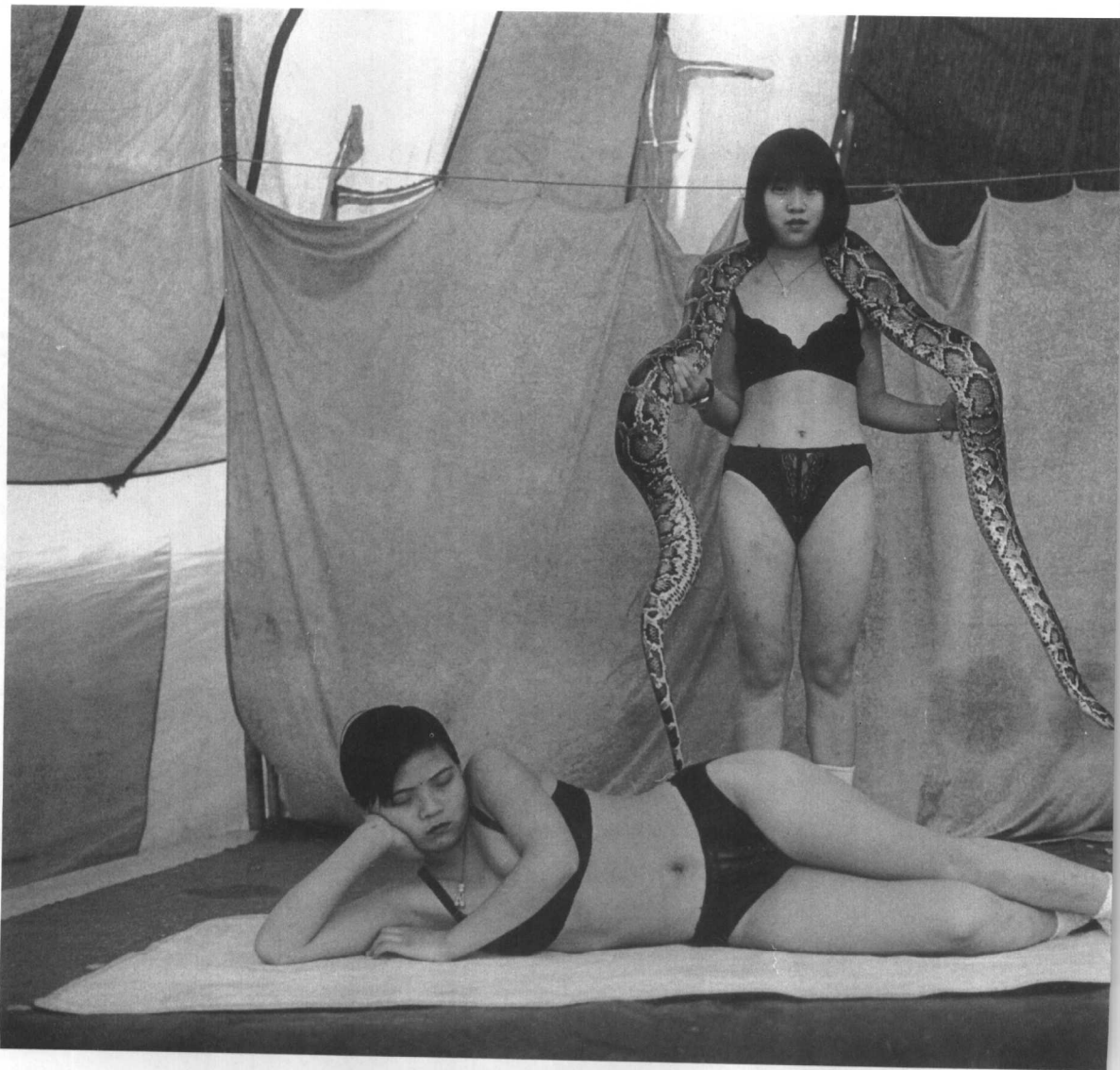


艳舞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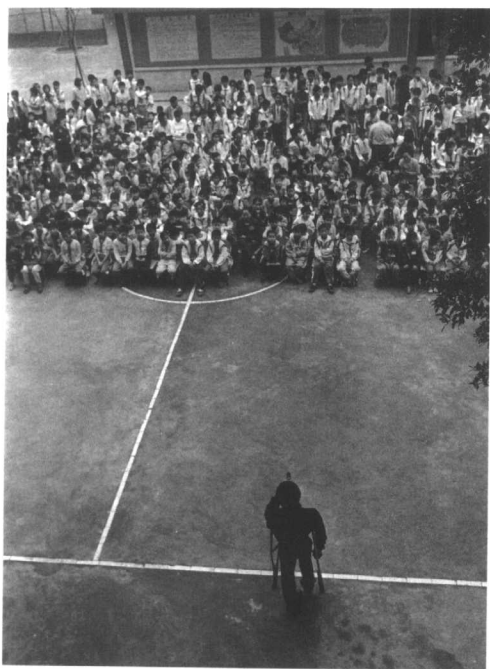
演出的收入虽然不高，却是“演员们”在家务农的好几倍。当然同男演员相比，女演员们的演出更受欢迎。原因就在于她们是女人。她们的表演相当大胆，就算没有受过专门的表演艺术训练，但观众们也很少是冲着表演艺术来的。

女演员和她的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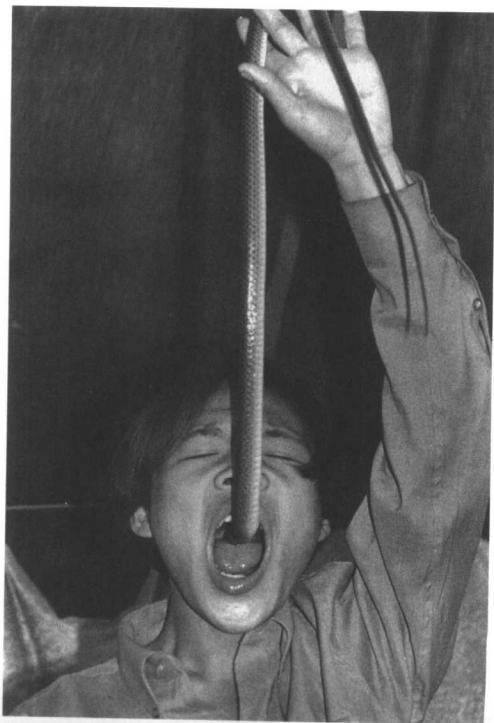
团员大多是农民。他们主要来自于一些经济不发达的省份，如湖南、河南、江西等地。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这些省份的农村在经济上与外面、尤其是沿海地区有了很大的差距。既然从事农业的收入相当低，对于这些地方的农民来说，还不如组一个剧团去表演，那样既能增加收入，又可以顺理成章地离开家乡，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美女与蟒蛇。



流浪大篷车的残疾演员在球场上为学生演出。

13岁男孩表演生吞活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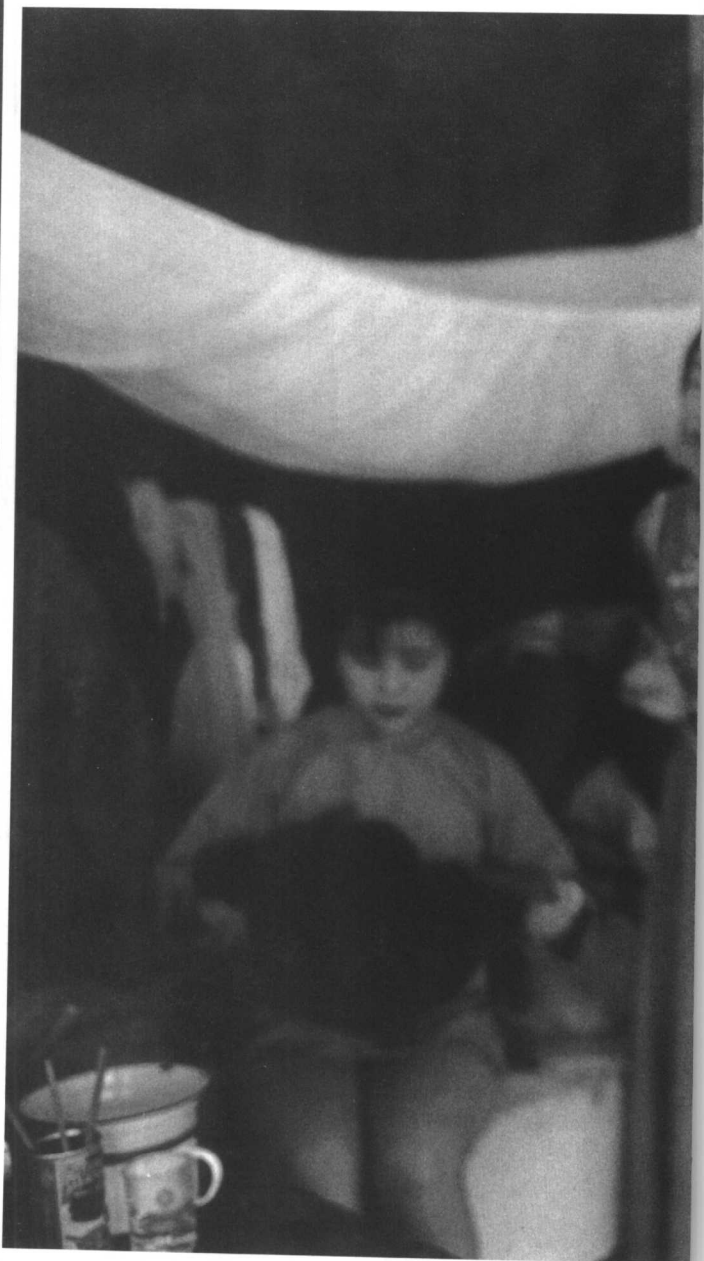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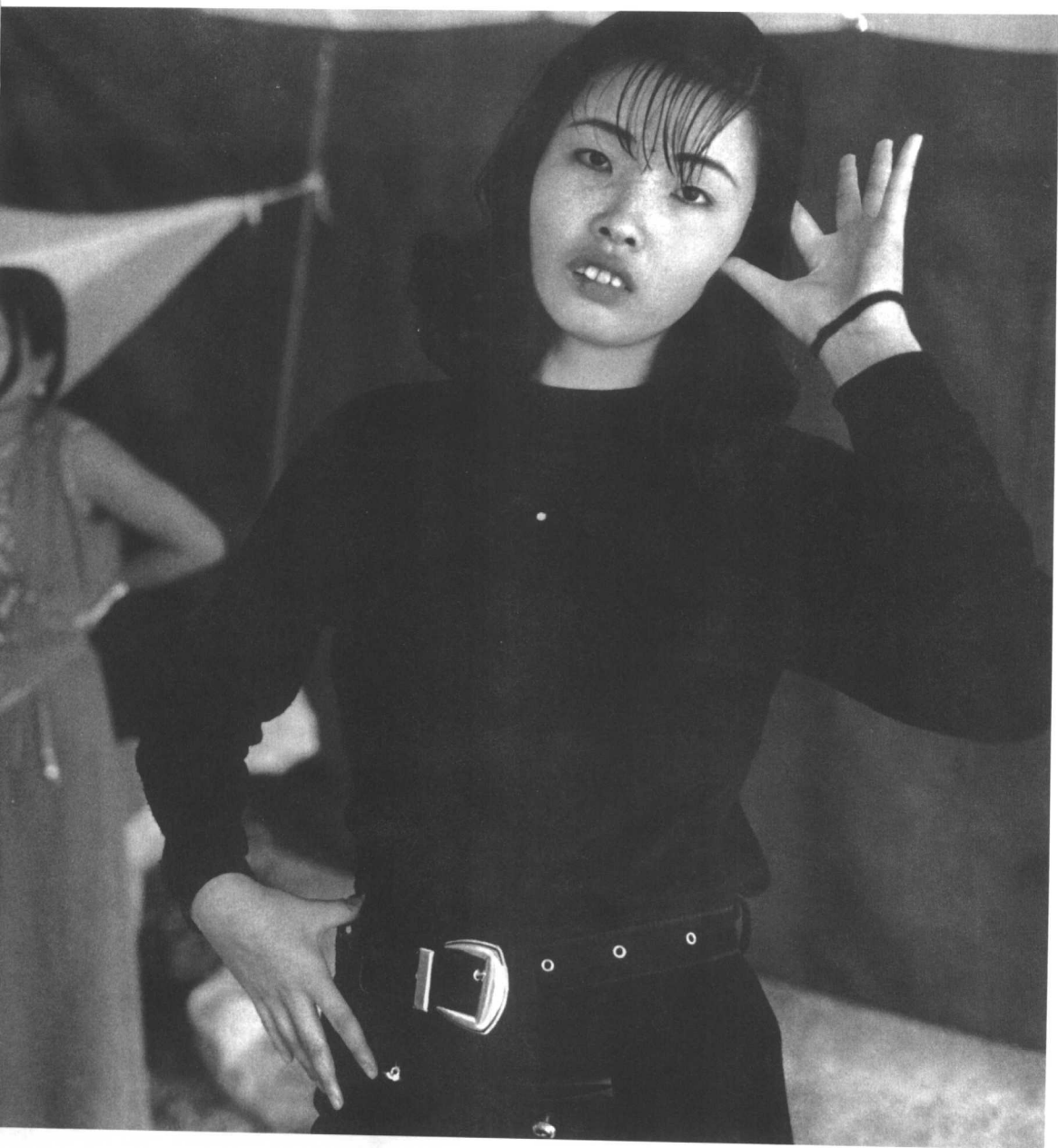


一名女演员手持一只鹌鹑留影。这只鹌鹑后来成了他们当晚的汤料。

由于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土地和环境，他们表现出从未有过的豪放和浪漫。在这个相对保守和封闭的国度里，他们的行为改变了别人的观念也影响着自身。

“流浪艺人”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的出现既有自发的一面，又离不开特殊的社会背景。随着中国农村的不断城市化，他们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减少，不知何时，他们可能就成为某个特殊时期的历史记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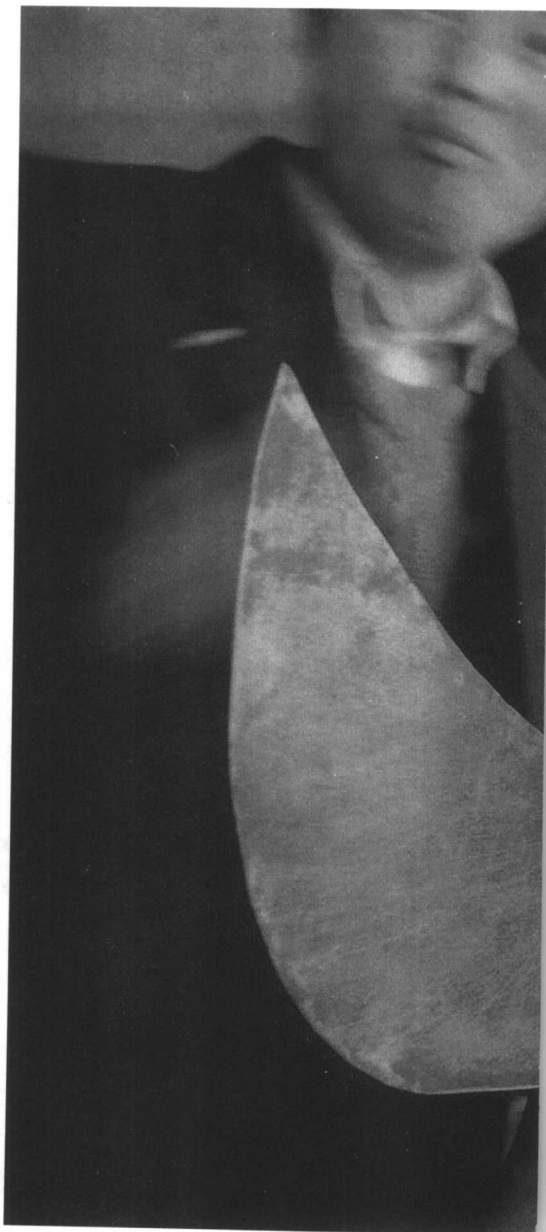
阿红认为她是全团最漂亮的女人。

血社火

摄影 / 杨型芳 陕西大荔县 2001年

一个、两个，鱼贯而出——剜比干心，关公斩潘章，铡马鸿，张飞斩吉凌，黄忠斩夏侯渊……社火车上的人挥刀斩被绑的马鸿，血流如注，大肠涌了出来，流到肚外，那肝、肠子，全是真的（当然不是人身上的），刀、矛更是真的；阎良被关公的大刀劈个正着，整个肩膀被劈了下来；比干的心被挖了出来，疼痛难忍……这一幕幕景象，恍惚是在梦中飘然而过，这是发生在陕西省大荔县溢渡村二月二庙会上的惊人一幕，这就是古老的民间艺术血社火，从很古以前传下来的。二月二龙抬头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都要扬善除恶，以这种真刀见血的社火故事来告诫人们，一辈子不要做坏事，多做善事。随着社会的变革，人们越来越需要善良的存在，其间的人物故事也随着在变，但总体上讲变化不大，都是老百姓中间流传比较广的故事，观众一看就懂。

在西部的一些村县，人们还保持着令人瞠目结舌的祭祀和庆祝方式。图为陕西大荔县溢渡村血社火几乎乱真的刀劈胸膛化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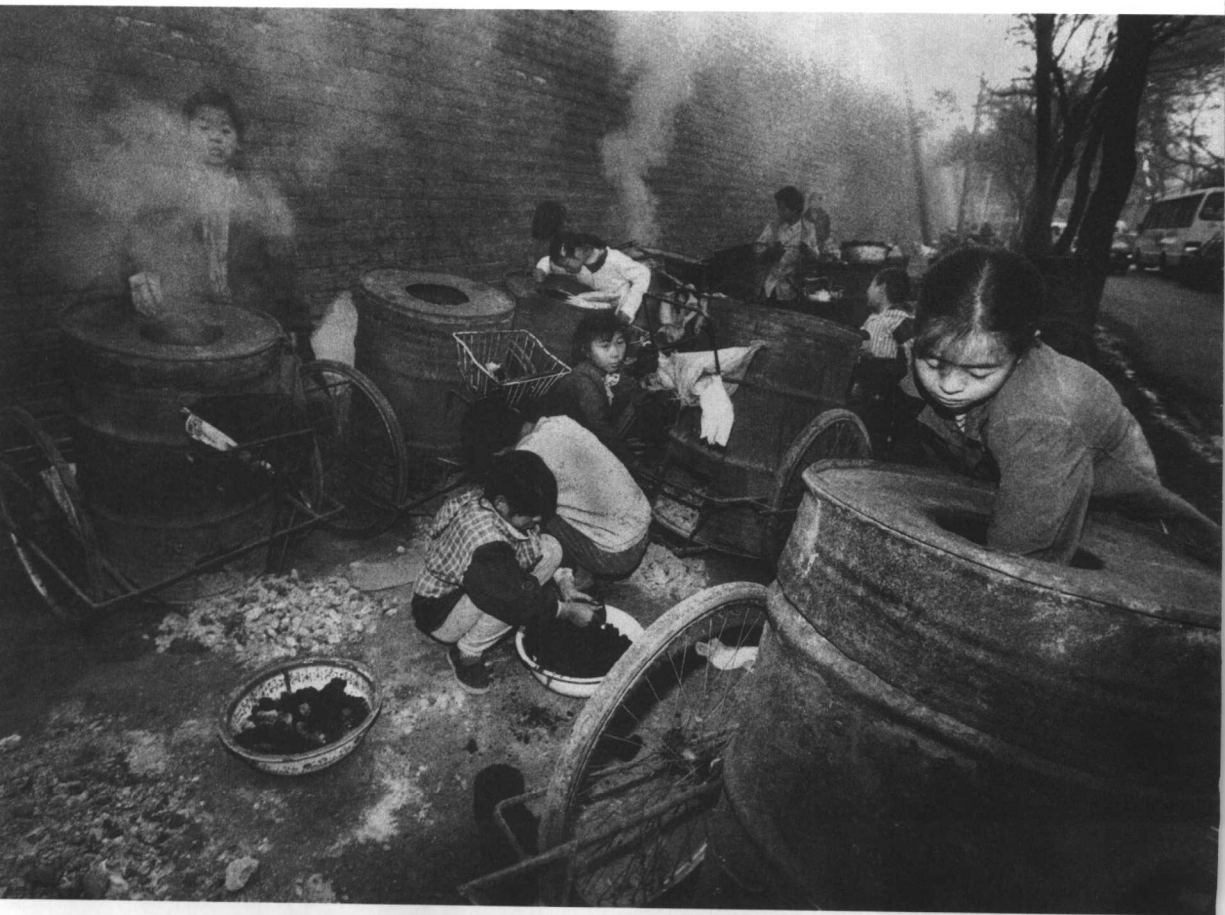
卖红薯的孩子

摄影 / 谢海涛 西安 2000年

画面上十几位卖烤红薯的安庆少年正在寒风刺骨的路口收拾烤炉。他们一边往炉子里放红薯和焦炭，一边不时翻动着烤红薯。一个卖烤红薯的安庆少年曾对记者说，他今年13岁，去年他随父母还有几个小老乡来到了西安，在街上卖烤红薯，天气越来越冷，生意倒是红火了，但街头上的寒风真让他受不了，他告诉记者，他想念学校和同学，想回课堂上读书。

因为家园被一场洪水淹没，这群安徽安庆市的农村少年不得不离乡背井，结伴搭伙地来到西安自谋生路。为了生计，这些本应坐在课堂上读书的孩子们每天却起早贪黑，在西安走街串巷卖烤红薯，干着与他们的年龄极不相称的活计，漂泊中的孩子们，多么需要一张稳定的课桌。

背井离乡的孩子们在城市的边缘地带生起炉灶，靠卖烤红薯为生。





孩子们在大人翻检过的垃圾里寻找属于自己的宝贝，小女孩儿捡到一个键盘非常的高兴。这也许属于他们的童年游戏的一部分。

快乐的垃圾娃

摄影 / 谢海涛 西安 2002年

江村沟是西安最大的垃圾处理地，捡垃圾的人多了，就形成了个“垃圾村”。村里住着上百户人家，有十多个从小就靠捡垃圾为生的“垃圾娃”，他们大多没上过学。西安城的垃圾运到江村沟时，早已被翻了不知多少遍了，值钱的东西也早已被捡走了，偶尔能翻到一个新鲜东西，就成了孩子们的宝贝。9岁的红红敲打着刚捡到的一个废弃的计算机键盘，嘴里念叨着“AAA，SSS，DDD……”

天真无邪的红红并不“孤独”，照片上她的身后还有个垃圾娃，正在垃圾堆边翻找着属于他的新宝贝。

每天，垃圾娃们在肮脏的垃圾堆里寻找着生活来源。他们中有离家出走的流浪儿，有的则由父母带着一同捡垃圾，有的孩子甚至就出生在垃圾场……

“破烂王”

摄影 / 谢海涛 陕西省华阴县 1999年

肩背手提十数个各式袋子的破烂王行走在陕西华阴县阳光下干净的街头，那些袋子里的物什是他用粗糙的双手从肮脏的垃圾中精挑细选来的。

除了摄影师，街头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面对人们冷漠的目光，破烂王神情坦然。的确，照片上的破烂王太穷了，穷得连个收破烂的车子都没有，一辆虚化的轿车，凸现了破烂王的别样存在——静悄悄的街头，一切似乎早已顺理成章。



陕西省华阴县的街头，这位“破烂王”肩背手提着十数个各式袋子，塑料的、布的，材料不一、大小不等，但无一例外地装得鼓鼓囊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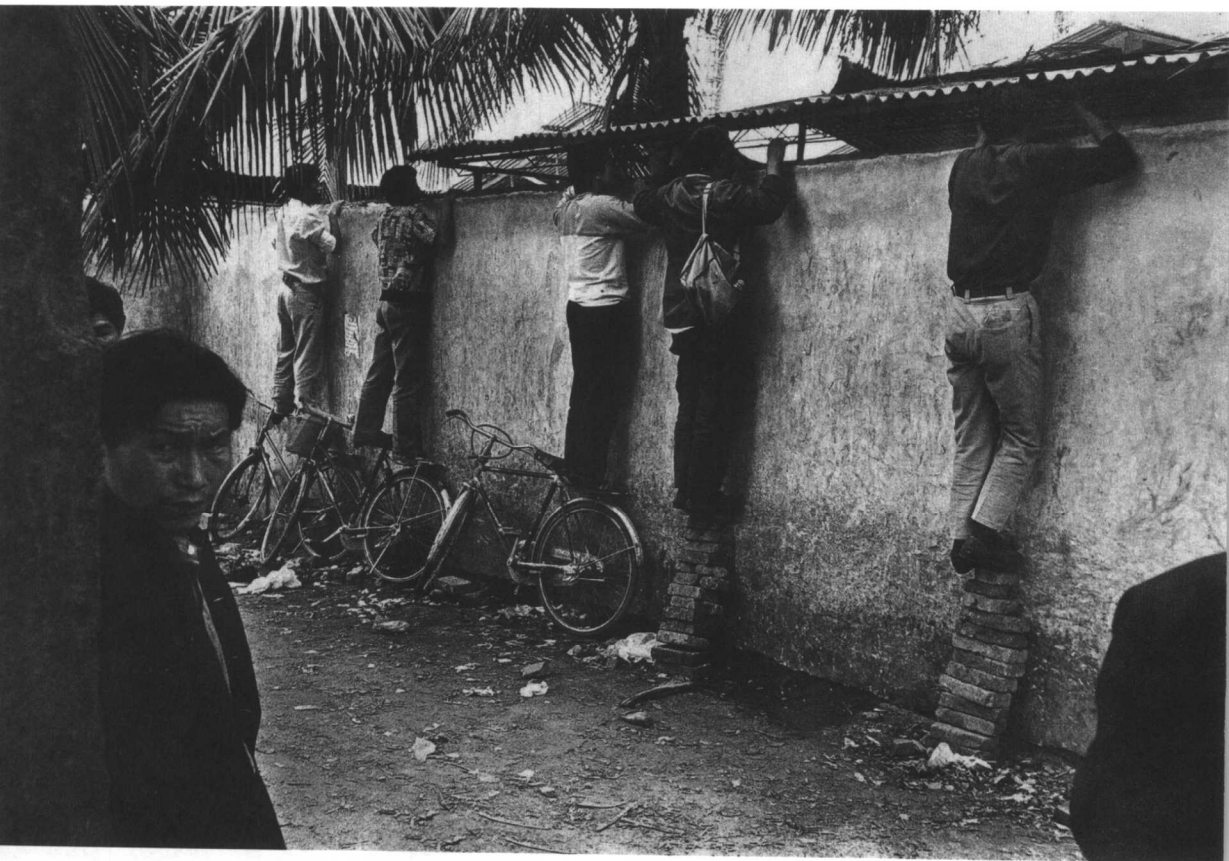


年轻的身体、凌乱的石块、机械的演出……这一群海口街头的表演者不择场合，不顾身后的废墟，径自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海口街头的舞蹈者

摄影 / 黄一鸣 海口 1993年

镜头里，四个女表演者着装暴露，从她们毫无章法的动作可以看出她们没有丝毫的舞蹈基础与知识，其中最右边的舞蹈者神情冷漠，面带疲惫，厌倦已悄然袭上了她的眼眸，而紧挨着她的舞蹈者则正自顾自陶醉在忘我的表演中，其余两个表演者显然顾及到了现场观众的情绪，动作夸张。有趣的是，这四个舞蹈者穿衣各不相同，最左边的女子甚至因陋就简，脚蹬一双塑料凉鞋仓促上阵，纵观四人的整个表演，竟连草台班子也称不上，而舞蹈者身后的废墟，似乎加剧了海口这种“街头舞蹈”的杂沓凌乱。



一个人满面愁容地注视着镜头,其他人踩在砖块叠砌的“台阶”上,扒着墙头努力辨认自己的亲人。

在海口收容所外

摄影 / 黄一鸣 海口 1990年

1988年海南建省后,在近四年的时间里,进入海南都要办特区通行证,许多无证乘船进入海南的外省人因此被收容在海口市一个特设的大篷里等候处置。画面上,海口收容所外五个外来工或踩在砖块叠砌的“台阶”上,或站在靠墙的单车上寻找着滞留在收容所内的亲朋好友,这些人的左侧,一个站在棕榈树下的中年男子正警惕地注视着镜头四周。那时,针对“盲流”的收容遣送还是个铁打的制度,直到2003年3月17日,27岁的湖北打工者孙志刚被广州黄村街派出所转到收容站收容之后,被故意伤害殴打致死,收容遣送制度相对宽容和人性起来,打工仔们至此才心安了许多。

广州街头捡破烂的人

摄影 / 叶健强 广州 1994年

据说有人曾经做过统计，如果把广州市每天的垃圾按一米厚度平铺，足可以铺满一个足球场。可见广州这座城市每日垃圾“产出”之丰。在这种情况下，“破烂王”的应运而生就是丝毫不令人惊讶的现象了，他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足迹遍布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照片正前方是这样的一个“破烂王”，光着上身，推着独轮车，戴着拾来的大檐帽，正一脸从容地走在繁华的广州街头。他的左侧是位用单车驮着液化气瓶行色匆匆的骑车人，画面的这种偶然“巧合”颇令人玩味，一个是为了生存四处刨扒满载而归的“破烂王”，一个是为了柴米油盐辛苦奔波的骑车人，相形之下，画面左上角那个背靠马路中央交通隔离栏歇息的人俨然已是旁若无人，超然而物外了。

这位东风路街头的“破烂王”头上的那顶帽子，显然也是捡来的“战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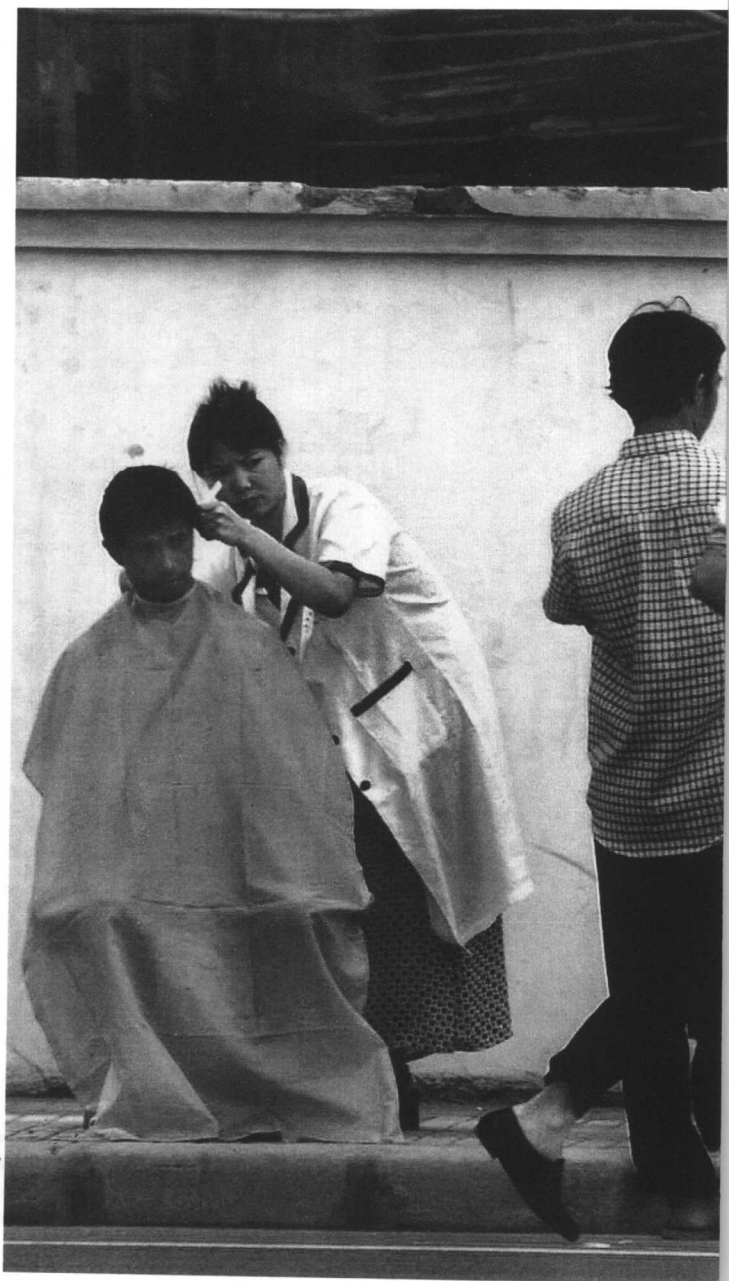


逃离执法人员

摄影 / 李洁军 广州 1999 年

在城监执法人员的追赶下，照片里几个无证的小商贩如惊弓之鸟四处逃散。而路边一左一右的两个理发者有的同情地看着他们，有的则已经司空见惯。两个露天理发者也无营业执照，但她们却无法学地摊小贩那样随时开拔，否则两个被理发人也许可将面临“阴阳头”的尴尬，这就是摄影师李洁军为我们抓拍的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现实镜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大量的人员流入城市，加上一些企业的下岗职工，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推车挑担走上街头巷尾，拥向城市的角角落落，屡禁不绝的无证摊贩在这样的现实里无疑将会长期存在下去。

广州市大规模整治街道“三乱”，力争为九运会在广州的顺利举办营造一个良好环境。广州东站附近地区的无证小贩遇见城监执法人员，犹如惊弓之鸟胡乱奔走。





浙江农村的“歌舞团”

摄影 / 萧云集 浙江 1993年

苍南农村集市上的这种“篷车式歌舞团”一度十分盛行，农村“歌舞团”就像吉卜赛人的大篷车一样，在各个中小城市或乡镇中不停地流动，每到一处即搭起简陋的舞台，表演上数日，又奔赴另一处。

农村“歌舞团”一般留给我们的印象就是破旧的遮阳篷，高音大喇叭，几个穿着暴露、动作生硬的女演员，看台周围挂满“露肉率”颇高的表演“剧照”，以暗示演出绝对精彩耐看——连同照片中“海报”上杜撰的“中州健美乐团”、“哈尔滨摇滚乐”之类莫名其妙的宣传语。而和台上的“热闹”相对应的则是照片右下方几个面无表情的男子和左边一些瞧稀奇的观众，他们似乎也没有完全被吸引住。

阴沉的天气、简陋的舞台上演员们正在表演。高音喇叭、简单镶嵌的“剧照”，以及简陋的宣传牌，都说明了一个游走在乡间的“歌舞团”的普遍状态。





非常生活

也许和绝大多数人习惯的生活不一样，
非常生活好像总是发生在别的空间，
它们通常是连篇累牍的“爱心报道”，
或者是令媒体兴奋、让社会轰动几天的“非常事件”。
我们是否已经对这样的“编者按”习以为常：
“相关专家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行动起来，
改变产生这类事件的社会土壤和根源。”

丢丢

摄影 / 文 / 居杨 1997—1999年

3岁的丢丢怎么也不会想到，当初吸毒成瘾的母亲给他起的这个名字，竟成为他幼小生命的真实写照。

1997年7月17日下午5时许，北京市东城区公安民警在和平里地区原花园3楼的一套单元房内抓获了两名吸毒人员，并在堆满大量吸毒用的吸管、锡纸、天平的屋中发现了丢丢，当时他全身赤裸，双手被绑，浑身布满烟头烫痕，已奄奄一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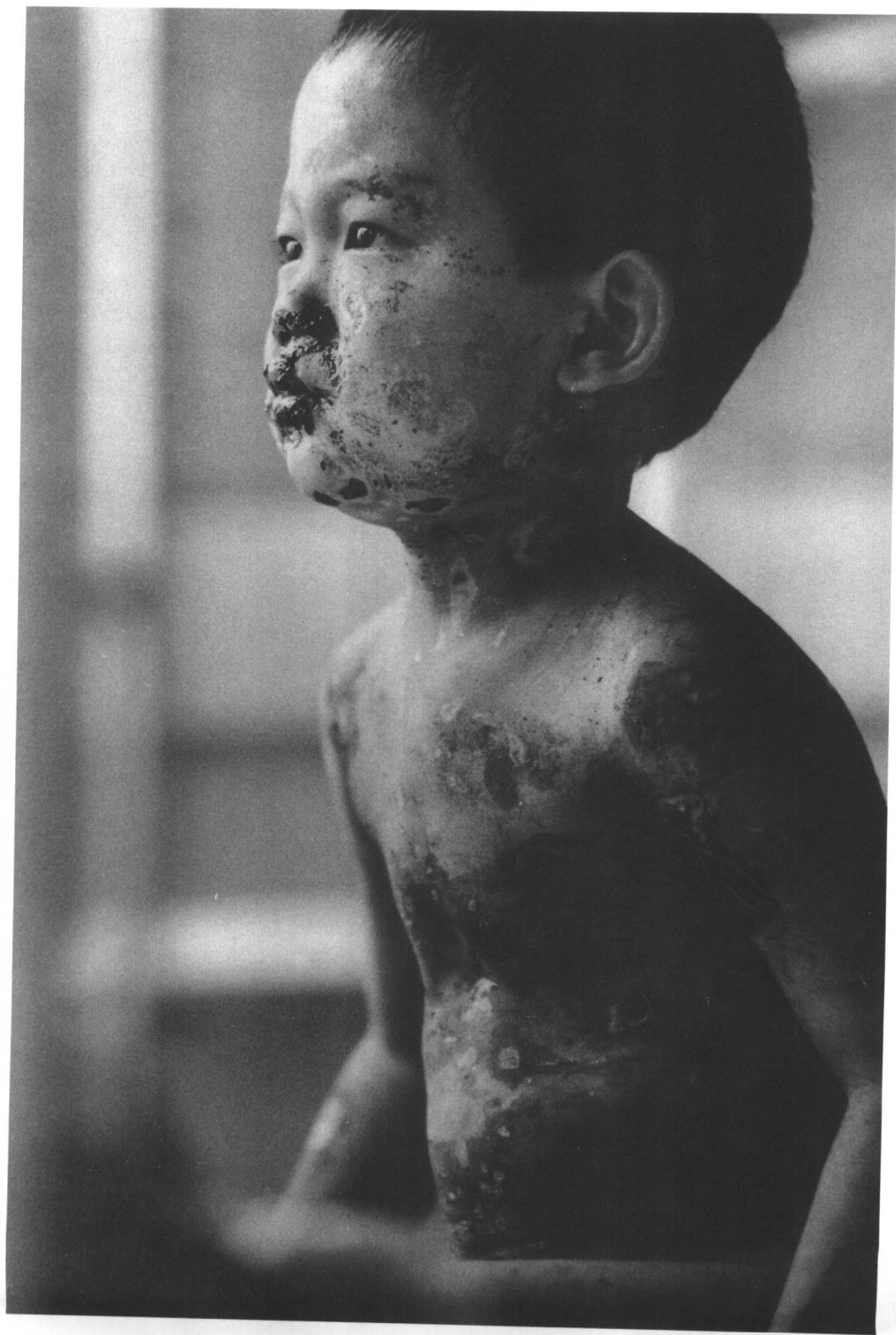
3岁的幼童何以落到如此悲惨境地？经调查，丢丢没有父亲，母亲郭立芹22岁，河南省信阳县人，自14岁从农村老家来到北京，已卖淫、吸毒多年。1997年6月，她因欠毒款将亲生儿子丢丢抵押给吸毒者林魁、王福、王凤妹，一个多月来，狠毒的林、王等人则将无辜的孩子作为毒瘾发作时发泄的对象，捆绑、踢打、火机烧、烟头烫……他们的人性完全泯灭在吸毒后的狂躁暴虐之中。

北京市东城公安分局民警根据群众举报，快速出击，将幼童解救，并连续作战，将此案3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擒获。

丢丢被送进北京市儿童医院特护病房，经过3个星期的精心治疗，遍体鳞伤的孩子已渐康复，院方考虑到孩子的特殊情况，将上万元的医药费压缩至五千余元，但这笔费用该由谁来出呢？其母郭立芹因卖淫、吸毒被判劳动教养2年，住院手续中，监护人填写的是和平里派出所，而所里并没有这项专门支出，民警为这笔钱四处呼吁。丢丢出院后，虽然被东城区和平里西河沿敬老院的老人们代养着，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孩子未来的生活又该如何开始呢？

随着《丢丢的故事》图片报道见诸报端，无数个慰问电话、信件飞进北京，好心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捐助了三万余元人民币，解决了困扰已久的医疗费问题，并为孩子以后的生活铺平了道路。

（右页）如果没有特别的说明，谁也不会料到这个孩子是1997年被民警解救出来的。丢丢幼小的身体上满是伤痕，一双眼睛却依然清澈。他也许不明白丧尽天良的人为什么这么对待他，母亲为什么抛弃他，那双依然清澈动人的眼睛里满是对这个世界的不解。这张照片让人想起了日本轰炸后的上海火车站那个无助的孤儿。





(左页)从母亲的眼光中我们看不到很多的悔恨，而从丢丢的眼神中我们看到了过早出现的冷漠和恨。这个孩子无意中摆出了十字架的姿势，双手被绷带缠绕，这也许正暗合了他过早体会到的苦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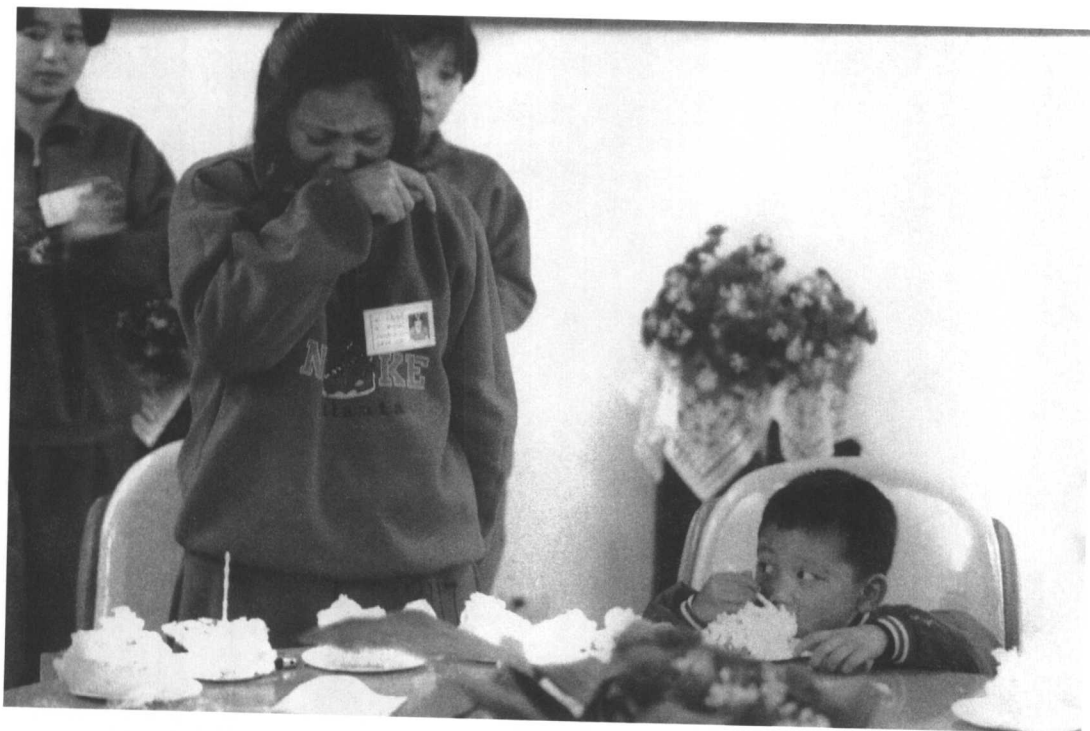
很多人都表示要收养丢丢，但因郭立芹仍具有对亲生儿子的抚养权而未能如愿。几经周折，郭立芹原籍河南省信阳县民政局（后改为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民政局）表示同意破例接收孩子。1997年10月16日，满身伤痕的丢丢告别北京启程回到河南。

河南省信阳县民政局十分重视和关心这可怜的孩子，安排丢丢由该局职工杨素云一家代养，定期上幼儿园，民政局每月发给他300元生活费、100元抚养费，为了让孩子忘记不幸的过去，丢丢改名为中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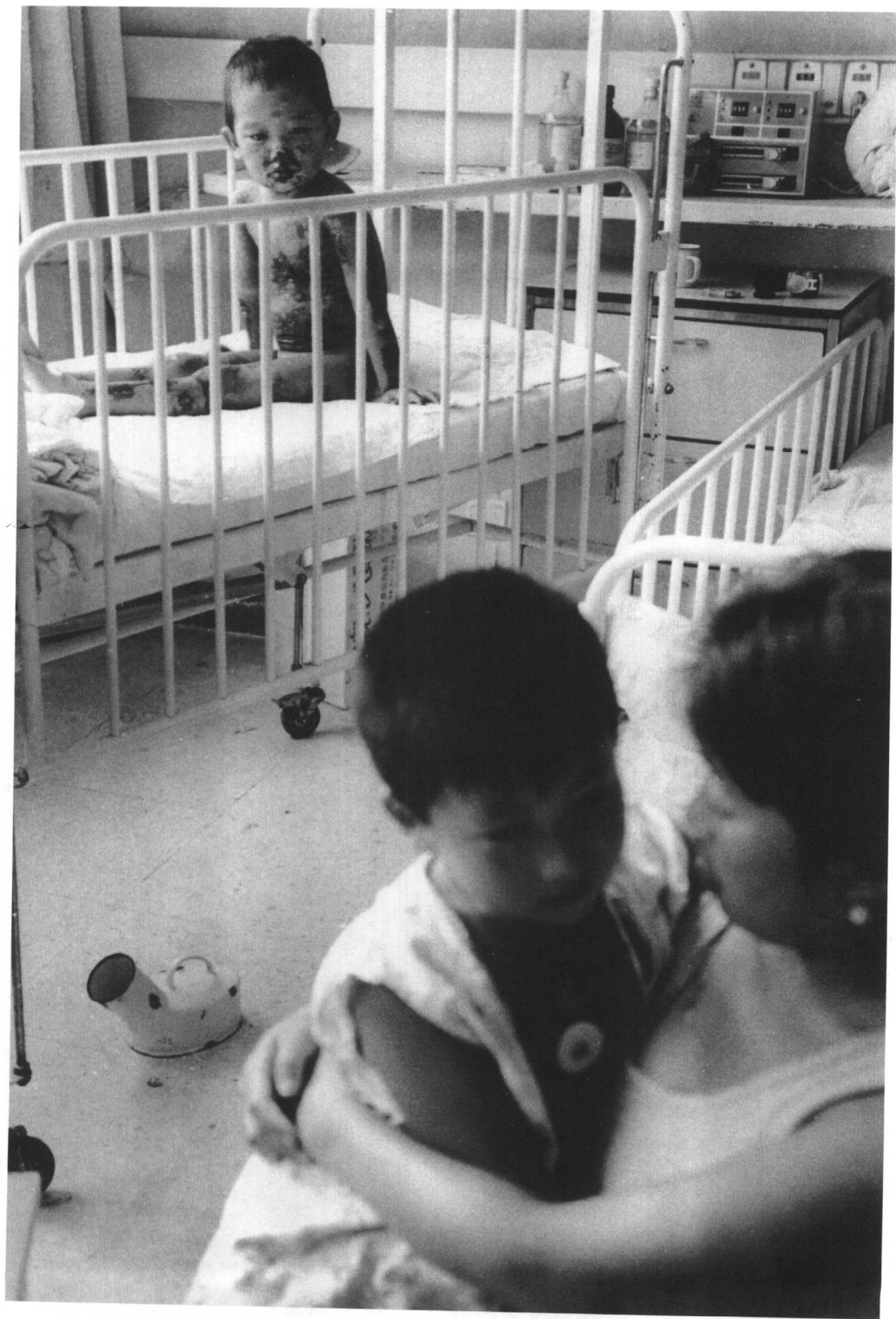
丢丢在杨奶奶家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他长高了，也胖了，可心灵的创伤如满身的伤疤一样难以抹掉，孩子还经常从噩梦中惊醒，他怕火，怕黑，怕被坏人带走……正在劳教的郭立芹托人送来的衣服，丢丢穿上就舍不得脱下，但对民政局的叔叔、阿姨说：“我妈来了，不要告诉她我在哪儿！”

1998年6月，全国禁毒展上《丢丢的故事》被展出后，再次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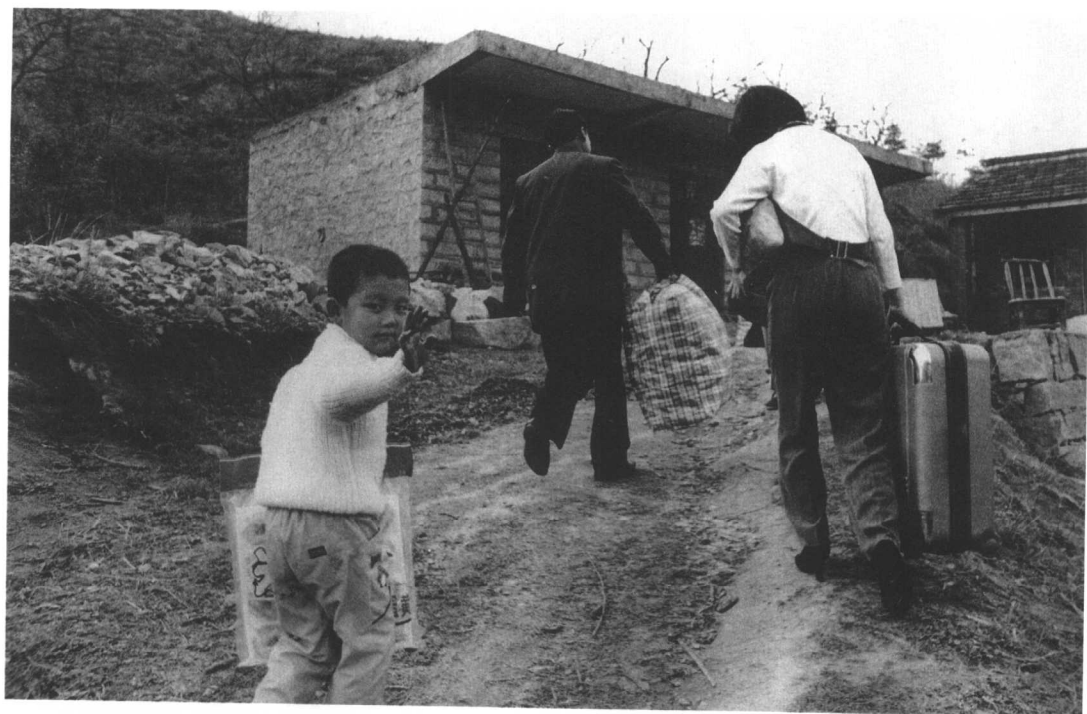
1998年6月1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残害丢丢的贩毒、吸毒犯林魁、王凤妹、王福分别判处死刑、有期徒刑十六年和有期徒刑十年。



被提前释放的母亲百感交集，泣不成声，正在专心享受5岁生日蛋糕的美味的丢丢有一些吃惊地瞟着身边这个并不熟悉的“妈妈”。



丢丢对母爱充满了渴望。



丢丢和妈妈回到农村的姥姥家，快乐的丢丢和记者招手告别。

时间过得真快，1999年4月8日，丢丢在迎来5岁生日的同时，生活又发生了变化。这天清晨，孩子跟随民政局干部驱车8小时赶到郑州市。在河南女子劳教所，丢丢见到了分别两年的母亲郭立芹。郭立芹一把搂住儿子，痛哭失声，丢丢也很快融入到母子的亲情中，怎么也看不出两年前母子相见时那种抵触情绪，孩子毕竟需要母爱。

母子俩参加了劳教所举办的特殊生日会。会上，管教干部宣布郭立芹因在劳教期间表现良好，连续被评为优秀学员，并痛悔过去，决心不再沾染毒品，故提前3个月解除劳教。信阳市平桥区民政局决定让她领回孩子，并资助生活费2000元。

4月9日，丢丢告别民政局的叔叔阿姨和代养他两年的杨奶奶一家，带着全国各地好心人们捐助的学习用品和玩具，随母亲走了十几公里山路，回到贫困的小山村——李家寨镇大王村，他心安理得地走进家门，一点也不感到陌生，也许他的未来就要从这里开始了。此时的郭立芹倒显得心事重重，她毕竟离家多年，能否重新适应这里的生活，实在没有把握。24岁的年轻母亲想在所熟悉的的城市找回一个完整的家，但这一切都很茫然，归来的母爱正经受着考验。

附记：据报道，现在的丢丢又一次被母亲抛弃，居住在养老院，没有安全感。而姥姥和舅舅也将要负担不起丢丢的学费。

盲孩子

摄影 / 李楠 文 / 王石平

1989—1996 年

这是在我们真实的生活中，难以看到的一种真实。

如果你看到了那些盲孩子，如果你用你的心去看，这些照片会裹着一些东西向你的心口撞来，它们会撞疼了你……

在这样的照片面前，我们会重新思考“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活着”这样的一些哲学命题。

茂盛的鲜花丛中，孩子用尽自己的全部心思在感受鲜花是什么样子。胖胖的小脸仰望着天空，祈求上天给她一双明亮但是能看得见的眼睛。旁边的小姑娘闭着双眼感受绿叶甚至枝干上的刺。







孩子们捕捉着相机发出的“咔嚓”声，其中的一个男孩子还不能确定这声音是不是来自他的前方，脸上出现了若有所思的表情。

在这样的照片面前，我们会流下已经轻易不为别人流下的泪水，我们心中埋得很深的一些被叫做“良知”的东西被唤醒。

那些在永恒的黑暗中探索的盲人，他们无声无息地从我们身旁悄然走过，一脸的无助和茫然……

80年代末的一个偶然机会，李楠走进了济南市盲校。在那里，他结识了社会一个深深的层面，心灵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震撼。他拍下了盲孩子，没有造作，没有强化，尽量如同生活本身一样。

每一个盲孩子都是一个孤独的人，他们陷入永远的黑暗里，摸索着、试探着前行。

因为身体的残疾，与外界交流的困难，他们常常都生活得非常封闭。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因为感知能力的限制，他们接受社会的能力差，脆弱又单纯。并且，他们常常受到歧视。

《盲孩子》，李楠断断续续拍了近10年——

这期间，名叫“一点”的盲童从小学上到初中、高中；名叫王茂国的盲童从小学到职高并以全国第七名的成绩考取了长春大学特教学院……

当然，这些照片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缘起于其中的一幅作品。在这帧照片上，一个盲孩子双手好奇地抚弄着大卡车上的反光镜，显然他被这奇特的东西搞糊涂了，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这个对于视力正常人来说再普通不过的事物。人间对于他们，原来竟存在着这样浩瀚的空白！于是，可怕的残疾人的悲剧，便被生动又残酷地表现出来，尤其这个被李楠捕捉住的盲孩子傻乎乎的模样，真叫人看了落泪！

这一下，我进入了李楠的世界——首先我站到了盲孩子们中间。他们一色的木讷，身体僵直，动作拘束，而且由于长期用耳朵的倾听来“观察”外部的一切，全都

“一点”抚摸着汽车反光镜，虽然他不能从反光镜中看到什么，但是至少要知道它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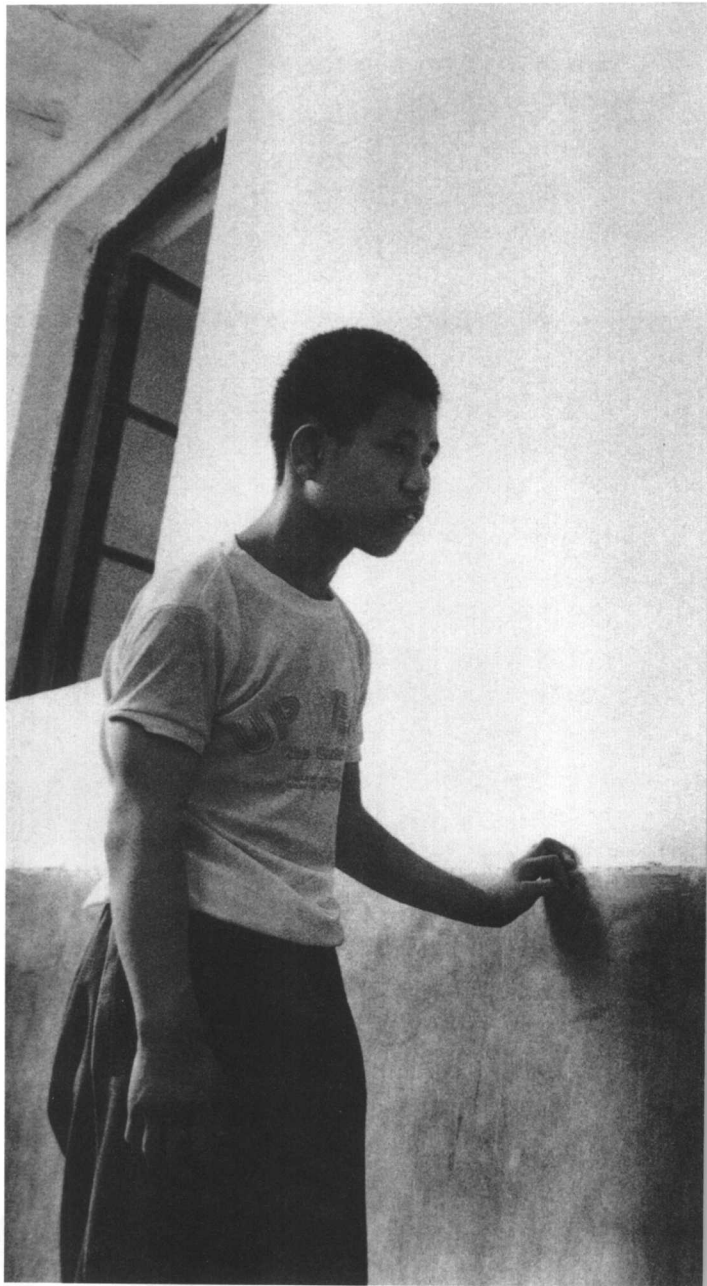
水泥台面上，雕塑的小女孩快乐地读着手里的书，现实中的小姑娘专注地收听着来自收音机里的声音，他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听觉世界的。

习惯地歪着脑袋——他们只能用脸颊去感受辐射而来的暖洋洋的阳光，用手指的摸索去感受一件雕塑，用鼻子去感受花儿的美。如果不是李楠的引导，我们怎么可能深入到这样一种艰辛的人生？

——用镜头对准他们，那些对此浑然不知并且永远无法理解照相和照片是怎么回事的孩子，他们没有一点一丝的造作和表演，那一切是那么残酷的真实，李楠流着泪，有时一天也按不下一次快门。

他的内心注定要经历一次长长的挣扎……

那每一个痛苦的时刻，他的情感都渗透到了底片上，浸润着照片中的孩





女孩子吹奏着乐曲，仿佛她在舞台上同样的认真甚至带有一些虔诚，连办公室的老师也被吸引。而画面中她的听众——“一点”面向笛子发出声音的方向，被美妙的乐曲深深地吸引。

子，让每一个看到了他们的人们，都感受到了他的那颗心。我相信，许多人在看到照片的那一瞬间都流了泪——盲孩子用指尖触摸着一朵盛开的玫瑰，她们看不到花儿的美丽，她们幼小的心里在想什么？“啊，花，花就是这样的。”她们触摸到了什么？花瓣的柔嫩？还是它们的单薄和脆弱？

——玫瑰的刺没有扎疼她们吧？孩子们的无助和我们对他们的无助清清楚楚地呈现了出来，这是我们整个人类的残缺，是我们内心永远的伤痕。

就连他们在草地上的嬉戏都有失重的感觉，他们心中的那片天地，不也是有点倾斜的么？

李楠用丰富的镜头语言向我们转述了一个张力很强的层面。不仅中国人读懂了，甚至摄影大师马克·吕布也读懂了：我被那些照片深深地感动了，从所有的照片来看，它是很好的，是充满希望的，我很想把它介绍给法国出版界的朋友。

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因为生命中的这种残缺，使我们会更加珍惜一些东西，用我们的热情和我们的爱心。

他的照片中有一幅是一个女孩儿吹着长笛，另有一个男生扶着墙走了过来，女孩儿的脸上是喜悦的——该是有梦的年纪吧？因为那笛声，便会有玫瑰盛开，那是心中的玫瑰。因为那玫瑰，世界又回归于美了。





快乐的孩子在做着我们看来非常危险的游戏。他们可以通过敏锐的听力和超常的感受力来辨别方向，从一张床跳向另一张床是男孩子之间快乐的游戏，也是他们展示自己勇敢一面的时刻。高高地跃起，孩子体会着自由的瞬间。

为什么生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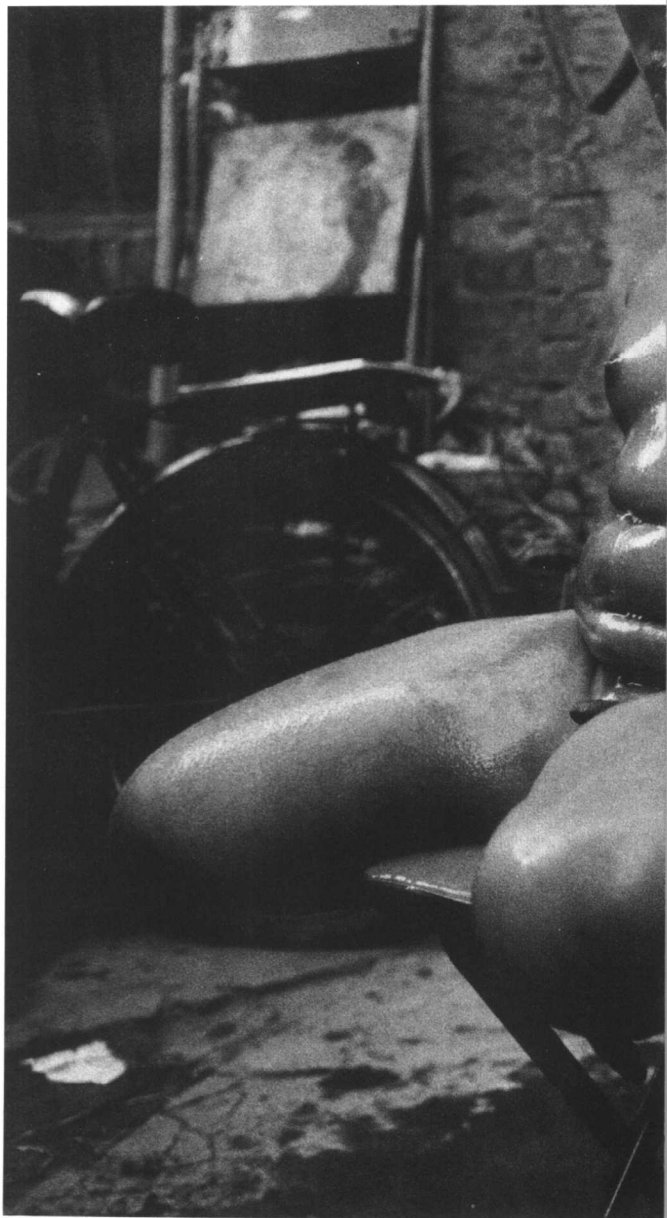
摄影 / 文 / 舟浩 2000 - 2003 年

2000年的3月8日晚21点，呼啸的警车、救护车和尾随而来的大队记者冲进了济南市北大槐树附近一个小院，头戴钢盔的警察顶着刺鼻的腐臭从一间破烂不堪的小储藏室里将一个双腿严重溃烂、脚上露着白骨、不停惨叫着的孩子连人带被子一起抬进了省立医院的急诊室。10天之后，医院做出了“双小腿坏疽”“营养不良、肥胖症”的诊断，并做了双腿截肢手术。

这个孩子叫李强，13岁，然而他的噩梦并没有随着折磨了他多年的病腿一同被截断，在他永失双腿之后，一场绵延数月的官司再次像那两条病腿一样折磨着李强幼小的心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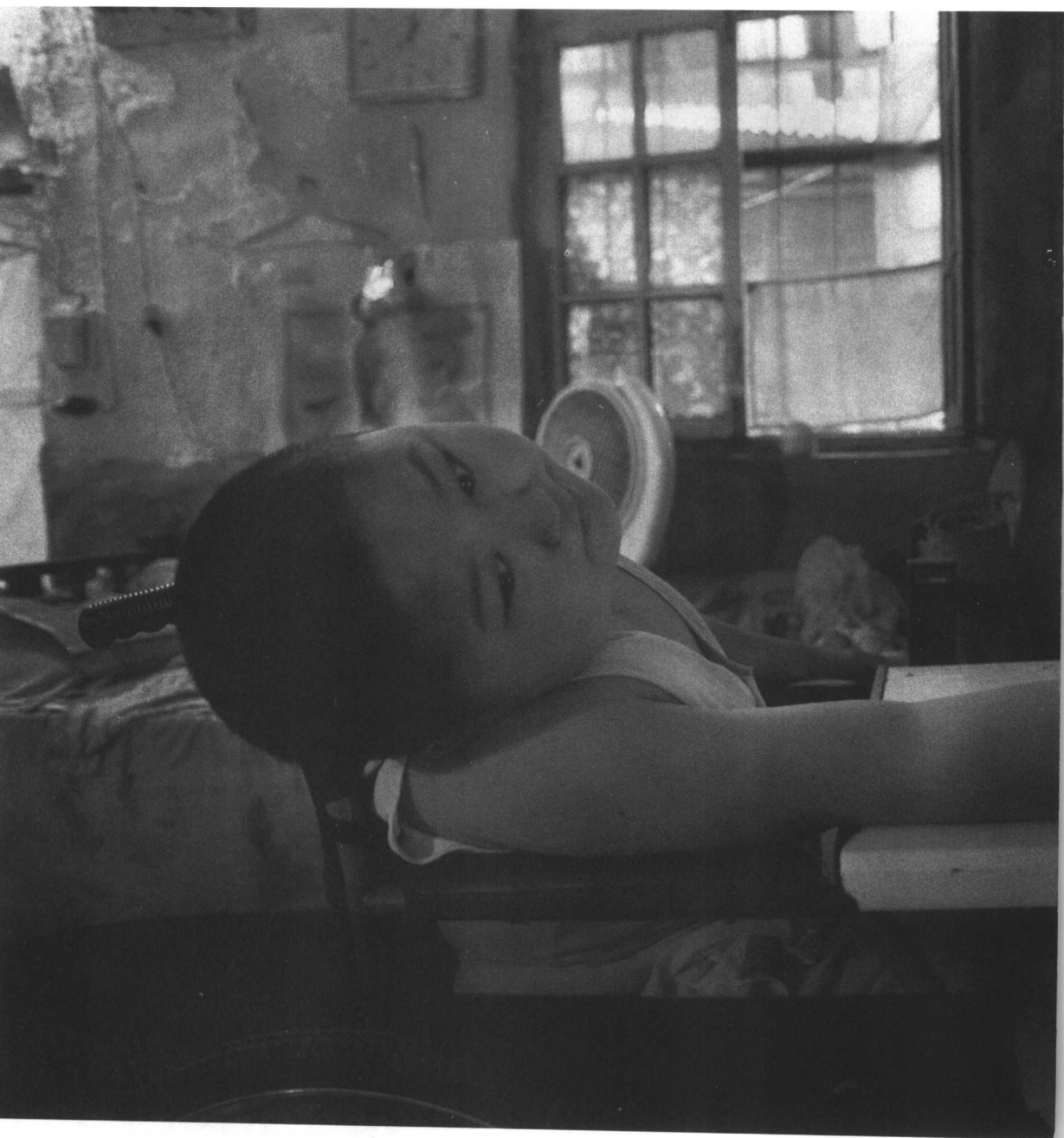
李强的父亲李文平和生母赵广琴同在济南一家食品厂工作，赵广琴当时是一名普通工人，李文平顶替了父亲的工作，在厂传达室作值班员。1988年2月23日李强出生，夫妻二人惊异地发现日思夜想的儿子竟然是一个脖颈侧弯的畸形儿！李强出生后的第八天因感染肺炎住进了医院，在住院期间李强就被诊断为先天性小脑萎缩。

李强的童年是在父母无休止的争吵声中度过的。由于严重的小脑萎缩、行动不便，李强不但不能躲避父母的争吵，甚至不能举手捂上自己的耳朵；李强的发育比同





为了给残留的伤口消毒，每次都要在洗澡水里掺大量的盐。



不能出门的时候，李强就靠家里的一台旧电视打发时光。



龄的孩子迟缓，走路很不稳，在有坡度的地方走路总是摔跤，一块小石头也会把他绊倒。3岁的时候，李强接受了颈部的矫形手术，但手术并不成功。到6岁上学的时候，从家到学校不到100米的路一天两个来回走下来就会摔得鼻青脸肿。就在这时，李文平夫妇的婚姻也亮起了红灯，赵广琴再也无法忍受整天面对残疾的儿子和无所事事的丈夫，在无数次绝望的争吵之后她选择了离婚。不久她便和同厂的一名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同事结了婚。随着病情渐重有时李强竟会在教室大小便，万般无奈之下只得退学。辍学回家后，由于行动不便不能出门，家里的一台老掉牙的电视是李强了解外面世界的惟一通道。李强很聪明，电视上经常播放的歌曲他听几遍后就能哼唱，但李强没有一个朋友，邻居家的孩子也被禁止和他一起玩，平时只能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家里。一次李强独自在家不慎从沙发上滚落，由于双臂没有力量以至在地上整整趴了半天，险些活活憋死。

虽然李强患有严重的小脑萎缩，生活几乎不能自理，但他依然保持着一个正常孩子强烈的自尊心，他决不会承认自己小便失禁在屋子里便溺，他从不会主动向父亲说大便拉在了裤子里、沙发上，为了这些事情，李强不知道挨了多少次打。一次，一个过路人看到他样子可怜，就把自己咬过几口的烧饼给李强吃，出乎他的意料，李强用仅存一点动作能力的右手把烧饼丢到了地上。

李强7岁时，父亲李文平和母亲赵广琴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李强被送回临朐老家，一年之后，父亲再次结婚，王庆莲成了李强的继母，生



迫于各方压力，父亲把李强从储藏室搬回自己住的房间。

母赵广琴也一直没有来探望。1995年的秋天，8岁的李强再次回到济南北大槐树小学重新上一年级，但半年之后同样的原因再次被学校退了回来，一再的辍学，父母争吵、离异，父亲的再婚给李强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重重伤疤，李强的逆反心理越来越强：他有意在屋子里大小便，故意把继母王庆莲给自己的稀饭撒得满地都是，偷偷把馒头、包子扔到床下任其变质发臭，把吃剩的米饭塞到蜂窝煤炉里，面对人们善意的问候，他则会报以白眼和粗话……

父亲李文平单位不景气，只有农村户口的继母也一直没有固定工作，全家人的生活全指望李文平的一点工资，一家人的生活十分窘迫。为此，父亲李文平改行当了一名叉车工，必须拼命干活才能保住饭碗，继母王庆莲也在服装厂找了一份临时工作。由于夫妻两人白天都要上班，只得把李强放在屋子外面的一间临时搭建的狭小储藏室里，中午央求邻居给热点儿饭吃。1997年底，李强的腿上开始长水疱一样的东西，由于治疗护理不当加上冻伤，李强的病情逐渐加重，双腿开始麻木、发黑、溃烂直至腿上露出白骨，全身浮肿。李强在这间不足三平方米的储藏室里呆了整整10个月，直至警察将其救出。

在医院里，年仅13岁的李强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段日子。因为在住院的3个月中，他不仅经历了从死到生的两次截肢手术，为了出院后能过上正常生活还在其生母“不说就打死你”“判给房子妈带你过”的挟持和诱惑下对媒体和所有关心他的人说了谎，并表示要以虐待罪起诉父亲。李强的话一时间使继母王庆莲几乎成了歹毒后妈的代名词，父亲也在医院被人追打。但在住院期间，当生母赵广琴得知觊觎已久的房产所有权记在李强的爷爷名下，即使李文平败诉也无法取得房产时，态度陡变，扔下病床上的儿子，携捐赠的善款从此再没有露面。

幸而，在社会各方的捐助下李强完成了治疗。

人们期待着李强能够走出这个几乎把他害死的家庭，可是依照我国现行的法律，社会福利单位只能收养“城市中无家可归、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的孤老残幼、精神病人”。李强的父母均健在并且有经济来源，显然不符合福利单位收养的条件；有一家老年公寓同意收养李强，但条件是每月必须交纳800元的食宿费。可是当时李强全家一个月的所有收入也不过500块钱。出院后李强只得回到原来的家，继续和父亲生活，与先前不同的是李强搬出了储藏室和父亲，继母住在仅有的一间屋子里，拥有了一把轮椅。李强似乎也懂事了許多，开始改口叫继母王庆莲为“妈”。

李强出院后的第90天，李强在父亲李文平的要求下作为原告向济南槐荫区人民法院递交诉状，诉生母赵广琴未按约定交纳抚养费。9月5日第一次开庭，其父李文平作为李强的法定代理人代理诉讼。9月18日第二次开庭，李强的生父母和亲戚来到法庭，互相指责对方侵吞了抚养费和社会捐赠的善款，指责对方把孩子当做“摇钱树”。父亲李文平指责生母赵广琴从离婚至今只支付了半年的抚养费，生母赵广琴以自己收入有限、需要抚养母亲和其丈夫因劳教释放没有工作生活困难为由拒绝继续支付。由于双方争执不下，法庭只得宣布休庭，择期宣判。李强独自一人坐在法庭过道的轮椅上默默注视着这一切。第三次庭审，生母赵广琴被法院当场扣押了其佩带的黄金首饰后，被迫同意交纳抚养费，但她表示永远不会去看望李强，永远不再承认李强是自己的孩子。走出法庭，李强的生父母仍在向媒体的记者攻击对方，声称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并表示要继续这场官司。但不知他们是否想到，对于自己亲生儿子的一生他们是输定了。

这是李强被父亲推进法庭的一瞬间，李强在轮椅上是那么的无助，旁边的两位女性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切，脸上的笑意令人震惊。第二次开庭，李强在亲生母亲的冷笑中被父亲推进法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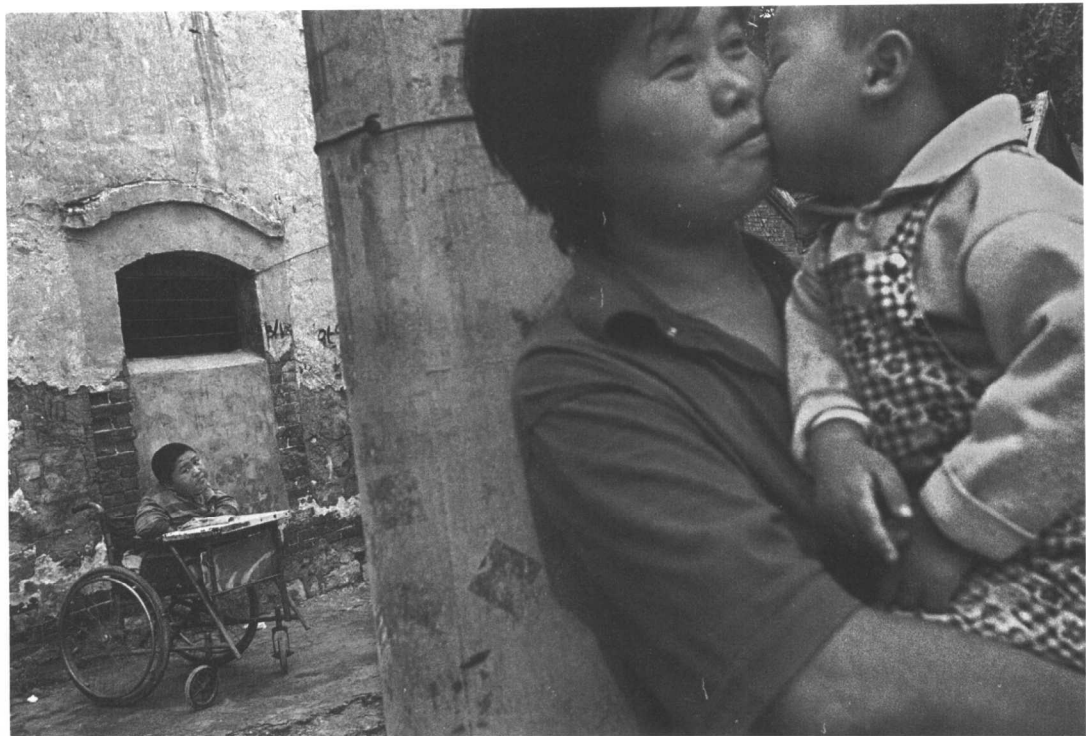
走出法庭后，李强的姑姑向电视记者痛斥李强的生母。

2001年6月1日儿童节，李强被济南电视台邀请参加了文艺晚会的现场直播。在鲜花和掌声中，洗得干干净净的李强穿着新衣服用竖笛为大家演奏了一曲简单的儿歌，头一次面对这么多陌生的面孔，虽然他一直害羞地低着头，但是可以看得出这是他度过的最快活的一个夜晚。过了几天，他忽然用企求的眼光看着我，央求我给他买一辆玩具四驱车，他还从路过的小学生那里打听来价格“每辆7块钱”，并且“路口的商店就有”，还一再嘱咐我“一定要多买几节电池”。等带他选好了玩具车推他回家的时候，他竟要我买车的事情替他保密，教我说车是我送给他的，否则自己一定会挨骂。看着他企求的眼神我也不禁心软默许帮他撒这个谎。

2001年10月，继母王庆莲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取名“双龙”。一个月后，父亲李文平下岗，在朋友的一个厂子里临时帮工，每月只有300多块的收入。2003年生母赵广琴的第三次婚姻再次亮起红灯，随即抚养费也不能按时支付，有时还要拖欠几个月。2003年10月，李文平临时帮工的厂子也停工了，全家人只能吃他厂子里发的“低保”和社区的一点补贴，总共才277块钱。

“非典”之后，原先义务辅导李强功课的师范学校的学生们再也没有上过门。手术后的4年中，李强几乎每天都在家对面路边大树下坐着，周围的人们渐渐习惯了坐在路边轮椅上的这个失去双腿的男孩，社会关注、好心人的捐赠也越来越少，只有偶尔路过的好心人，在李强的轮椅上放几毛零钱。“你现在能吃饱吗……后妈对你好吗？”面对陌生人的提问，李强总是把头扭向一边答道：“好了——好了——烦死了！”对方非常惊讶于李强过激的反应，躲避瘟疫一般地走开了。

看到李强百无聊赖，继母打算让他卖点报纸，既可以打发时光，还能有点收入。有一天，我问李强，除了卖报纸将来打算干些什么，李强照例把头转向一边，但他什么也没有说。



看到母子亲昵的样子，李强感到很不自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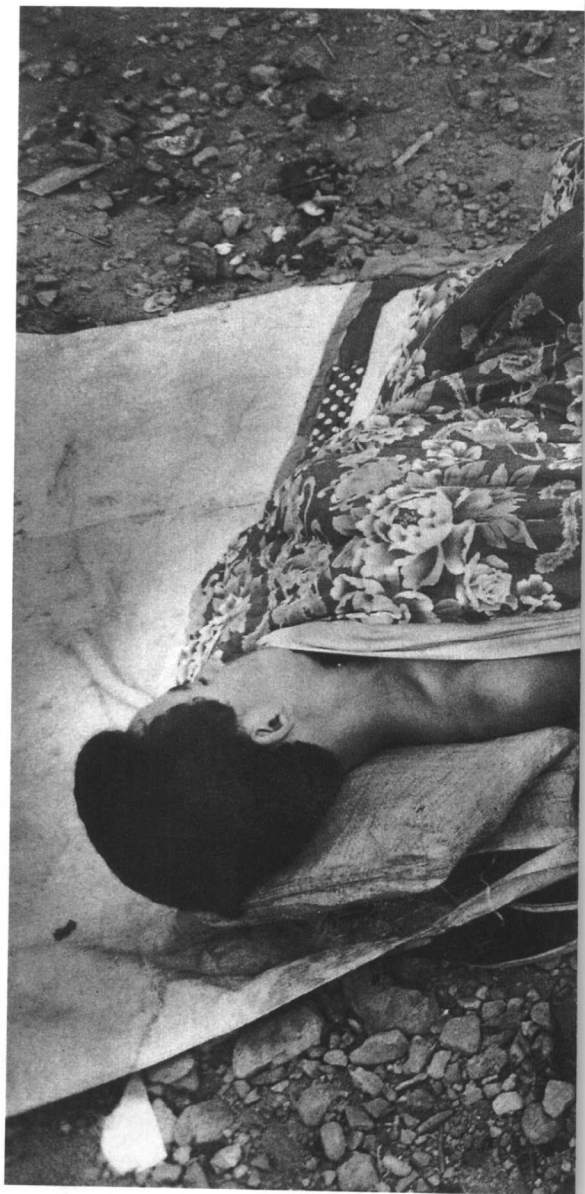
匆忙的人们渐渐淡忘了坐在路边轮椅上的这个男孩。

没有床的夜晚

摄影 / 王彤、石宝琇等 1997 - 2001 年

这组照片从不同角度向我们展示了无论是酣睡的麦客、矿工、市民、小商贩还是农民，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在没有床的夜晚里度过了他们的各自睡眠。

麦客们都是农民，照片上吃苦耐劳的他们就枕着自己的包裹，和衣睡在西安火车站的地板上，出门务工的艰辛由此可见一斑。和麦客不一样的是，在高高钢架上和矸石山上入眠的两位矿工，一位睡在高空的窄板上，全然不顾危险，另一位则睡在倾斜矸石山上，繁重的工作已让他们疲惫不堪，对于他们来说，只要能睡个好觉，明天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工作就可以了，至于睡在哪里已无关紧要，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别无选择。相比之下，在交通亭下、河滩边、汽车旁和店铺门前露宿的人们就稍稍好一些。而为了避暑在河滩上睡觉的农民显然就本分多了，石头填充的纸盒就是他们安置美好梦乡的小枕头，凉爽的河滩就是天然的大空调……而在悬挂着“新疆拉条”“羊肉汤烩面”的小店门前，小店主正在三腿凳拼对的“床”上安卧，他们的店铺没有门，晚上只是用塑料帆布围拦了一下了事，在外面凉爽入睡的同时，也看店照顾了生意，小店主对此也早习以为常。另一幅睡在豪华车旁的人，显然是位穷人，他一无所有的无床夜晚与富人的豪华坐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河滩上露宿的农民

摄影/王彤 河南 1997年

全家人在一领凉席上酣睡，河滩上废弃的包装箱和编织袋里装满石头就成为了他们的枕头。

天气越来越热，但是，由于农村用电受限、经济过于拮据，大部分农民家庭仍然无力购买空调等电器。这四口之家为了凉快将床移到了附近的河滩上。



高高钢架上休息的煤矿工人

摄影 / 王彤 河南 2001年

作者抓住了煤矿工人极度疲惫的状态，皱纹中和指甲里也许是他刚刚从矿井中出来、还没有来得及回家清洗的黑色粉尘，也许他是在等着下一次的进矿。远景中的城市遥远、矮小而模糊，让人觉得熟睡中的主人公一个翻身就可能从高空坠下，但酣睡中的煤矿工人似乎毫无顾虑。对他而言，大概只有失业以及由此带来的贫困才是最大最无法面对的威胁。

(右页) 西安火车站席地酣睡的甘肃麦客

摄影 / 石宝琇 西安 1991年

虽然在相对恶劣的环境中，麦客们依然睡得很香甜。画面前景中间的麦客在睡梦中还仅仅地搂抱着一包东西，也许，这是他家当中比较值钱的东西。

1991年6月的某天，在西安火车站候车大厅外，一群甘肃麦客席地酣睡。因为甘肃与陕西省东部相距甚远，而每年的麦子成熟期又有差异，所以麦客们常因为难以把握时机而不得不提早来到陕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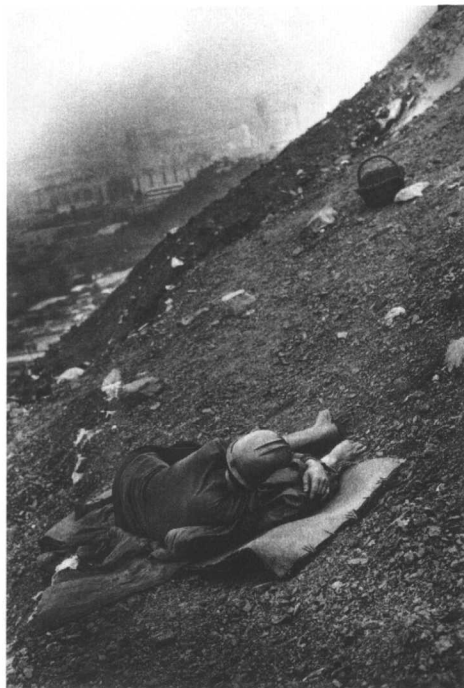


豪华车旁的露宿者

摄影 / 王彤 河南 1997年

宽大的私家车占满了几乎整个画面，席地而睡的人的空间显得如此的逼仄，明显的对比凸现了人们在贫富上的差异。

同一座城市里、同一个街头，有坐豪华车的富人，也有露宿街头的穷人。



矸石堆上休息的矿工

王彤 河南 2001年

废矿山远处的村庄掩映在晨雾中，画面中的人面对着村庄安然入睡。虽然他给人的感觉就像从山顶滑落下来的一样。

也许与井下工作相比，像表演杂技般睡在倾斜的矸石堆上，对矿工们实在算不上一桩艰苦的事。



（左页）田间守护高粱的农民

摄影 / 王彤 河南 1997年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毕竟只是一种社会理想。近秋收了，农民还是需要睡在地头上这样无可奈何的方法来守护自己高粱地里的财产。

在临近秋收的高粱地边，这两个守田的农民正在自家的田间地头裹着毛巾被相靠着在几块薄木板拼组成的“床”上睡觉，其中一个睡觉的枕头就是他旁边一起“守护”的农用三轮车的驾驶座垫。

餐桌餐椅当床的商贩

王彤 河南 1997年

也许是怕丢东西，也许是除了这个小店之外再没有可供住宿的地方，在各式各样的餐馆招牌下，这名小商贩把白天经营用的餐桌、餐椅变成了一张床。于是，白天赖以吃饭的家伙就成了夜晚得以睡觉的床榻。





平日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在黎明时分显得非常的安静，而在白天显得有些震慑力的交通指挥岗亭现在却成了炎炎夏日中市民的床。

交通亭下酣睡的人

摄影 / 王彤 河南 1998年

大概是因为无物遮挡的街心比别处来得凉快的缘故，这个人别出心裁地在街道中央的交通岗亭上旁若无人地睡着了。对于那些被盛夏的酷热和狭窄的空间折磨得难以入眠的人来说，露宿也许是惟一的解决办法了。作者用幽默的手法表现了市井中人对付炎热和拥挤空间的小小的智慧。

在树上“筑巢”而居的老人

摄影 / 谢海涛 宝鸡 1998年12月

宝鸡市一位六旬老汉，在眉县青化乡凤池村的一棵大杨树上“筑巢”而居达18年，至今不肯“挪窝”。老汉名叫严振江，周至县终南镇老堡村人。18年前，他因与家人闹矛盾，请人算了一卦，说他只有离家出走18年才可消除缠身的“恶魔”。于是多年来严老汉一直住在离地15米的树上用玉米秆搭的一个“窝”里，风餐露宿。家人也曾试图接他回家，但第二天早上，老汉就又回到了树上。他说，自己跟候鸟一样，该走的时候就走，该回家的时候就回家。因为“罪”快满了，所以，尽管是寒冬时节，老汉还是在自己的平台上大声吼着秦腔，很是怡然自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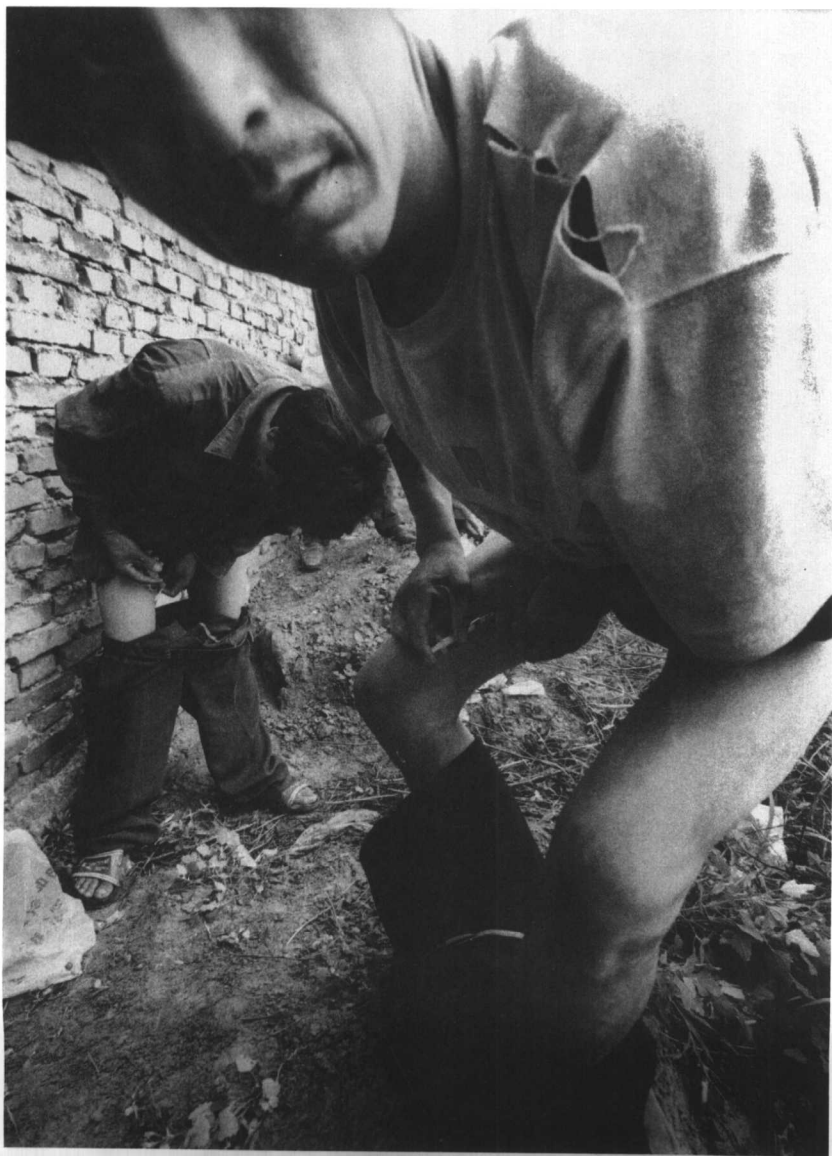
挂在树梢上的搪瓷洗脸盆里装着日常的用品，树枝间的“鸟巢”上，老人过着怡然自得的“鸟人”的日子。

吸毒者

摄影 / 谢海涛 西安 2000年

西安火车站周边地区人员流动较大、成分复杂，长期以来成为刑事、治安案件的多发地，也是贩毒、吸毒活动的集中地。这是在一处废弃场地内当场拍摄到的几名注射毒品者的丑态。面对镜头，其中的一个吸毒者显得惊恐不安。

惊恐的眼神、破烂的衣服、消瘦的面孔、骨瘦如柴的身体……在肮脏的环境中，虽然外来者的到访引起了一些恐慌，但是面对镜头的吸毒者仍然没有停止手中的注射。在后面的吸毒者则根本没有注意到摄影者的存在，而专心致志地进行着自己手头的“工作”。或者，他根本没有时间去关心毒品以外的事物，畸形的需求已经吞噬了他整个人。白色的海洛因在榨干他们的钱财、健康之后，将榨干他们的生命。



西安火车站
边吸毒的人。



是出于无知还是仅仅出于好玩呢，广州珠江路上，这位父亲居然开心地把自己抽过的烟给不懂事的孩子抽。

教孩子吸烟

摄影 / 叶健强 广州 1983年

照片上这位家长，把自己正吸的香烟递进了孩子的小嘴中，想让孩子像他一样抽上两口。孩子显然还小，对于突然而至的香烟，小胖手本能地抓着箱子。

每年，全世界都有300多万人因吸烟而死亡，平均每分钟6人。吸烟或被动吸烟对正处于生长发育时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的损害比成人更为严重。对于这些纯洁稚嫩的孩子来说，最不需要的恐怕就是“烟”。婴幼儿思想意识未定型，可塑性很强，他们把父母的言行举止，看在眼里，记在心头，自觉不自觉地学习、模仿，而这些“记录”对他们心理的发展都起着潜在的消极影响。

非典时期的爱情

摄影 / 马宏杰 洛阳 2003年

学校的铁栅栏外面，或蹲或站着的三位男青年正和栅栏里他们的大学生女友说着悄悄话。非典时期，他们的“非典爱情”没有被口罩隔开，但却被栅栏隔开了，毕竟，从心间流露出的真挚感情，让享受爱情的人们几乎忘记了一切。

2003年非典的时候，所有大学都封校，许多单位里也是没有出入证不让进。从四月到六月，所有学生不可以逛街，不可以去外面吃饭。许多大学校园里谈恋爱的学生只能牵手在校园内走走，或隔墙与恋人交谈，如同照片上这些痴情学子，非典，让他们的心靠得很近，因为这种灾难，他们懂得了彼此珍惜，并认为度过了别人无法体味的“最快乐的时光”。

非典期间洛阳市师范学院的学生被困学校，她们的男友只好隔着栏杆和她们相会。突如其来的灾难并不能阻挡恋人们的情感。





最后的

“最后”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
看着一件件美好或是古老甚至落后的事物从我们
眼前慢慢逝去。

这些都曾经出现在我们生活空间中，
可现在我们惟一能做的只是用眼睛记下这些最后
的遗存，目送它们离开。

最后的金莲

摄影 / 文 / 任琴 1993—1994 年

裹脚起源于五代南唐后主李煜这个能诗善赋的风流天子，他命宫嫔以帛缠足，使双脚纤小上屈作新月状，再穿上素袜在高六尺的莲台上翩然起舞。这一舞，便舞出了近千年中国妇女的辛酸血泪和屈辱历史：难怪胡适把八股文、鸦片和裹脚列为旧中国三大病症。

云南虽然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但到明代汉族大量迁入，妇女缠足的习俗也带到了云南。通海县是当时的交通要冲，手工业发达，商业市场繁荣，加上妇女多在家纺织或从事家务劳动，因此缠足之风很盛。由于历史的原因，通海县至今仍健在的上千位小脚老太太，就成为中国最后的小脚群落，同时也是这一历史的最后见证。





一双新制的绣花鞋。



老人们兴致来了也要比试比试。

裹脚令妇女们行走吃力，给她们的生活带来无穷的辛酸和痛苦，而今天，曾率全国之先成立了老年体育协会的六一村，成了远近闻名的“金莲村”，各项活动开展得热气腾腾、有声有色：“老年迪斯科”和着时代的节拍；“烟盒舞”展现民族风采；“小脚地掷球”经常参加全国性比赛，所取成绩让人们惊叹不已。全村的裹脚老太太借着富有时代色彩的健身方法，摆脱了过去裹脚的痛苦，舞出最后的人生辉煌，洋溢着令人感动的生命力和幽默感。

九九重阳，又逢敬老节，天上虽然下着小雨，村公所的院子里可是热闹成一片：老年协会办了一百二十多桌的宴席，全村55岁以上的女人和60岁以上的男人都来吃饭，每桌8人，十几个菜，吃一天。饭桌上的很多老人胃口都特别好，给人一种吃了今年不知明年的感觉。

我一看，八九十岁的老人还不少，并就此认识了肖秀香、浦富元、王燕元、王燕琼和王肖氏等几位老人。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我成了她们各家的客人。

属猴的肖秀香今年79岁，丈夫周从应大她4岁。老太太给我讲起了她的故事：“我3岁死了娘，父亲讨了晚娘，对我不好，只有住在外婆家，舅舅、舅母都心疼我，他们是栽田种地的人，我能吃饱饭，没受过什么苦，记得是外婆给我裹的脚，当时我才6岁，小时候脚疼不疼也没有印象了。外婆的小脚裹得特别好看，她也好好地给我裹，个个都说我这两脚裹得周正呢。”

“记得我十多岁时，兴放脚，我就天天躲在家里，哪里都不敢去。有一天出门打酱油，听见两个男人在说：瞧，这个小姑娘是个小脚。我拿着酱油碗没命地往家跑，进门碗里的酱油也泼完了，赶快躲上楼，把裹脚布放开，穿上袜子，等着有人来罚款——我这两脚硬是躲着裹小的。那些年女人都裹脚，只觉得周围的女人脚小才好看。裹脚的女孩，家里好过些的才会裹得好，穷人家的不能裹小，因为要下地下田做活，时裹时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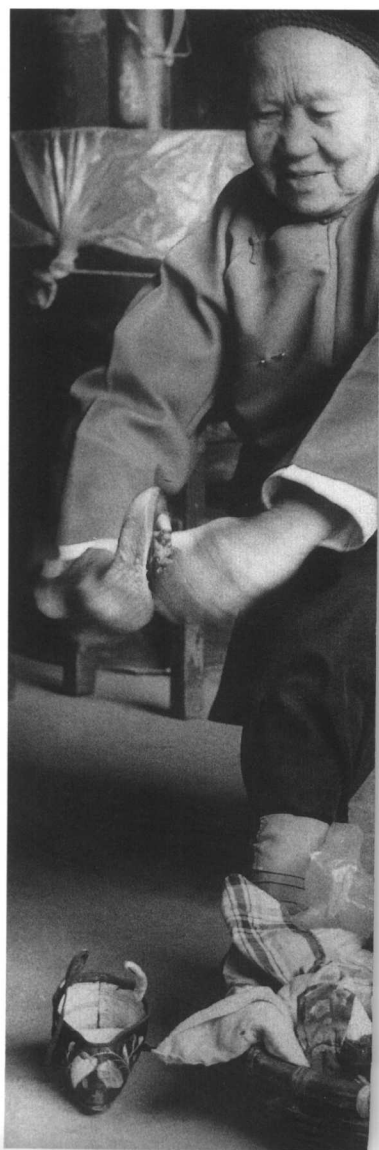
肖秀香老太太说的放脚，是在1913年。当时通海曾在县城女子小学堂成立“火足会”，号召成年妇女放足，幼女不再缠足，但收效不大，缠足陋习依旧。到了1931年，县里奉令成立“火足委员会”，各区成立“天足分会”，宣传缠足的危害，天足的好处，布告全县，明令规定缠足者无论年龄大小均要放足，未缠足的不得再缠足，县城、集镇还为此设卡检查。这样，才刹住了幼女缠足的风气，已经缠足的年轻妇女也大多数放了脚。但也有极少数家仍强迫女儿裹脚。1950年以后，当地缠足的陋习才彻底消除。

看得出，四世同堂的老两口是一对恩爱夫妻，肖秀香和我说话的功夫，周从应一直笑眯眯地坐在一边。老太太参加老体协有四五年了，一开始只是老伴去，她害羞不好意思，后来也慢慢跟着学，别人都夸她比丈夫还学得快，动作做得又标准，太极拳、太极剑、老年迪斯科……几十个动作都记得住，样样都练得好。几年来身体本没什么毛病的他们，现在更有精神了。

肖秀香手腕戴着上海表，脚上穿着通海鞋厂的小脚皮鞋，拾掇得清清爽爽的，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年届八旬的人。我问老头：“大爷，你当年咋会看上大妈的？”

“还不是她的脚裹得周正么！”一句话道出了那个年代的审美标准。

一针一线，老人家不知道做了多少双这样精致的小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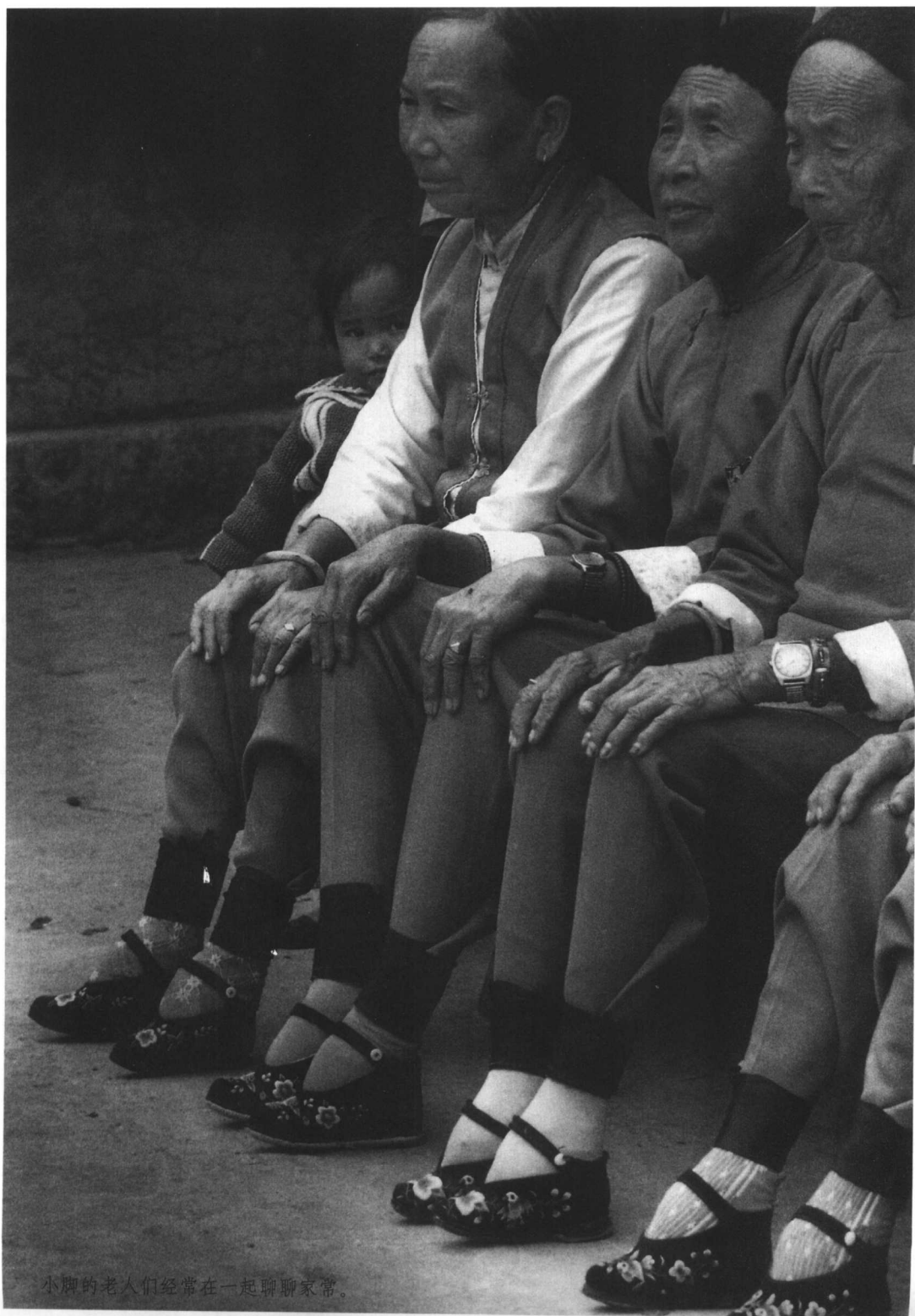
八十多岁的浦富元老人给我唱一首“小脚歌”：裹小脚嫁秀才，白面馒头就肉菜；裹大脚嫁瞎子，糟糠窝头就辣子。

老人4岁时妈妈给穿上拢脚鞋夹住不让脚长大，五六岁裹脚，晚上睡觉都不解开，疼也忍着，因为那时候瞧媳妇要先瞧脚裹得周不周正，这是尽人皆知的。

当时民间流传的缠足方法，要求裹出的小脚“尖、圆、瘦、小、铁”，和符合“三寸金莲”的标准。小女孩长到五六岁便开始缠足，每天洗脚一次，收紧一次缠脚的布带，洗脚时幼女呼痛之声惨不忍闻。缠至十三四岁时，脚背腰骨已折，脚指缠成一柄老姜形。无数天真活泼的小

浦富元老人从屋里翻出当年曾经穿过的小鞋，“不行，不行，穿不进！”儿子在一旁也好奇地看着母亲的举动。





小脚的老人们经常在一起聊聊家常。

姑娘，在缠足陋习的残害下，行动变得艰难呆滞。而谁家的姑娘如果裹得一双“三寸金莲”，就有望找得一个如意郎君，父母的脸面也随之光彩倍增。谁家的姑娘要是双大脚，则被人诋为大脚丫头，婚配难找对象，脚的大小成了那个年代衡量妇女外形美丑的重要标志。

说到嫁人，浦富元脸上一下子有了光彩，“坐轿子，两只小脚伸在轿外，结婚时光陪嫁的鞋就有十几板，每板五六双，圆圆地缝在一起……”

老人起身进屋翻出当年穿的各种小鞋，有绣喜鹊的，绣构花的，有冬天穿的棉鞋，雨天穿的厚底鞋，多数现在都已穿不进去了。

我看着眼前这些几指宽的小鞋，心想要穿上还非得“三寸”不可。

老人让我给她拍张照片：她头戴“勒子”（镶嵌宝石的帽子），穿上一双最好看的小鞋，戴上玉镯头。她说这张相片要留做“成福”（过世）后挂在儿子家里。

周富元老人的脚可就没有那么“周正”了，她从“大跃进”说起自己这双放了的脚，“这双脚1958年时要挑土打埂、拔秧薅草，还要上山背矿石；‘文化大革命’时两人踩一架水车，小脚蹬得不快。不干不得吃呀。脚小做什么都不方便，不裹不裹，慢慢就长大了。”

我看那脚，它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脚，但又比正常的要明显小，指关节都是小时候裹脚被撇得变了形。这样的脚，就是放开了一样不好走路的。

王肖氏每天坐在门前折刷了银粉的纸元宝，我让她说说自己年轻时的事，老人半天没有抬头。

“年轻时候的事不能说，说起来会心寒呢。眼泪都哭干了。（停顿）我丈夫是个独儿子，有五姊妹。我16岁嫁到王家，叫婆婆多少声妈从来都听不见答应：生得三儿三女，36岁守了寡……”

如今一个人过的王肖氏，由两个儿子供养。笃信佛教的她，一天烧香三次，从不间断。她告诉我，神龛上供奉了药王仙帅、寿星公公、财神爷爷、观音祖祖和毛主席。

女人脚小，出不了远门，这一带的小脚老太太有的甚至还没到过省城昆明。走不远，看得浅，生活中的她们没什么见识，惟一的精神寄托便是信了佛，那份虔诚只为求得来世比今朝过得更好。

走进王燕琼老人的家时，隔壁邻里的几位老太太正在向她讨鞋面花样，得知老人鞋做得好，我也兴趣大增。

“我们老话说：不会做鞋么先做底，不会养儿么先养女。做一双鞋要有将近十道工序：先剪鞋面，再粘花样，绣上花，圆好口，纳底，上帮、挂个祥，最后还要挑个鞋曳巴……”

如今通海的市面上能买到小脚布鞋小脚皮鞋，但老人们仍然喜欢穿自己做的鞋，那上面绣的小鸟、撒的碎花，针脚密不密，鞋形正不正，让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女人是不是精明能干。

六一村的缠足老人，几乎个个都对自己的小脚非常自豪，赞美之词溢于言表：裹得周正，不梭不歪，能穿多么小的鞋等等。而那裹脚的疼痛早已被淡忘，留在记忆中的是嫁人的幸福比如坐花轿，还有就是心酸比如土改、1958年的劳动。

不知怎的，相比之下，我低头看看自己的脚，一时竟然觉得好像太大太难看了。

同样是女人，生活的轨迹决定了她们的观念，当年兴裹脚，不裹不行，大家都认为小脚好看，脚小的女人才有男人来讨，所有的人，男女老少的生活都和这小脚有牵连，生活中就是离不开它。

90年代初，村中的小脚女人不落时代步伐，积极开展老年体育活动，一传十十传百，引得多家新闻单位来采访。物以稀为贵，小脚女人们又一次吃香了。那些脚大的老体协会会员因此被冷落，很多人忿忿然心里不平。这些经常外出参加比赛的小脚女人们，都特地找出最漂亮的小鞋，扎上绑腿，穿上复古式的大襟衣，头戴勒子（帽子），以此为美以此为荣，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报纸版面上，出尽了风头。对这些举动，县里有的领导认为是给通海人出丑，甚至还有不愿意接待外地新闻单位来采访的。

六一村坐落在滇中富庶的杞麓湖坝子，山青水美，空气好，难怪这里的老人多长寿。村里九十多岁的张恩敬老人以此为豪：“我们农村走十家碰不上一家煨药的，城里走十家九家都在煨药；水是甜的，菜蔬是新鲜的，整天在地里干活，不想吃饭才怪呢！”

这些古稀耄耋之年的小脚老太太，走过了两个时代。从她们的故事里，我们听出了辛酸的眼泪，听出了世道的更迭；她们的脚步虽然缓慢蹒跚，但谁也不能否认，从那些足迹上我们分明看到了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

老人们有时候难免觉得寂寞。





五世同堂的女人难得在一起留下一张合影。当年98岁的王许氏（中）如今已经不在人世。

最后的带枪部落

摄影 / 卢现艺 文 / 张晓松

1999年

在贵州月亮山麓的茫茫森林中，散落着5个寨子，那里还保持着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原始古朴的生活习惯。这些苗寨与其他苗寨很不同，以民风剽悍闻名于世。他们就是以种稻为主、狩猎为伴，有“神秘邕沙，战国遗风”的说的邕沙部落。

邕沙部落认为蚩尤是他们的祖先，他们相信万物有灵，尤其是对树木，他们认为每一棵大树都是一个祖先的灵魂，他们敬畏这些灵魂。邕沙的社会仍然保持着古老的男耕女织的传统，男主耕作狩猎，女主生育染织。相比之下，男性比女性更注意自己的角色身份，邕沙社会以男性为中心，他们是氏族和家庭的主要领导者。

邕沙男性至今仍以尚武为荣，他们平日里猎枪从不离身，个个枪法如神，爬山上树如履平地，极善爬山打猎，衣食住行均取之于山林河谷，长期以来与大自然相伴相生，融合自得。他们十分重视自己身体的强壮，狩猎与耕作技术的高超，还特别强调装束和身体的标志。现在，山里虽早已没有走兽飞禽可打，但男人出门时仍喜欢带着猎枪，枪已成了他们的随身饰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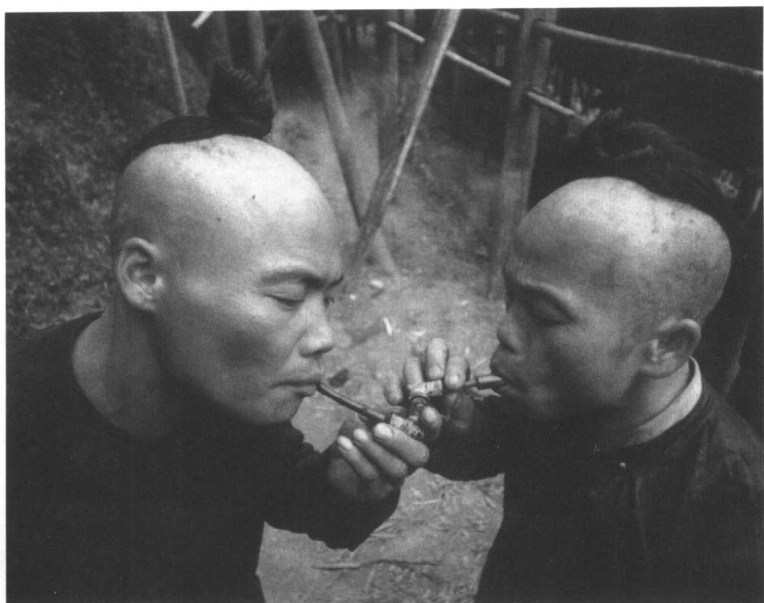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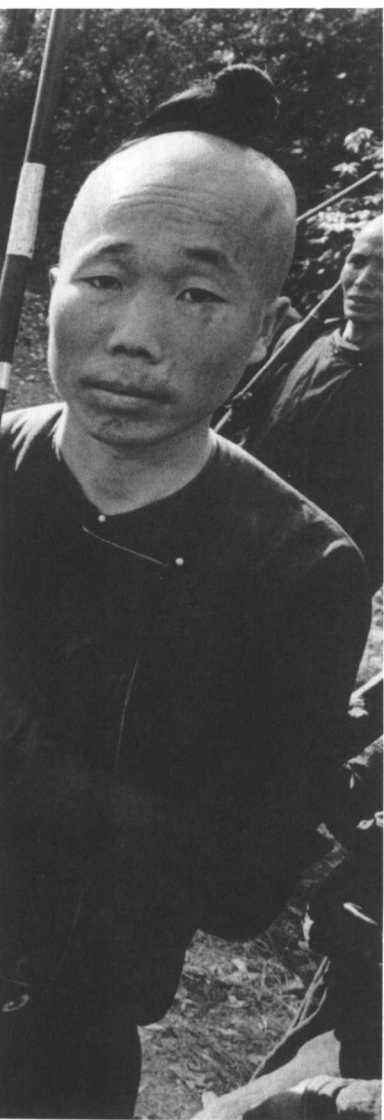


邕沙男性任何时候都习惯用扛枪的姿态扛着平日的劳动工具。

岜沙人的服装都是麻布制成的。人们将麻纺成长长的麻线，并将线截成同样长度，再经过理线的工序才能拿到纺车上织布。一束二十米左右的麻线经她们手梳理成上下两层根根相隔，疏密一致可以用来织布的经线，十几个人协调配合分工明确才能完成这一工序。织完的布还要经过植物蓝靛染料染制，染制时要放上鸡蛋清，染好的布为深蓝色，还会泛着紫光，还要叠成块在青石板上用木榔头反复槌打，蛋清与染料作用形成胶质渗透到布中，使染成的布具有防水作用，并且很光滑，凉爽。贵州气候多雨，穿着它小雨一般不会淋透，仍然可以劳动。



岜沙男性尚武，平日里他们总是猎枪不离身。



猎手们之间的交流。



在姑娘身边，岂沙男性更要显示剽悍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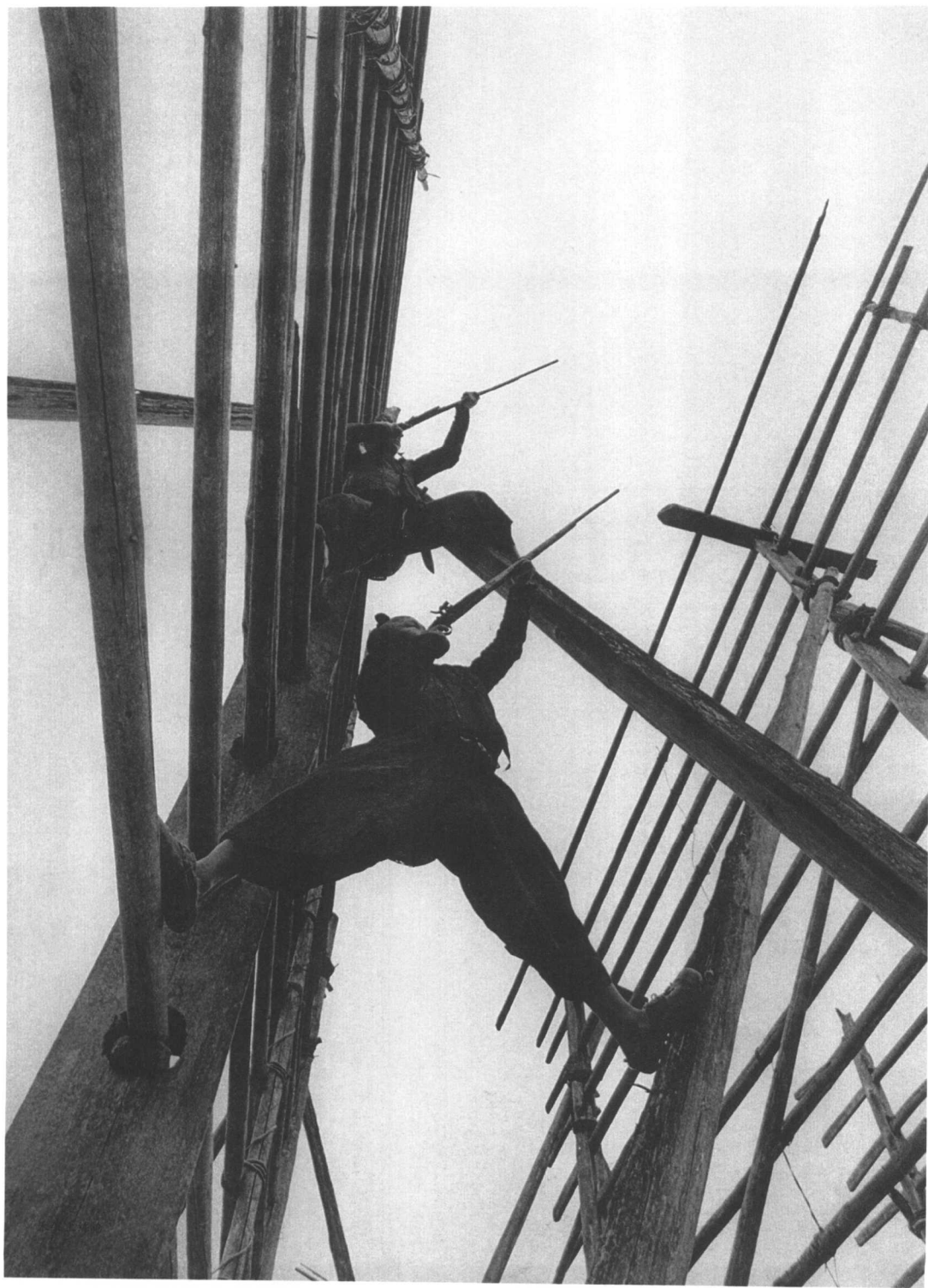
岜沙的男人非常重视他们的发髻，他们独特的发髻在岜沙苗语中称做“户棍”，是男性装束中最重要的标志。“户棍”就是剃掉男性头部四周大部分的头发，仅留下头顶中部盘发为髻，并终身保持这种发式。据说这种装束是从蚩尤老祖宗时代传下来的，这也是迄今为止在中国所能见到的最为古老的男性发式。

男孩子一生下来，就不能随便洗头梳头，更不能随便剪掉头发。“头发是祖先的命线嘞，轻易动不得的哟！”寨老不断地告诫族人说。每个男孩子在7-15岁之间必须举行一次成年礼，行成年礼的那一天，男孩儿邀请几个年龄相仿的伙伴，去上山打鸟，去田里捉泥鳅，到山涧摸鱼……鸟打得越多、鱼捉得越多，表明他的本事越大，将来会有出息。然后，小伙伴聚集在当事人的家里，喝酒、烧吃捉来的鱼和鸟，再由当事方族中的本家鬼师为他剃头，梳成“户棍”，大功即宣布告成。履行完祖上传下来的严格仪式，就标志着他的人生进入了独立的阶段。

岜沙人认为他们才是最正宗的苗族。早些时候，年轻人从外地打工回来时，必须要在村外换上本族的衣服才准许进村。现在，随着外界文明的逐渐进入，岜沙部落也开始有了一些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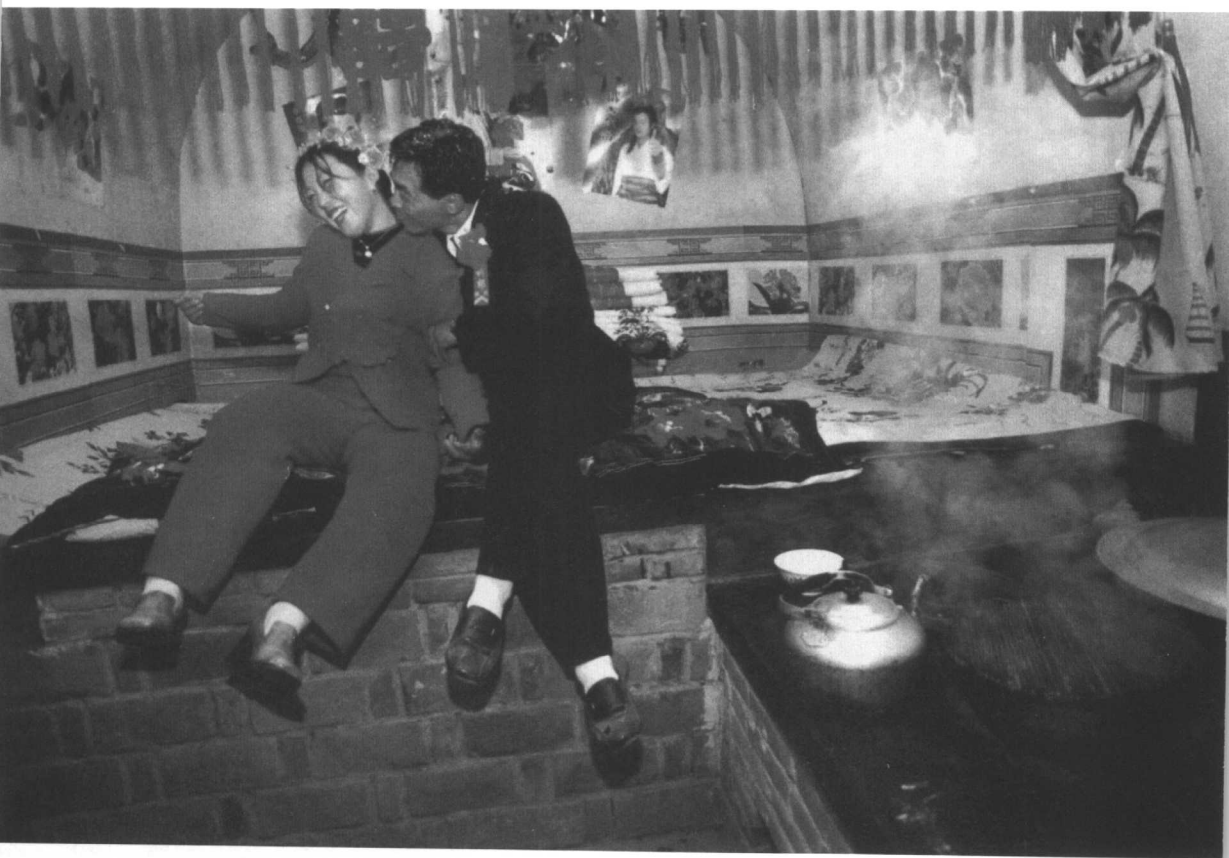
岜沙枪手的婚礼。



邕沙男孩从小就要开始练习枪法。



我们常常以为变迁只和时间有关，
其实这是一个常识性的误会。
几十年来的中国可以向全世界证明：
“翻天覆地”总是来自于空间的变化，
比如说对外开放、对内搞活，
比如说全球一体化。



春节期间，陕西米脂窑洞里的一场普通人的婚礼。

闹洞房

摄影 / 马宏杰 陕西米脂 2001年

2001年过年的时候摄影师马宏杰和几位影友到米脂县榆林洼去采访，恰好遇到了县支书的小姨子结婚远嫁，大年初二，早上8时一帮迎亲的吹鼓手便在新娘家院中吹了起来。新娘子打扮一新，大红色的衣服，红色的手套，胸前一朵纸扎的大红花，崭新的皮鞋，满面红晕，憨厚、朴实，有山乡的黄土气息，有传统的生活神态，也有现代变革的追求。

姑娘叫李永丽年方19，远嫁的地方离此约有30公里的山沟路，男方家在横山县党岔乡，位于榆林河畔，是黄土地上的鱼米之乡。女方陪嫁的是一辆摩托车、四条被子、两条毛毯、水瓶、衣架和箱子。

上午9时，迎亲的婆家和送亲的娘家上路，娶亲的是一辆老式吉普车，送亲的是几辆拖拉机，颠簸了3个小时才到了男方家门。在陕北有这么一个风俗，就是每一个送贺礼的亲朋好友都可在男方家连吃3天的婚宴，3天之中新郎家热闹非凡，新婚夫妻的生活也在这热闹的日子里甜蜜地开始了。



苍南县蒲壮所城晋升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仪式上的礼仪小姐队伍分列道路两旁，挑担的农民旁若无人地从她们中间穿过。

穿过礼仪小姐的队伍

摄影 / 萧云集 浙江 1997年



位于浙江省苍南县南面30公里处蒲城乡的蒲壮所城，是保存较为完整的明代东南沿海抗倭名城。蒲城在唐朝以前还只是海湾一角，因海涂上菖蒲丛生，农人们取叶编织为门，古称“蒲门”。由于蒲城地势险要，后来渐成海防戍边要地。图为1997年11月，苍南县蒲壮所城晋升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仪式上的礼仪小姐队伍。有趣的是，一个挑担的农民正从“夹道欢迎”里静静走过。对这位农民来说，他也许并不知晓晋升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是怎样的一个概念，里面埋伏了多少旅游商机，他对此如同一个局外人。在他眼里，蒲城就是蒲城，一个他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

平遥古城拍人体

摄影 / 宋布军 山西 2001年

2001年9月22日，首届国际摄影节在山西平遥举行，这天下午4点半，在600年历史的平遥古城墙下组织了这场公开的人体摄影活动。随着社会的变迁发展，人体摄影已不再是讳莫如深的话题。而有意思的是，以女性人体为表现对象的图片远比以男性人体为表现对象的图片多得多；而男性摄影师又远比女性摄影师要多得多。

照片里，平遥古城就成了人体摄影诠释“创新”的场地，两位来自深圳的模特虽冒着深秋的寒风，但神态却异常平和，她们背靠城墙，各自摆开姿势，右边的女模半脱下崭新的军大衣，向镜头展露出自己青春的胴体，左边的女模则望着远处的人群，若有所思，在她们身后，是灰色城墙展开的一面巨大灰色幕布。

摄影师们对严寒中摆好姿势的模特趋之若鹜，旁边休息的模特却无人问津。远处的人群吸引了休息中的模特。





街头赶路的商贩

摄影 / 吴正中 青岛 1996年

青岛馆陶路是个历史老街，画面上两个青岛商贩正抱着塑料模特走在这条老街上，从他们的满面笑容揣度，他们的生意正蒸蒸日上。

青岛，曾被梁实秋夸赞为“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梁实秋《忆青岛》），摄影师吴正中就在这座胶东的海滨城市里生活了近50年，他用镜头向我们阐释了青岛人在“春有百花秋有月”里浪漫的闲散以及自我容易满足的一面，正因为有了画面上这些真实的人，才有了新一轮变迁的青岛。

1996年，青岛馆陶路。两个匆匆赶路的商贩一个抱着塑模的头、一个抱着塑模脚，一路谈笑着把模特带回自己的商铺。





广州向来开放，但10来位身着内衣的模特坦然走在人流如潮的广州农林下路，还是引来不少路人观看，这一颇不寻常的景观原是一家内衣厂为宣传其产品而推出的“大胆策划”。

广州街头内衣秀

摄影 / 叶健强 广州 2001年

照片上一群身着内衣的模特正面带微笑走过繁华的广州农林下路，最左边的一个女模挥舞着丝巾，右边那位摄影师在追拍，路人好奇而专注地注视着她们。镜头把模特们定格在一个路边写有“经营业务”的广告橱窗里，从橱窗里依稀可辨出“合资企业”、“人民币”等一些炙手可热的词语，这些词语显然成了这次“大胆策划”的动机注脚与潜在告白。



高楼大厦下的牛耕

摄影 / 黄一鸣 海口 1988年

海南建省之初，海口仅是个20万人的小城市，市容破旧不堪，马路上也没有红绿灯，城市周围仍被大片大片的荒野和耕地包围着。初到海口的人，常常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高楼林立中，汽车和耕牛并驾齐驱。照片上便是这种滑稽景象——一个尚未完全竣工的大厦前（也许是尴尬的烂尾楼），一头健壮的耕牛正迈着沉稳的步态犁地，专心扶犁的耕作者对田边飞驰的货车、路灯和远处的大楼熟视无睹。城市的大幅扩张和农田萎缩的矛盾拉锯战此时也仿佛已相互调停，彼此相安无事。熟悉海南的人都知道，在1988年前后的海口，这样的场面并不鲜见。



1988年的海口，城市飞速发展和扩张，高楼林立中，汽车和耕牛并驾齐驱。



下岗职工正在排队领取由政府每月发放的失业救济金。

排队领取救济金

摄影 / 李洁军 广州 1995年

1995年12月，广州市东山区劳动局院内沉重的铁门内，一些下岗工人正在排队领取由政府每月发放的失业救济金，照片中排队的下岗职工有男有女，一个领过失业救济金的下岗工左手牵着他的孩子，右手下意识地扶墙（可能他已不堪生活的重负），朝劳动局铁门外走去，他有些凌乱的头发下面，脸庞中透出一丝疲惫与忧郁。

“带路”生意

摄影 / 吴正中 青岛 1999年

青岛的街道不像其他大城市的街道那样横平竖直正南正北，而是顺山势而建，蜿蜒跌宕。曲曲弯弯的街道，于是就成了—些脑瓜灵光而又熟悉路的青岛人的赚钱资本。画面上便是杭州路上一位手持“带路”牌子的青岛老人。正午的街头，老人端坐在路中间绿色隔离带里的一块石头上，面对匆忙的车流，他轻端着广告牌子。隔离带里没有树，为了生意，他只能忍受着汽车废气和阳光的熏蒸。

中国的许多城市这些年不断扩大，新修道路也越来越多，其间立交桥多而复杂，“带路人”于是应运而生，带路人一般都是本地人，他们对哪条路能走，哪条路不能走，哪条街道敢闯，什么时间这条街道又不能闯，心里都特别有数。

青岛杭州路上的一位手持“带路”牌子的老青岛人。



三峡移民告别故土

摄影 / 胡伟鸣 重庆 2001年

画面上一艘远处的驳船装满了移民们的家当，启航的马达声即将响起。一个中年人正把他的大立柜往另一艘驳船上驮运，一位老人帮扶在一旁，几个戏水的孩子玩耍在四周，对搬迁到哪里他们全不在意，只有立柜镜子里的那个孩子，似乎敏感意识到了搬离家园时的一丝迷茫与惆怅。

三峡工程成败的关键在移民，移民问题关系到了整个三峡工程。

按国家批准的三峡大坝正常蓄水位175米高的方案，三峡水库水面面积1084平方公里，其中淹没陆地面积632平方公里。水库淹没涉及湖北的宜昌、秭归、兴山、巴东共4个县和重庆市的从巫山县至江津市长江沿岸的16个县，共计20个县，全库区将淹没耕地、园地和林地42万亩。到2009年工程建成时，移民动迁总量将达113万人，一座水库的移民人数超过百万，如此浩大和繁杂的移民工程，其艰巨性、复杂性堪称举世罕见。





三峡移民正搬运自家的家当上船，顽皮的孩子还不知道告别故土的痛苦，依然没有停止嬉戏玩耍，只有衣柜镜子里的孩子好奇地注视着这一切。



人类的故事首先是时间和空间的故事，

中国的故事更是如此。

要叙述激烈跌宕的当代中国，离不开时间，
要认识真正的中国，需要走进许多我们看不见、
或者看见了也视而不见的空间。

ISBN 7-80673-503-8



9 787806 735039 >

ISBN 7-80673-503-8/K · 006

定价：26 元